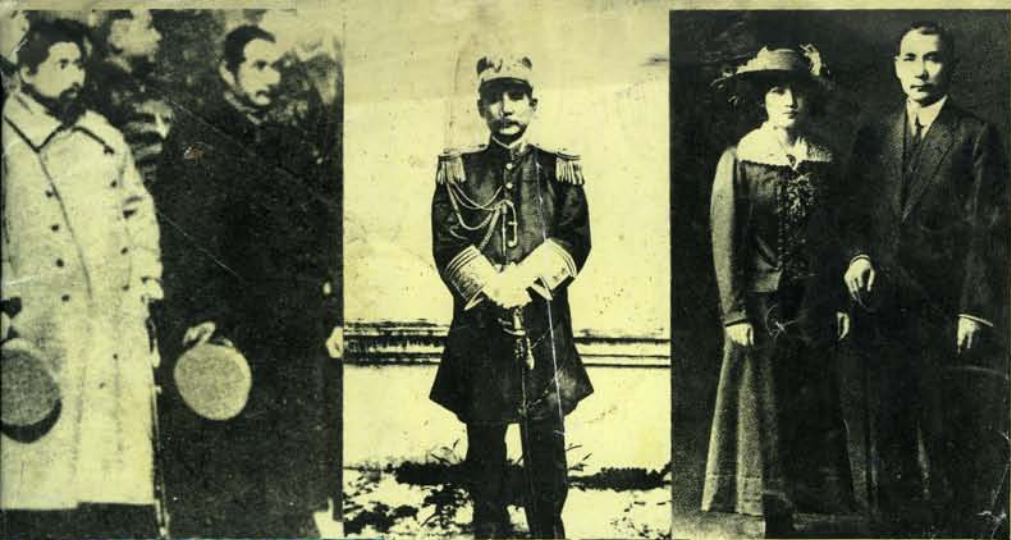


南京史志

国内外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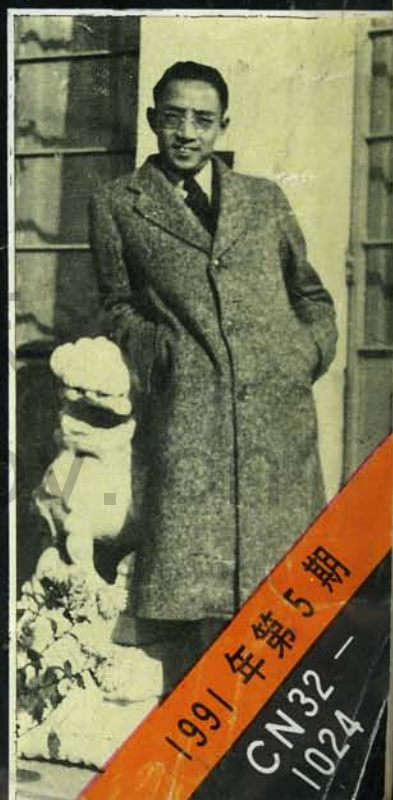


战斗在日伪
高层机构中的红色谍报员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始末
黄兴在南京举兵讨袁经过
最早把弗洛伊德介绍到中国的
著名学者高觉敷

昔日违心做「妃子」

今天甘当林家妇

张宁远嫁美国



1991年第5期
CN32-1024

NANJING LOCAL HISTORY

南京市白下区城镇建设开发公司



黄大鹏副区长和各分公司领导研究
“八五”城市建设规划

光荣榜



光华园小区

马府街村小区

王府园小区在建设中



南京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科巷菜场



南京史志

(总第四十九期)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

顾问 郑凤翔 张治宗

主编 姚文烈

常务副主编 王能伟 陈济民

· 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专栏 ·

辛亥革命南京城光复纪事..... 吴雪晴 严 华 2

黄兴举兵讨袁经过..... 陈谦平 6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始末..... 崔之清 胡臣友 9

北伐军攻克南京与帝国主义.....

制造的“南京惨案”..... 方庆秋 13

孙中山结识蔡公时..... 王宪章 15

宋庆龄关注叶恭绰..... 胡明华 17

张学良倡导士兵识字教育..... 沙兰芳 18

风云都督孙毓筠..... 王炳毅 20

从南京赴义的黄花岗烈士阮德山..... 戴志恭 22

· 人物春秋 ·

日伪高层机构中的红色谍报员..... 韩贤俊 24

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教授..... 董 纯 29

第一位考察欧美的南京人李圭..... 经盛鸿 32

· 神州风云 ·

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 郑永喜 蒋永才 34

· 秦淮杂忆 ·

张宁远渡重洋嫁美国..... [美]莫利亚 40

黄宗仰与栖霞寺..... 孙宅巍 44

· 经济纪实 ·

蓬勃发展的南京市“三资”企业..... 梁学忠 王鲁宁 45

南京同仁堂制药厂的创建与发展..... 唐富春 47

第一医疗器械厂靠科技发展企业..... 宋汉平 48

注重旧城改造建设 配套设施日益完善..... 陈思富 49

· 方志研究 ·

新方志编纂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傅振伦 55

服务修志 办出特色..... 孔令士 57

谈民谣民谚的人志问题..... 梁滨久 蔡华伟 54

· 金陵文教 ·

南京血防四十年..... 周 红 朱秀兰 52

原首都中央体育场.....

· 白门掌故 ·

陈后主宠姬张丽华是谁斩的..... 王永泉 19

马湘兰墓辨误..... 陶 恺 43

南京人口普查中的几个数字..... 李素月 12

· 志苑信息 ·

全国西安会议修志综述..... 王能伟 61

南京千余名青年在雨花台宣誓入党..... 余安民 23

全国省级地方志刊物主编会召开.....

江苏地方志刊物会议召开.....

「热爱南京 振兴中华」竞赛试题..... 63

编辑部主任 庄淑玉

副主任 汤惠兰

责任编辑 董宁宁

发 行 卢海鸣

胡星侠

李哲民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82·41·八六

国内发行 本刊发行部

电脑照排 南京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电脑部

广告许可证 宁广字第五六号

全年订价 7.20元 本期定价 1.20元

地 址 南京市政府大院

邮 码 210008 1991.9.10出版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南

京

城

光

复

纪

事



会攻南京的沪军先锋队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公元1911年10月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响起了振聋发聩的隆隆炮声。统治了中国达二千多年历史的封建王朝象一座破烂不堪的大厦，在革命军的炮轰之下，墙倒楼塌，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各地的武装斗争中，南京城的光复之战，以其战斗激烈、战果辉煌而载入史册，成为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武昌首义 震撼南京

1911年10月10日的夜晚，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一队年轻的士兵从兵营中冲出，直扑武昌中和门外楚望台清军军械局，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天明，经过激烈的战斗，湖北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黎元洪担任了军政府的都督。在武昌首义的影响下，活跃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10月22日，湖南独立；同日，陕西独立；29日，山西独立；30日，云南独立；31日，江西独立。一时间，革命烈火燃遍全国各地，也燃烧到江苏。

11月4日，上海革命党人陈其美、李燮和等人攻克清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翌日，清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江苏光复，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接着，江苏的常州、无锡、镇江、扬州、南通等市紧随其后，遍插白旗，宣布光复。这一切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震撼了南京这座东南重镇。

南京地处南北要冲，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北枕长江，自东向西被紫金山等一系列丘陵山岗所环绕，形势险要。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清兵于1857年底再建江南大营，围攻南京达6年之久方才攻入；足见其攻城之艰难。为了维护其统治，清政府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初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于此，并驻有重兵防守。武昌起义爆发时，南京驻有两支军队，一支是以旗兵和绿营兵为主的旧军，计有江宁将军铁良的驻防兵1标（团）、炮兵1营和以饥民为主而改编的巡防营10营，江南提督兼江防会办张勋部江防军20营，缉私营统领王有宏部10营，巡防营统领赵会鹏部5营，及两江总督府卫队1营，共约2万人；另一支为新军新建陆军第九镇（师），计有第十七协（旅）的三十三、三十四标，马队第九标、炮队第九标，工程营、辎重营等5000余人，由统制（师长）徐绍桢率领。以旧军、新军为别，南京的政治力量明显分为两大派，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及

吴雪晴 严华

铁良、张勋等，极端仇视革命，效忠清廷，其中尤以张勋最甚。张勋为江西奉新人，在清军中由差弁一步步升至总兵，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张勋以保驾西太后有功，得到赏识与提拔，因此他对清王朝十分忠心。新军中的广大官兵多为知识青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满清的腐朽统治普遍不满，加之著名革命党人赵声、柏文蔚等曾在第九镇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使得不少官兵倾向革命。

各地新军的起义，强烈地冲击着第九镇官兵的心灵，也使张人骏等提高了对九镇的戒心。张勋为了防范新军起义，派出江防营部队日夜围扰第九镇兵营，特别是对骑兵、炮兵防范尤甚。这引起了新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一些军官借故请假去湖北参加武昌起义部队。张人骏得知此事后，唯恐九镇士兵象武昌八镇士兵那样起义，急忙于10月17日派江宁布政使樊增祥赴新军各标营“安抚”军心，声称绝不怀疑新军士兵；同时加强防范，于24日起在南京城戒严，使得南京城内百姓大为恐慌，仅三日内，就有万余户搬迁出城。城内大街小巷，不时可见江防营和巡防营的清兵荷枪实弹的巡逻，南京城内的形势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

九镇出防 城内起火

为了策动南京新军起义，各地革命党人也派人到南京活动。10月23日晚，原在第九镇三十三标任过管带（营长）的柏文蔚，从上海来到南京，向第九镇正参谋官（参谋长）沈同午、十七协协统孙铭、管带钟毓琦等人陈以民族大义，希望新军能起义反清；武汉革命党人也派原第九镇马标的排长苏良斌回南京秘密活动。第九镇的一些中级军官还拟定出起义计划，准备以工兵、辎重两营占领饷械局，夺取弹药，马标袭击江宁将军署，三十四标袭击两江总督署，三十三标包围劝业场的清兵防营。由于九镇统制徐绍桢担心腹背受敌，以时机不成熟为由而没有采纳。

面对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和第九镇官兵的革命情绪，张人骏、铁良、张勋等人感到如坐在火药桶上，他们担心第九镇部队驻在城内，一旦起义将防不胜防。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将第九镇部队调出城内，驻防于离城30多公里的秣陵关。为了进一步防范新军，张人骏在给江防、巡防营增发弹药（每个士兵500发子弹）的同时，扣发新军的弹药。徐绍桢在接到移防的命令后，曾三次请求发放弹药，可张人骏只批准发给新军士兵每人3发子弹，并将新军的6门德国造克虏伯山炮收回，转交旗营使用，将6挺马克



沁式机关枪收回入库。这一对旧军和新军不同的待遇，使得第九镇官兵大为愤怒，反清思想益坚。

10月30日，第九镇部队移防秣陵关，张人骏等仍不放心，派出江防营部队在距秣陵关10多公里处驻防，以防御新军，同时每天派出侦探到第九镇驻地刺探军情。更有甚者，铁良的亲信、南洋宪兵营管带桂城竟企图行刺徐绍桢，被当场抓获。消息传开，广大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起兵举事。此时，上海、苏州、常州、无锡相继光复的消息传到兵营，给了广大官兵以鼓舞，徐绍桢遂决定顺应历史潮流，率部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联系，以求得弹药的援助，一面召开各团队指挥官会议，布置行动计划。

正在此时，南京城内的一把大火，打乱了第九镇的行动计划。11月7日晚9点多钟，埋伏在城内的苏良斌派人送信给徐绍桢，说已密约巡防营、督署卫队营士兵半夜起义，请第九镇部队攻城接应。徐绍桢对这一消息未辨真假，加之时间仓促，而且大部队调动已来不及。就未采取行动。8日凌晨3时，苏良斌等人在南京城内四处纵火，督署卫队和防守汉西门的巡防营士兵随即起兵响应，上元、江宁两县狱中的囚犯趁机越狱，顿时南京城内火光四起，枪声大作，一些起义士兵在楼房上遍插白旗，甚至将白旗插到两江总督的衙门里。张人骏、铁良在睡梦中惊醒，吓得惊慌失措，张勋则有一些军事经验，他从枪声中判断起义士兵不多，而城外第九镇部队又没动静，便调集江防营部队，用机关枪向起义士兵扫射，将起义镇压下去。这一夜，起义官兵死伤100多人。张勋立即

紧闭城门,大肆搜捕,城内一片恐怖。

苏良斌的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吓坏了清朝的文武官员。当时弃官潜逃的清朝官员有: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江宁交涉司汪某、江宁盐巡道兼金陵关监督徐乃昌、江宁劝业道李哲浚、江宁府知府杨钟义、上元县知县唐树概等数十人。

义军攻城 悲壮失利

南京城内起义失败以后,秣陵关第九镇在不知消息的情况下,决定按原计划起义。按照原定的计划部署,第九镇以第三十六标第三营(缺一队)、马标第一营(缺一队)为右路纵队,向通济门进击,进城后占领两江总督署;第三十三标第三营、马标第三营为左路纵队,经铁心桥、安德门向汉西门进击,进城后占领清凉山和炮械局;以第三十四标部队为主的中央纵队进攻雨花台。由于第九镇官兵的子弹绝大多数被张人骏收回,而上海制造总局接济的子弹又未到,故将各标营打靶剩下的子弹集中,参加攻城的士兵每人分到5发,其它部队虽无弹药,也扛着空枪随中央纵队进发,以壮军威。

8日拂晓,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第九镇官兵排列整齐的队伍,呼喊着重“兴汉灭满”的口号,迎着晨风向南京城挺进。中午11时,各路纵队到达距花神庙不远的一条河边时,立即分散行动。中央纵队的骑兵继续向花神庙前进,半路上遇到从城内逃出的起义士兵,骑兵队长李铎没有详细询问,误以为城内起义已经成功,命令部队沿大道跑步前进。驻守在雨花台的清江防营立即开炮轰击。这时,第九镇的三路纵队齐头并进;三十三标的部队通过姑娘桥,向望江矶一线展开,三十四标也向双哑巴树一线进击,设在石马村的起义军司令部与前方失去了联系,三个纵队互相之间也不通音讯,只好各自为战。下午5时,这次起义的总指挥沈同午得到情报,说虽然城内苏良斌的起义已经失败,但仍有一支炸弹队埋伏城里,准备与攻城大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他派出传令兵命令各纵队全线出击,进行夜袭。

晚7时许,中央纵队向雨花台方向发起冲锋,清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起义军的队伍中,但义军士兵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前面的刚倒下,后面的就紧跟上去。当部队冲到离雨花台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时,士兵的5发子弹早已用完,只得隐蔽在田埂后。9日凌晨2时30分,中央纵队组织了敢死队,他们利用清兵装子弹的空隙时间,匍匐前进。至雨花台下时,敢死队员脱光了上身衣服,乘着黑夜的掩护,一边扔

手榴弹,一面向山坡上冲。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幕中,敢死队员一度攀上雨花台东峰,插上白旗,并徒手夺得两挺机枪,终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又被清江防营夺回阵地,几十名敢死队员壮烈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雨花石。

在激烈的战斗中,虽然第九镇官兵作战英勇,战术灵活,但由于没有弹药,部队分散行动,无法配合,所以伤亡惨重。除中央纵队外,左、右两个纵队的进展也不顺利。9日天亮时,战斗局势已经明朗,攻城无望。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沈同午下令全线撤退。在浓浓大雾的笼罩下,攻城的起义部队相继撤出战场,向镇江方向退去。这一仗,第九镇官兵伤亡数百人。

江浙联军 直下金陵

攻打南京城失利之后,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立即东去上海;与同盟会上海总部和各地革命党人驻上海的代表会商。当时全国的形势较为复杂,一方面,不断有新的省、市宣布独立,就全国而言;革命党人的力量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武汉危急,被清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玩弄反革命两手,在用北洋重兵围攻武汉的同时,又派代表到武昌进行和谈的试探。武汉的起义军队在黄兴的率领下正苦苦支撑。由此,上海都督陈其美主持会议,分析了全国形势。会议认为,南京是南方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如革命党人掌握了南京,就可以把江浙皖赣鄂和长江两岸连成一片,可解武汉之危。拿下南京与解武汉之危的关系,如同粤军参谋长犹龙所说:“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组建江浙联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金陵。

11月15日,参加会攻南京的各路人马齐聚镇江,计有苏军刘之洁部3000人,镇军林述庆部3000人,浙军朱瑞部3000人,沪军洪承典部1000人,粤军黎天才部600人,南京第九镇第十七协约5000人,加上柏文蔚的淮军2000人和徐宝山的扬军2000人,总共约2万人马。正在围攻武汉的清海军“镜清”、“保民”、“楚观”等14艘舰艇,在宋文翔、陈复等人率领下,顺江而下来到镇江,投奔革命党人,使得会攻南京的联军水陆并进,军威大振。

得知革命军大兵压境,清府官员、士绅纷纷打点细软,出城逃命。清廷和袁世凯却把固守南京的赌注押在张勋身上,袁世凯在给张勋的电报中,要他坚守

南京,“东南半壁,悉赖我公”。张人骏、铁良、张勋等决定死守南京,以江防营和巡防营为主力,在南京城内外各要点设防,同时派人赴北京告急,请求援兵。张勋布防的要点是:以炮兵占领制高点,威胁江浙联军进攻的通道,同时在各城门和要道的重要地段驻扎重兵。张勋在雨花台驻了两个营,在富贵山驻1个营,在狮子山驻两个营,在清凉山驻两个营,土桥口驻3个营,尧化门外驻3个营,朝阳门外驻两个营。为了控制江北,准备守不住时逃跑,张勋在浦口驻扎了3个营的江防军。张勋自以为这样的部署,南京城就固若金汤,准备仗仗地形和武器的优势与革命军大战一场。

11月20日,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战斗打响了。为了切断张勋逃跑的退路,联军司令部首先派镇军和扬军的两个营渡江进攻六合。22日,浙军朱瑞部进击麒麟门,与张勋江防营交战,战斗十分激烈。此时,清军在乌龙山、幕府山的大炮不时发射炮弹,威胁着前进中的联军部队。乌龙山炮台离城约60里,靠近长江边,有二十一英寸大炮两门;幕府山炮台离城约10里,可以炮击到尧化门。曾任幕府山炮台军官的同盟会员官成鲲联络了两台的一部分官兵,将炮栓拆下收藏。24日夜,粤军和浙军游击营乘军舰在乌龙山麓登陆,炮台内起义士兵开栅内应,一举占领炮台。第二日,粤、浙两军继续配合,激战数小时,攻占幕府山炮台,使清军失去城外两座堡垒。同时,驻守在下关江面的清水师十三营的40艘战船毅然起义,下关东西两座炮台也归向革命军,使张勋失去了江防。

江浙联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战场形势大为改观。革命军用幕府山的大炮向仪凤门、太平门的守军猛轰,张勋在城内的指挥部北极阁及两江总督署,也不时遭到大炮的轰击。11月25日拂晓,浙军先头部100余人在马群与清兵数千人相遇,陷入重围,正午时分,浙军大队赶到,与清兵混战。下午4时,浙军攻占孝陵卫,击毙清兵千余和张勋的得力助手、巡防营统领王有宏。26日,江浙联军全线出击,苏军刘之洁部由淳化镇进攻上方镇,下午占领高桥、龙桥,翌日晨攻占七桥瓮和上方镇;扬军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海

军协同作战,炮轰浦口和狮子山炮台,使下关与浦口交通断绝;浙军朱瑞部和沪军洪承典部击退张勋的反扑,击毙清兵数百人,进至朝阳门(今中山门)外。战至此时,守城清兵基本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但城东的天堡城炮台,仍对联军构成威胁。

天堡城位于东郊紫金山第三峰(今紫金山天文台所在地),城高险陡,张勋在此驻扎江防军一营和机枪4挺、重炮10余门。联军以镇军、浙军、沪军围攻天堡城,激战数日,死伤众多,仍未攻下。11月30日,浙军组成近200人的敢死队,冒雨强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于12月1日攻克了天堡城。这一仗,联军伤亡了数百人,山上山下,到处可见尸体。镇军管带杨韵珂事迹尤为感人,他身中枪、炮弹,伤40余处,临终前高呼:“不夺此要塞,不要收殓我尸”,死时年仅30岁。同日,苏军也攻占了雨花台,将清兵压至城内,团团围住。

张人骏、铁良和张勋知败局已定,遂请美国领事和鼓楼医院院长、加拿大籍马林出面,要求联军允其出城。江浙联军命令守城清兵全部缴械投降,张勋所掠公款80多万银元必须全部交出,否则将于12月2日中午发起总攻。12月1日晚,张人骏、铁良在下关乘上日本兵舰,狼狈不堪地逃离南京,住进了上海租界。张勋则率领残兵2000余人,出汉西门经大胜关渡江逃往徐州。2日,江浙联军发起总攻,攻城部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苏军自雨花台入南门,镇军自紫金山入太平门,粤军入仪凤门,其他部队也相继入城。3日,浦口被扬军攻克,南京完全光复。

×××××

光复南京之役,震动了全国,解了武昌之危,促使政治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党人方向转化。12月14日,已经独立的10多省的代表齐聚南京,商讨组织中央政府事宜,于29日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乘专列由上海来宁,在总统府(原两江总督衙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城的光复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霁明)



黄兴举兵

讨袁经过

南京大学历史系 陈谦平

黄兴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之一。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是同盟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军事领袖。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南京留守和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他后期的革命活动多半以南京为重心。值此辛亥革命爆发80周年之际,仅将黄兴于二次革命中在南京发动武力讨袁的前后情况略作叙述,以缅怀这位为推翻封建王朝、创立共和立下显赫战功的革命先烈。

一、出任留守 暗中积蓄力量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正式解体。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按照袁世凯赋予的职权,南京留守仅是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善后机关首脑,他企图通过黄兴之手,将南方革命军队裁撤遣散。但同盟会却把这一职务看成是保存革命军事力量的有效方法。

作为同盟会的军事领袖,黄兴何尝不想完整地保留南方革命军并增强其战斗力,然而,南方军队的状况和留守府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使其终不能有所作为。

当时,南京的军队号称30万(实际上只有10余万),仅军长就有7人,师长36人,旅长51人。许多部队空挂番号,徒有虚名。北京临时政府为了扼杀南方军队,一分钱军费也不给南京留守府,谭人凤曾亲赴北京向袁世凯索饷,袁世凯一推了之。欠饷成为黄兴整编军队的最大障碍,并导致驻扎在南京地区的10余万军队的不稳定。4月11日,赣军第7师俞应麓部一个旅因欠饷而哗变,士兵冲出军营,在唱经楼、北门桥一带大肆抢劫商店和住户。后经第3军军长王芝祥派兵,及时镇压了兵变。

黄兴此时正在上海,闻讯后连夜赶回南京,并严厉处分了参与兵变的官兵,其中有200余名变兵被

处死,该旅亦被遣散。这次兵变对黄兴的刺激很大,使他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性。他屡次要求北京拨付军费,在军饷屡催不到的情况下,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氏诡计多端,一面迭电挽留,但仍拒不发饷,南京的兵变正合他意,他就是要借此搞垮南京革命军队,使黄兴身败名裂。

兵变与缺饷加快了黄兴裁军的步伐。他确定了改编与遣散两大原则。凡革命意志旺盛、战斗力强的部队,予以改编充实;凡军纪涣散或严重缺员的部队,则予遣散。从而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

为了保存革命军的实力,黄兴又以湘、桂军为基础,加入被遣散部队的优秀官兵和精良武器,组成中央陆军第8师。这支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均为留日士官生或保定军校毕业生,而且都是同盟会员,其中高、中级军官大部分是同盟会“丈夫团”成员(留日士官生中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如第8师师长陈之骥,旅长赵恒惕、陈裕时,团长王孝缙、黄恺元等均是丈夫团成员。第8师的武器也有两套,一套分发给士兵,另一套存放在仓库里,以备战时之用。黄兴的意图很明显,要把第8师编练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革命军队。

尽管黄兴已在大刀阔斧地裁撤南京的军队,至1912年6月初,已编遣近10万人,但袁世凯仍指使北洋派军人对黄兴横加攻击,指责他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面对这些攻讦,黄兴十分愤慨,加之他有功成身退的打算,遂于6月14日辞去南京留守一职。

二、刺袁未遂 密谋武装讨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围绕宋教仁,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3月25日,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高级干部在上海黄兴寓所召开会议,商讨宋案处置办法。孙中山、戴季陶等人主张立即起兵讨袁,而黄兴、陈其美

等主张法律解决,黄兴还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暗杀袁世凯,省免牺牲”。由于双方争执不下,遂决定征询地方将领的意见后再作决定。

孙中山、黄兴分别电询广东都督胡汉民和湖南都督谭延闿的意见,并派原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等赴南京联络第8师准备讨袁。但胡、谭均以准备不充分,内部不一致为由,拒绝马上出兵。南京第8师陈之骥、陈裕时也表示,该师由于林虎、陶德瑞两个团分别调往江西和湖南,来不及补充,主张暂缓用兵。黄兴遂主张先补充整备南方各省军队,等待时机发难。

与此同时,黄兴还派黄复生、谢持以及宋教仁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现金3000元赴北京,准备伺机刺杀袁世凯。但因周予觉被捕叛变,使这一行动失败。周之妹周予徽捏造了黄兴组织“血光团”进行暗杀活动的谎言,致使北京高检厅传讯黄兴。袁世凯乘机诬陷黄兴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说宋教仁被刺的前一天晚上,黄兴和宋教仁因争做国务总理而发生争吵,黄兴遂起杀宋之心。至此,黄兴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彻底破灭,便积极策划武装讨袁。

他把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讨袁的主要发动区,以湖北为中心。他先后派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炳坤、宁调元、熊樾山等人回湖北发动军队起事,但因文仲达叛变,湖北起义领导机关为黎元洪破获,詹大悲等因仓促行事而失败。他派汪精卫去广州调和胡汉民与陈炯明的矛盾,使其能团结协作,一致讨袁。他说服卸职后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放弃了出国留学的举动,毅然回赣发动讨袁。他派赵正平往返于宁、沪之间,策动第1、8两师在南京发难。11日夜,当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打响癸丑讨袁第一枪时,南京各高级将领在陈之骥家中决定从速发动。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南京第8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惊慌失措地来到上海的黄兴家中,向其报告说,南京第8师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原来,孙中山看见革命军主力第8师的高级军官迟迟不肯率先起兵,就派朱卓文携款2万元从上海赶至南京,策动第8师中、下级军官,叫他们杀了师、旅长后宣布独立。孙中山此举在第8师军官内部造成了恐慌。一些营、连长向王孝缜、黄恺元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主张先发制人,杀掉那几个受了策动的营、连长。王、黄均是黄兴的心腹将领,他俩认为若内部自相残杀,必使第8师发生分裂,削弱这支黄兴亲手创建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武装讨袁的强烈倾向,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立即

举兵。于是,他俩于12日夜登车赴沪。

王、黄对黄兴说,现在事已至此,虽然准备不足,也得树起反袁大旗了。不过,他们向黄兴提出了一个条件,这就是请黄兴去南京就任讨袁军总司令。但孙中山在这时千万不要赴宁,等到南京独立稳固之后,再请孙去组织政府。

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前往南京,亲自统率部队,“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黄兴立即往见孙中山,说服他不要亲赴南京,表示自己愿意代替他在南京举兵讨袁,待创立较好的局面后再请孙前往主持。同时,他请孙中山留在上海督促陈其美迅速占领上海机器制造局,以军火和财力支援南京。孙中山同意了黄兴的主张。

三、驰骋沙场 壮志未酬犹荣

7月14日晨,黄兴携款5万元,以游览为名,乘火车赶赴南京。当夜即在李相府的陈之骥住宅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第8师师长陈之骥外,还有苏军第1师师长章梓、第3师师长冷遁、前第7师师长洪承典、前第1师师长陈懋修、江宁四路要塞司令官吴绍璜等。黄兴首先列举了袁世凯的罪状,然后就讨袁征询各将领意见。章梓、陈之骥、冷遁、洪承典等人均表拥护,唯陈懋修、吴绍璜二人大加反对,并扬长而去。

陈、吴二人以及南京讲武堂副堂长蒲鉴均暗通袁世凯,尤其是吴绍璜手握兵权,为防止不测事件发生,章梓当即派兵一排,包围了位于娃娃桥的吴宅,将吴绍璜枪杀在家中,陈、蒲等人亦被逮捕处决。

同时,章梓派人切断了江苏都督府的电话线,并派第8师士兵进驻,控制了局面。一切就绪后,黄兴于15日晨亲赴都督府劝说程德全独立讨袁。

程德全从睡梦中惊醒,见形势与己不利,乃假惺惺地说:“袁世凯不法,天下之公愤,江苏何敢独异?今公等骤然起事,幸甚、幸甚!”黄兴是个笃诚君子,仍要程任江苏都督,自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但章梓等人已看出程德全心怀贰志,乃将其软禁在都督府西花园内。程德全多次托人向黄兴疏通,请求准其赴沪就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告诫黄兴:万不可放此人离宁去沪,最好快刀斩乱麻,将其处死,以免为后患,破坏讨袁大事。但黄兴自认为南京和各省讨袁均已部署完毕,程氏赴沪当不致有太大危害,竟于18日允许程德全前往上海。

黄兴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后,即发表讨袁通电,阐述此次南京举事目的“惟在倒袁,民贼一去,即当解

甲归农；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存权利之想，神明殛之”。不久，又发表对外宣言，指出此次讨袁“惟在保障共和，维持人道，因此牺牲一切，亦所不惜，此次起义，并非新旧战争，更非南北决斗，除推翻欺陷我民付托之民贼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并告诫外国银行团不要借钱给袁世凯。

黄兴还以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提出全面的讨袁计划，主要包括：（一）令冷遁、柏文蔚率军固守徐州、临淮关等地，遏止袁军南下，并以第1、8两师派有力部队北上增援；（二）令陈其美等在上海发动起义，攻占制造局和吴淞炮台，接济江苏军火，阻击袁军进入长江；（三）令李烈钧控制九江，固守湖口，以防袁军顺江而下，威胁南京；（四）令胡汉民、陈炯明控制珠江要隘，以为讨袁军后援；（五）策动宁波顾乃斌旅独立，增援上海；（六）派人员赴豫、陕等省发动起义，使袁世凯后顾之忧。

南京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中心，南京的独立与讨袁，促进了南方各省独立与讨袁的发展，使二次革命得以迅速兴起。

为防止北洋军队南下，黄兴命令冷遁坚守徐州，并派第1师旅长周应时和第8师骑兵团长刘建藩各率一个混成支队北上增援第3师。但冷遁操之过急，既不等南京的援军到达，也不待第3师全部集结，就于16日向北洋第5师方玉普旅发动攻击，占领利国驿，围攻韩庄，但北洋第5师援军、张勋武卫前军以及田中玉巡防营的先后增援，迫使孤军作战的第3师于18日退出利国驿。19日，刘建藩部和周应时部先后抵达前线，并向袁军反攻，将其赶过大运河。

22日，北洋第4师抵达前线，加强了袁军实力；同时，张勋部绕道台儿庄进袭徐州，威胁讨袁军侧背；加上讨袁军第3师骑兵团长张宗昌等部倒戈，投向冯国璋，致使讨袁军全线崩溃，于24日丢弃徐州，退往蚌埠。

与此同时，各地讨袁军进展亦不顺利。上海直到17日才宣布讨袁，但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战斗力较弱，南京方面不得不派刘福标福字营和赵念伯旅一个团开赴上海增援，但上海讨袁军仍于23日放弃进攻制造局。上海讨袁的失利，不仅使南京得不到军火

援助，而且危及已独立的江苏各城市。蛰居上海的程德全果然于25日公开站出来否认江苏独立，并策动苏州、镇江等地取消独立，同时，程德全利用自己的影响，向南京施加压力。另外，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战事方面亦失利，南京北、东、西三面受敌。

徐州失守后，讨袁军将领意志消沉，对讨袁战争的胜利信心不足。第1、8师援军奉令撤回南京，第3师则军心涣散，大部退往浦口，向袁军接洽投降，师长冷遁脱离部队。

黄兴在南京一筹莫展，讨袁军高级将领悲观情绪深深影响着。遂于26日发表声明，表示引退。

同日，程德全致电黄兴，要他“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并密电南京卫队营长张朋嘉逮捕黄兴。张朋嘉将程的密电拿给黄兴看，黄兴见败局已定，悲愤万分，一度企图自杀。江苏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等发现了黄兴的意图，乃日夜守候在黄兴左右，并劝他离开南京。

28日夜，黄兴由黄恺元等人陪同，登上了停靠在下关的日轮静冈丸。陈之骥等赶来送行时，方知黄兴身无分文，于是，众将领临时凑集了70块银元交给黄兴作旅费。黄兴此时还叮嘱陈之骥维持南京秩序，免受乱兵蹂躏。汽笛一声长鸣，黄兴伫立船尾，眼含热泪告别了南京。

黄兴乘日轮抵沪后，因无法上岸，遂随静冈丸避居日本。黄兴离宁后，三军无主帅，一片混乱，江苏都督府参谋长章梓、第1师师长洪承典、第3师师长冷遁亦相继离去。第8师师长陈之骥、第1师代师长周应时等通电取消江苏独立。后来，虽然第1、8两师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不满陈之骥等所作所为，在何海鸣等人领导下数次宣布南京独立，并为保卫南京城而展开浴血战斗，但终因实力悬殊而归于失败。

（责任编辑 海鸣）

附告：本刊1992年即将收订，全年订价7.20元。从明年第一期起将连刊清代《金陵四十八景图》珍贵画页。

今年第六期正逢创刊八周年，将发特大号，价格不变。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始末



孙中山像

一、临时政府成立前的风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全国震动,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但是,清政府仍在苟延残喘。革命营垒里的各派势力都希望尽快建立足以与清廷抗衡的中央政权,以便统一和协调独立各省区的政治、军事行动,共同对清王朝进行斗争。于是,筹建中央政权的问题就迅速摆到议事日程上。

当时主要的地方势力派有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他们都力争取得对临时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前者想利用武昌首义的政治地位,建都武昌,执掌中央政权的牛耳;后者则想凭借他们的实力地位,以他们为主体来建立和控制中央政权。这就使得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正当湖北、江浙集团为组织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争得不可开交时,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到达汉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崔之清
胡臣友

口,使这场斗争更加复杂化。和平攻势与军事压力是袁世凯交互利用的反革命两手。此前,袁世凯就进行过和平试探,汉口各省代表会议曾议决同意举行南北和谈,决定将推倒清廷、实行共和等作为和谈条件;为了争取袁反戈一击,推翻清政府,议决“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袁世凯在攻占汉口、汉阳后,再次进行和平试探,胁迫革命派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抵达汉口后,向武汉方面表示袁内阁赞成共和,唯须俟国民会议议决,即可敦促清帝逊位。当时,汉口、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正齐聚南京开会,准备选举临时大总统,得到这一消息后,代表会议遂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转而承认上海的方案,仍由黄兴任大元帅,暂行总统职权。妥协刚刚达成,江浙联军却不买帐,声称不愿受“汉阳败将”黄兴的指挥,希望由黎元洪当大元帅。代表们于是再选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不肯接受,临时政府陷入难产。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孙中山回国,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二、临时政府的组织机构与纲领政策

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归来,从而,组建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中央临时政府的使命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他的肩上。26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同盟会领导人会议,讨论临时政府的政体问题,最后议决采取总统制。

12月29日,各省代表(17省近50名代表)在南京原咨议局举行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依法当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成立后,修订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由各省代表一致通过的《组织大纲》。1月3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了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由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佑任。从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名单看,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陆军、外交、教育三个部,其他为立宪派或旧官僚,这主要是为了争取和团结革命阵营中的各派势力。同时,为了保证革命党人顺利地执掌临时政府的实际权力,同盟会规定“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各部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而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这些人掌管的部务均由次长代理。因此,临时政府一时有了“次长内阁”之称。

在各部之外,临时政府还设置了若干局,有法制局、印铸局、公报局、稽勋局、铨叙局等,归大总统直辖。总统府内还设有秘书处,以胡汉民为秘书长,下设总务、军事、外交、民事、电务、官报、收发七科,任职者基本上都是同盟会员。除秘书处外,还设有参谋部,黄兴为总参谋,钮永建为副参谋。

关于立法机构,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各省代表会议即已议决,根据《组织大纲》,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三人来宁组成。参议员未至以前,每省暂留代表一至三人,驻宁代理其职权。1月28日,召开了临时参议院成立大会,各省参议员到会者43人,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占33人,基本上可算是一个以革命党人为主的立法机构。

关于司法机构,临时政府成立后,一直没有成立独立的司法机构。《组织大纲》亦未对司法机构作单独、具体的规定,仅规定“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但中央审判所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尚未设立。尽管如此,但毕竟选举了总统,设立了行政各部,成立了参议院。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组织机构基本确立。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否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国家体制的根本变革。从此,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南京临时政府是“革命时代之政府”。孙中山在他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

志愿。”规定了施政方针,对内要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对外要洗雪清朝政府的“辱国举措”,“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颁布了不少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近代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法令。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禁止对犯人进行体罚;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解放“贱民”,允许他们享有“公权”和“私权”;严禁买卖人口,禁止蓄奴。在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蓄辫、缠足、赌博。凡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废除以“大人”、“老爷”相称的官场恶习,政府内一律改以官职相称,社会上则改称“先生”或“君”;废除排场、仪仗,一律轻车简从;废除官僚式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实行低薪制等等。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宣布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中央设实业部,各省设实业司,对各项实业竭力筹划。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承认和保护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和经营活动,废除清代的一切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学部颁布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国宗旨”,禁止小学读经,增加自然科学、实业、实用知识方面的课程。允许男女同校等等。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时代要求。

三、临时政府的政权体制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根据《组织大纲》的规定,采用了总统制,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起中央政权。在政体问题上,孙中山之所以采取总统制,而不取责任内阁制,是因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

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负有实际的政治责任,权力很大。从行政系统看,孙中山作为大总统,拥有法定的统治全国和统率海陆军队的最高权力。总统下属各部掌理各部所辖事务,协助大总统处理各项行政事宜。特别是黄兴兼任陆军总长和总统府参谋总长,职权特重,裁决诸事,成为综理各部要政的核心人物。孙中山和黄兴直接领导着临时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各项工作。

就总统与司法权之关系看,临时政府最初没有

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据《组织大纲》规定,临时大总统以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兼有设立司法机关的权力,作为行政系统的组成部分。直到后来《临时约法》公布,法院才被规定为独立的权力机构从行政部门中分离出来。

从总统与立法权之关系看,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目的,旨在使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约以避免独裁。孙中山考察美国政治后认为议院往往擅用其监督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之不得不俯首听命,成为议院专制,因此,他主张监察机关独立,议会不掌握对总统的监督权。但临时政府中,独立的监察机关没有建立,临时参议院又没有对大总统的监督权。这实际上突出了总统权力。从立法程序看,凡属重要法制,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等,由法制局编订,也有一些法制条文由行政各部草拟,再呈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咨请参议院议决。参议院议决后,再咨复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这里无论法制局、内务部、司法部均属行政系统,法制局更由大总统直辖。总统(府)实际参与立法,并具有重要影响力。

可见,临时政府建立的是一个不完全的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政体,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没有完全分立,总统有着极大的权力。如前所述,这是由当时中国具体情况决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领导、统一政策,以集中力量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3月11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完善了三权分立的体制,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修改了政府组织形式,确定了国体,并规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它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根本大法,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

《临时约法》规定设立国务总理,把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专门设置了“国务员”一章,明确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对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样,国家的行政权力从大总统移至由总理及各部部长组成的内阁手中。

在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上,《临时约法》增加了“法院”一章,并赋予独立的权力,这就使临时政府三权分立的建制更加完整,表明《临时约法》对于《组织大纲》的重要发展和进步。它修改了《组织大纲》中大总统可以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的权力,完成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是政治体制上的重大改进。

对于参议院的职权,《临时约法》也作了很多补充,如参议院对于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制定官制官规、宣战、媾和和缔约、宣告大赦等有决定权。更为重要的是,《临时约法》规定了参议院对于大总统和国务员的弹劾权力。另外,还规定了参议院有权受理人民请愿、质问国务员、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等等。这些权力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参议院的职权,并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削弱并牵制了总统的权力。

《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有限制袁世凯专权独裁的良苦用心。

四、临时政府的天折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时候起,就遭受内外各方面的压力,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和困难。

临时政府把争取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作为首要目标,承认和履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债和其他丧权辱国的条件,幻想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承认。但是,列强害怕革命成功将危及它们在中国的半殖民统治,更恐惧革命在国际上引起连锁反应,推动东方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引起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崩溃。因此,列强十分仇视南京临时政府,千方百计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政治上,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别有用心地宣传西方民主自由学说不适合东方国情,诬蔑革命使中国“遍地皆陷于无政府之景象”,攻击孙中山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则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表示只有在袁解决“南北争端”之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胁迫革命党人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财政上,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封锁和扼杀。当时,临时政府财政严重拮据,列强故意扣留独立省区的关税,以加重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而对于清政府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关税,却任其继续流入袁世凯的金库,化作扑灭革命的费用。

临时政府还遭受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她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中央政府,但其权力并不能推行于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控制的省区。即使在革命派掌权的地方,也往往各自为政,不完全服从临时政府的号令。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同盟会,早已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起不了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不少革命党人蜕化变质,贪恋、追猎个人权位,和立宪派、旧官僚相互勾结,从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和拆台活动。对临时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们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当临时政府

准备以国内大企业作抵押,向外国举借贷款时,他们立即借题发挥,蛊惑人心,或对临时大总统进行恶毒攻击,或宣布辞职以示抗议,有的甚至扬言倒戈联袁,推翻全局。

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双方在上海和谈,立宪派、旧官僚和部分革命党人力主妥协,南北双方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政体问题。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马上反扑,借口唐绍仪“越权”,中断和谈,并授意北洋军领通电“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必誓死抵抗”,并扬言要“以铁血解决政体”。帝国主义也出来为袁世凯帮腔,把和谈破裂责任完全推在革命党人身上,并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胁迫孙中山退位。

在列强和袁世凯集团怂恿下,立宪派、旧官僚和失节革命党人加紧拥袁排孙活动。他们公开要求解散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指责孙中山“理想太高”,“贪恋禄位”。汪精卫之流甚至攻击孙中山不肯与袁世凯妥协,是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在内外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白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只要南方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他就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当大总统。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立即布置逼宫。1月26日,原来通电反对“共和”的北洋军将领又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确立共和政体。清朝一小撮亲贵大臣束手无策,只得接受袁世凯提出的优待条件,于2月12日由宣统皇帝溥仪“下诏”宣布“逊位”。第二天,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向南京临时政府索取大总统职位。14日,孙中山提出辞职。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当大总统。

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的独裁野心,把中国纳入近代民主政治的

轨道,提出莫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任职和遵守《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

莫都南京和新总统南下就职问题,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集团之间的最后一战。孙知道袁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特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蔡等抵达北京后,袁表面上盛会欢迎,表示愿意南下就职,暗地里却早已安排好诡计,指使北京、保定、天津等地北洋军发动“兵变”。北京的外交使团也配合行动,决定增调侵略军入京“护卫”。日本首先由山海关和南满调驻屯军,由秦皇岛登陆,向北京推进。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大有八国联军重演的架势。

北京等地的“兵变”事件,吓坏了革命营垒内的妥协势力,迎袁的专使们也受到愚弄,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反而要求临时政府迁设北京。立宪派、旧官僚更是找到了借口,攻击革命派不顾国家安危,固执己见,造成了北方的危机。黎元洪甚至发出通电声言“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致亡”。袁世凯的亲信再次通电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

在内外压力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陷入孤立,只得听任立宪派操纵,在南京参议院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议案。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至此,革命派撤除了最后一道防线,袁世凯终于篡夺了革命果实,建立起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重新陷入黑暗的深渊。南京临时政府也因此寿终正寝。

(责任编辑 海鸣)

南京市人口普查

根据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南京市统计得出几个重要的数字:

1. 全市人口为5168114人,其中男性为2697093人,女性为2471021人,男女比例为109.15:100。市区人口为2678363人。总人口密度为793.17人/平方公里;市区人口密度为2827.34人/平方公里。建邺区密度最高,为31205.71人/平方公里。
2. 家庭户平均人口最多的区是浦口区,户平均人口为3.54人;最多的县是六合县,户平均人口为3.89人。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区是大厂区,为

13.48%;出生率最高的县是江浦县,为23.42%。死亡率最低的区是大厂区,为3.8%;死亡率最低的县是六合县,为5.89%。

3. 每千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最多的区是鼓楼区,千人中有242.68人;最多的县是江浦县,千人中有9.15人。文盲、半文盲(1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区是浦口区,比重为13.99%;最高的县是溧水县,比重为23.68%。

4. 南京市人口民族组成,已识别的民族有43个,除汉族外,少数民族在100人以上的民族依次为:回族、满族、蒙古族、壮族、苗族、朝鲜族、土家族、侗族、藏族、白族、彝族、布依族、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最多的区是建邺区,为15239人;最多的县是六合县,为6437人。

(李素月供稿)

北伐军攻克南京与帝国主义制造的“南京惨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方庆秋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兵败。此时盘踞江苏的“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撕下了“中立”的伪装,把五省军队编为五个方面军,集中江西,企图分三路向北伐军进攻。北伐军移师攻赣,11月8日攻克南昌,孙传芳败逃南京。

1927年1月,北伐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了“攻略南京,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分三路进军:东路军,以第一军为主,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由闽赣分道入浙,进窥淞沪。中路军,以第三、六、七军为主,由蒋介石兼任总指挥,沿江而下,攻略苏、皖,以主力进攻南京。其下分江左军和江右军;江左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宿松、望江进取安庆,协助江右军攻取南京;江右军以程潜为总指挥,出景德镇、祁门,沿九江直下,进取芜湖、南京。西路军,以第四、八军为主,由唐生智任总指挥,自黄陂、孝感沿京汉路北进,以防河南之敌。

北伐军各路按既定作战计划迅速运动。中路军3月攻占安庆、芜湖、当涂,前锋直趋南京。东路军于2月克复杭州后,制定了先截断沪宁铁路线而后进攻上海的作战方略。3月15日由何应钦率领的西线之师大破敌军于戴埠后,进克张渚、蜀山、宜兴、溧阳、溧水、武进、常州、丹阳等地,截断了沪宁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并大破鲁军常之英的援军。由白崇禧率领的东线之师,也于3月16日分左右两翼向淞沪之敌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松隐、松江、苏州,包围了上海,敌残部狼狈向镇江、南京逃窜。何应钦为会攻上海,配合江右军进攻南京,即令“第五纵队攻取无锡、江阴后,向苏州、常熟前进,与进攻淞沪各部会战;第四纵队以一部经镇江、龙潭,以主力经孟塘、汤水镇;第六纵队经白虎、新塘市,向南京前进”。(1)3月22日,何应钦进驻镇江。至此,北伐军各路纷纷趋向南京。南京已处在北伐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仅有津浦一线退路。

是时,孙传芳军大部已退至江北,南京由直鲁联军接防,司令张宗昌在蚌埠、徐州间指挥,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褚玉璞任南京城防司令,企图负隅固守。

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态势,制定了与东路军攻取南京的作战计划。此后数日,江右军第一纵队所部攻克东善桥、铜井镇、江宁镇、陶吴镇、秣陵关、龙都镇、板桥镇、淳化镇,江右军第二纵队3月15日克复溧水后,第二军的四、五师于19日推进至石塘和曹村镇以北地区,第六师也集结于洪蓝埠附近。进驻镇江的何应钦,得到敌企图死守南京待援的报告,以东路军攻宁部队仅三个师,兵力不敷分配,又电“请江右军担任紫金山、孝陵卫、苍波镇等处及以西之地”的作战任务。3月23日,江右军于观音山、尖山、幕府山与敌军激战,在雨花台方面打败了敌军,南京城敌军蜂拥退至下关,褚玉璞“逃至下关瀛洲旅馆”,其所部官兵争相北窜。当晚,江右军第六军第十九师占领南京,“敌退江北,溃不成军”。(2)此时,东路军的先头部队也抵栖霞东流镇一线。江右军攻占南京后,武汉国民政府即命程潜为江苏政务委员会主席。3月25日,何应钦也率第四纵队进驻南京。

在江右军占领南京的同一天,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直鲁联军毕庶澄部纷纷向北溃窜,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所部安然进驻上海。国民革命军实现了“攻略南京,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打破了帝国主义“南北分治”中国的新阴谋。于是他们纷纷增派军队和军舰集结于上海一带,采取直接武装干涉的手段炮击南京以期武力威胁、拉拢蒋介石,破坏国共两党合作,绞杀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3月24日上午,当南京人民迎接北伐军入城的时候,国民革命军驻南京军事特派员章杰为表明政治态度,特发布了“第一号通告”,表示“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使是“敌眷属亦应维护,以示平等对待”。(3)但此时,南京秩序未定,城内还有挟枪械的三万名直鲁联军残兵尚未缴械。他们与城内地痞勾结,“打家劫舍,全城惶恐,并及外侨”。(4)英美

帝国主义便以“保护侨民”为名，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舰爱末拉尔特号、美舰诺亚及浚利斯登号，于是日下午3时40分，乘北伐军大队入城“搜索敌人”之时，开炮向我轰击，直接予以逆鲁军之帮助，掩护敌部退却，不惜使出最残酷之手段，发炮百余响，杂以机关枪之射击，一时“死伤狼藉之迹，悲啼号泣之声，遍于市井”。这就是英美帝国主义制造的“南京惨案”。

据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调查，仅在下关一带，军民被炮击死伤者达64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被外炮击毙特务连长1名，士兵23名，重伤7名；老妇死2人，重伤4人，小贩及居民死13人，重伤命危者15人”。(5)另据外交部秘书韦瑟调查报告，3月24日的外舰炮击南京时，城内平民死伤及损失杂物如次：(一)被外炮击死者计18人，其中有住丹凤街50号的许田氏、许王氏；住三皇庙28号的郭阿狗，29号的蔡小五、殷昌胜；住百子亭的陈得山；还有不知名者6人，因卖柴回家途中，在百子亭中弹身亡，均住神策门外。(二)被外炮击伤者计31人，其中有住丹凤街50号的许童氏；住三皇庙28号的许王氏、郭宗有、徐邵明、徐蔡氏，29号的蔡重仪、蔡朱氏；住百子亭前的张陆中；还有涂培芝和住神策门外不知姓名者11人，均因卖柴回家时在百子亭前中弹受伤。(三)被外舰击毁房屋15处，其中有33标营房被击毁14间；小门口农业学校的会计室、学生会客室、事务室、体育室、西洋楼、大会堂、博物室等，均被炮弹击毁；妙耳山玄天大帝庙正殿后墙被弹击倒；三步两桥民人金标住宅被弹击毁一间；省议会后百子亭间落一弹，房屋被毁；东南大学操场落一弹，房屋被毁一处；保泰街升昌办馆后及沿马路房屋被炮击毁数处；铁路东13号、39号住户姜炳奎、萧炳涛两家被炮击毁数处；此外，裴家桥、北极阁、保泰街、竹三湾、戴家巷等处均有炮弹散落爆炸，毁坏楼房、杂物等。(6)

以上系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时，下关一带及城内死伤人数暨损毁房屋杂物的初步调查概况，据称“详确损失当超过此数二倍以上”，(7)远远超过直鲁军“溃兵滋扰”时的外侨损失。

英美帝国主义为掩盖其制造南京惨案的罪责，竟把炮击南京的起因、肇事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污蔑抢劫英、美、日领事馆及外侨者，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的党代表林祖涵(伯渠)、李富春策划下的“有正式服装之民军组织的军队”所为。这点，在“四·一二”公开背叛革命前的蒋介石是

坚决予以否认的。他说：在敌军撤退时，“南京完全是一种紊乱状态，北军毫无约束，总是离间革命军同外人的感情，作国民运动的仇敌”。(8)3月28日，他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又指出：“彼有丰富之证据，证明抢劫及射击外人者，并非国民军兵士，实为着国民军制服制帽之北兵所为。……国民军在宁曾捕获假冒之国民军兵士，所着军服军帽，均为国民军式样，而裹腿布及鞋则北军之式，即此可见北军之诡计矣。”(9)美国人铿耐台民的调查报告也认为：从威廉博士(金陵大学副校长)遇害处拾得的鞋帽等物证明，抢劫外侨者确系鲁军败兵所为。同时，《国闻周报》一署名旅行记者的调查报道也说：北伐军于24日入城不久抢劫就开始了。“其时各政治部人员到者极少，且彼辈多文士，奔驰半日，入城即布置住房办公，尤无顾及外事之余。故谓政治部下级人员之共产党分子为之，吾不能不为西披呼冤也。”(10)由此可见，所谓“南京事件出于共党之阴谋”的说法，实系一种无稽澜言。

南京事件，是英美帝国主义为干涉中国革命一手制造的。在北伐军围攻南京时，英美军舰与领事馆之间已做好了炮击南京的准备。据参与炮击的英国爱末拉尔特号军舰的指挥官致总司令的报告说：北伐军攻城期间，英美军舰与领事馆之间即以紧挨城墙内侧索肯尼大楼上的信号站为连接点，由美国号兵操纵，联系始终未中断。3月24日下午3时37分，“他们发出了立即开炮的信号，这时，爱末拉尔特号和美国的两艘驱逐舰便开始炮击”。(11)惨案发生后，英美等帝国主义继续向中国增兵。据统计，各帝国主义集结于上海的军队，连同所谓“万国商团”、巡捕等武装，已达3万多人；停泊在长江流域和上海附近的军舰共有125艘。他们虎视眈眈，不断地向中国人民挑衅。他们不仅置武汉国民政府的严重抗议于不顾，而且反由英、美、日、法、意五国于4月11日向中国提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什么惩罚、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他们把通牒送交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同时，还分送给蒋介石，要挟他迅速表示“对于前项条件之允诺之意”，否则就要“执取认为适当之手段”了。

显然，南京事件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武力胁迫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叛变革命的一个政治阴谋。他们企图在中国策划一个“反赤运动”，把蒋介石拉过去。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庭曾提请国民党中央注意：南京事件虽是北方军阀的挑拨，但“并不能以之为干涉的口实”。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中间，有许多

孙中山结识蔡公时

江西九江 王宪章



位于新加坡晚晴园蔡公时塑像

1928年5月3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我国军民及外交人员惨遭杀害。时任国民政府特派交涉员的蔡公时先生，在身受日军的残酷凌辱下，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英勇就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儿女的正气歌。

蔡公时所以成为我国现代抗日史上第一位烈士，是与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至今在海内外同胞中传为佳话。

1882年蔡公时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从小就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革命思潮勃然兴起，1902年，蔡公时与同乡爱国志士徐子鸿、张华飞等在市区成立——所学斋，明为讲授儒学，暗中传播推翻清廷，创建共和的革命思潮。不久，即被清廷的地方官吏查闭，并通缉蔡公时等“反清分子”。蔡公时不得不远离故乡，流浪广州卖文度日。

蔡公时自幼练就一笔遒劲的魏体书法，能诗善书、精于篆刻，一时潮人求书者盈门，有洛阳纸贵之势。

适孙中山先生路过广州街头，见蔡公时书法苍劲，仪表堂堂，富有朝气，遂生爱才之情，问蔡公时是愿意做事，还是愿意读书；蔡公时表示愿意读书，孙

灰色态度的人，他们现在已有一只脚站在反革命方面，将来或许两只脚都站过去。因为有这些灰色态度的人，希望帝国主义出来说话，所以英国人才有勇气向我们进攻”。(12)

不幸被鲍罗庭言中，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的进程。不久，蒋介石便“两只脚都站过去”，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此开始了蒋介石在大陆的22年反动统治。

(责任编辑 淑玉)

注：(1)、(2)、(3)、(4)《北伐阵中日记》二档馆藏档案。

(5)、(6)、(7)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编委会编：《革命文献》。

(8)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9)《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

(10)《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11)英国外交文件档案。

(12)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八次会议记录，1927年4月1日。二史馆藏

中山遂资助其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书院。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的中国同盟会。蔡公时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深受启发,即加入该会,成为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并以该会机关报《民报》为阵地,积极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

1905年蔡公时学成回国。越三年,他与反清志士谭石屏、黄兴奉中山先生命,以旅越华侨中的二百名同盟会员为核心,组成中华民军南军开入钦州(今广西)起义,在钦广、上思一带与清兵转战四十余日,因弹尽援绝,退至越南,转道返回江西,以教书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罗大伦、林森、李烈钧、蔡公时等革命党人,奉中山先生之命,到九江兴办教育,组织阅报社,创办“商团”,联络新军,策应起义。是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声炮响,九江率先响应,23日即告光复,成立了武昌军政府驻浔军政分府。蔡公时任保商局长。

当时,江西省会南昌尚未光复,蔡公时奉命秘密赴昌,联络同志,密谋响应,由浔军政府组织兵力,拟于攻打南昌。江西巡抚冯汝霖见大势已去,乃于31日宣告起义。蔡公时任省军政分府的交通司长。

1912年10月,孙中山先生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请,前来视察,与九江的国民党人和各界人士会晤。孙中山先生在欢迎会上说:“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中山先生与一百余会见者合影留念。蔡公时亦参与接待工作并合影留念。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居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1913年李烈钧执行中山先生作出的在江西举行首义的决定,召集旧部,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蔡公时应邀在讨袁司令部工作,袁世凯调遣重兵弹压,敌我众寡悬殊,援军未至,革命军处境极为危急,李烈钧乃派蔡公时晋省磋商军计,旋即赴粤求援,及抵广州,惊闻湖口起义失败。袁世凯缉捕义军甚急,蔡公时乃再度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

1924年奉直战争以后,主政北京的段祺瑞,致电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蔡公时亦随行在侧。孙中山到达天津后,积劳成疾,病情恶化,就医于北京协和医院。凡侍汤药,候起居,以至于总理在京的身后事宜,公时无不亲身参与。

(上接31页)

1986年,高老90寿诞,又是从事教育工作63周年。他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特为庆贺。

正如南师大校长在高老九十寿诞庆祝会上致祝词所说:“63年来,无论是在风雨如磐的旧社会,还是在春光明媚的新社会,无论是身处逆境之中,还是

1928年春,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蔡公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山东特派交涉员等职。

当北伐军三面包围济南时,日本军阀为了维护其在山东的侵略特权,无视国际公法,以护侨为名,悍然派兵占领济南、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并在济南城内滥杀和平居民,袭击外交机构,制造流血事件。

5月3日晚,日军数十人闯入交涉署,以武力威胁蔡公时等承认白天在交涉署门外被流弹击毙的两名日军为署内人员蓄意枪杀,以便制造藉口,扩大武装冲突,蔡公时又正辞严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操流利的日语诘问日军,“此系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战斗单位,有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合理解决,不能以护侨为名、深夜闯入中国外交机关,侮辱外交人员,干涉中国内政,这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所为。”

蔡公时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慷慨陈词,据理反驳,有理有节,日军由惊而惧,由惧而怒,竟将蔡公时等手无寸铁的18名中国外交员工捆绑,剥去衣服,割去耳鼻,恣意凌辱,蔡公时等虽血流满面,痛彻骨髓,仍继续揭露日军的法西斯暴行,日军无计可施,最后将蔡公时等17人(仅一人侥幸逃脱)野蛮地加以屠杀,并销尸灭迹,掩盖罪行。

蔡公时等为国殉难,进一步激发了我国军民同仇敌忾,洗雪国耻的爱国热情。当时,北平、上海、南京、济南、九江等地举行了追悼蔡公时等烈士的活动。国民政府明令于一星期内全国各地集会为在《济南惨案》中被害之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及士兵、民众静默3分钟致哀。

蔡公时夫人郭景鸾女士奔走海外,捐募巨款,铸造了蔡公时烈士铜像,因抗战爆发改立于新加坡晚晴园。

晚晴园亦称孙逸仙别墅,即孙中山先生纪念馆,星洲华侨视之为东南亚的中国国民革命纪念胜地。别墅院内花坛石台上,巍立着孙中山先生铜坐像,门楼内则竖立了全副戎装的蔡公时烈士的铜立像。他俩生前为战友,死后为良伴,数十年来在晚晴园内慈祥地注视前来瞻仰的海外华人,提醒他们毋忘祖国,振兴中华,并期望海外赤子与彼国人民和睦相处,兴旺发达。海外同胞在晚晴园内拜谒二公铜像时,无不称赞孙中山先生慧眼识英才,蔡公时是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

(责任编辑 淑玉)

春风得意之时,高老都是坚持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在我国心理学园地勇敢地开拓,辛勤地耕耘……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材。高老不愧为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名字将载入我国心理学的史册。”

(责任编辑惠兰)



宋庆龄关注叶恭绰

胡明华

在南京中山陵东边二道沟北的梅岭上，有一座五米见方的正方形亭子。亭高约6.7米，屋面盖蓝色琉璃瓦，亭内是磨石子地面，所有柱、梁、檐、椽、栏杆、藻井等，都绘有色彩绚丽的彩画，整个建筑雅致而秀丽。——这就是由叶恭绰先生捐建的“仰止亭”。在亭子西侧约二、三米开外有一由花岗石围砌的墓地，长方形墓碑上的碑文为“仰止亭捐建者叶恭绰先生之墓(1881——1968)”。说起仰止亭及叶恭绰先生的安葬，还有段与宋庆龄有关的故事。

叶恭绰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字誉虎，号遐庵，原是前清重臣，继而又成为北洋“交通系”骨干，但他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拥护孙中山统一中国、振兴中华的主张。民国元年，袁世凯给孙中山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名义，当时担任交通次长的叶恭绰曾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划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建全国铁道网，被孙中山赞誉“英俊有为”。1922年，叶恭绰被迫辞去交通总长东渡扶桑，孙中山认为他从事交通建筑多年，是难得的建国人才，故聘叶为广东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叶恭绰遂与孙夫人宋庆龄相识。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又曾任铁道部长、北京国学馆馆长等职。1929年6月，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到中山陵后不久，叶恭绰写信给陵园管理委员会，要求个人出资捐建“仰止亭”，以表达他对孙中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仰之情。1930年9月，他亲自选定二道沟荷花池北面山坡，作为其建筑“仰止亭”及布置梅林的地点。经孙科主持的陵园管理委员会会议讨论同意后，破土动工。1932年秋天“仰止亭”落成，成为中山陵园中唯一的由个人捐建的纪念性建筑。宋庆龄对此十分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深明大义，追求光明，冒险从香港返回大陆，参加新政权的建设。曾任全国政

协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文革”开始后，这样一位不断进步、可敬可佩的老人，竟被扣上“封建余孽”、“袁世凯和蒋介石的黑干将”的帽子，受到冲击，陷入困境。一些涉世不深的红卫兵要抄叶恭绰的家，幸被周恩

来制止。宋庆龄得知有关情况后，心中极为不安，立即派秘书前往北京东四灯草胡同30号叶恭绰家看望，并送去200元钱，作为对孙中山部属的抚慰。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叶恭绰深受感动，他老泪纵横地说：“孙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不能收，因为孙夫人也是靠工资生活，并没有财产。”叶夫人认为宋庆龄一片诚心，却之不恭，年愈八旬的叶恭绰用微微发抖的手接过钱，激动地对宋庆龄的秘书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希望死后能埋在仰止亭，在九泉之下也能看到孙中山先生。这个意思，请你转告夫人。”

宋庆龄听完秘书报告后，欣然同意叶恭绰的恳求，并给他写了复信。1968年8月，叶恭绰先生以87岁的高龄病逝。由于宋庆龄的安排，他的骨灰得以运到仰止亭边安葬，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

(责任编辑 霁明)

(上接19页)

另外，符合张孔二妃的魅力。陈后主宫中美女上千，当隋兵打来时，他别人不顾，只拉着张、孔二人，一起躲进景阳楼边的枯井中，足见张孔二妃姿色不凡。特别是张丽华，“发长七尺，发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顾盼，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建康实录》象杨广这种喜好声色的人，怎不神迷心醉，魂荡魂摇？连占为己有还来不及，怎会下令斩她？而高颎为一代名臣，以天下为己任，才敢说敢作。《六朝事迹编类》中谈到斩二妃这事，还特地加了一句按语：“应以北史为正。”



张学良倡导士兵识字教育

沙兰芳

从1922年起,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在国内掀起平民识字运动,先在长沙、南京、杭州、武汉等地试验,成绩均佳。平民识字教育运动波及全国,亦影响东北三省。这时,张学良已成为东北军的青年干部中坚,由团长到旅长,直奉二次战争之后升为军长,名气很大。

张学良很爱护士兵,他看到旧中国的士兵,大多数未受教育,连做一个公民最低限度的知识、技能和道德都缺乏。又受到平民识字运动的启发,认为中国士兵亦应人人识字,人人有相当的知识,人人应有道德的训练。士兵应与全国工人、商人、农民一样,需要施以教育。这种教育和军事训练是不同的,主要提高文化素质和进行人格的训练。因此,于1924年4月致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长晏阳初,请他们前往东北推行士兵教育。

晏阳初与平教会同仁对张学良的邀请非常高兴,认为很受启发;认为应该开辟平民识字教育的新园地——士兵教育。平教会立即接受了这个邀请。并在去东北之前,作了三个月的准备,吸取了浙江嘉兴香山中学运用的幻灯教学的经验(这是我国幻灯教学的开始)。即请了专门研究哲学、美术、国语教育的学者,合组编辑部,按《平民识字课本》四册书,制作了100架幻灯(又一说为60架),500张幻灯片,共75箱,运往东北士兵驻地。先在26、27两旅进行士兵识字教育试验。

开办之前,在张学良的主持下,成立一个士兵识字最高委员会。

接着在士兵中进行文盲调查,以150人为单位进行抽查,结果仅有25人能读能写,并大多系官佐。于是在两旅中,选拔文化水平较高的350个(又一说为300个)官佐,为识字教育的教师与助理教师。但这些人,过惯了军队生活,对教学从未问津,如何进

行教学活动,根本无从捉摸。张学良就请平教会同仁帮助训练一周,讲解教授理论及教学方法的示范。于是年7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

识字班的形式,以连为单位,约150人为一个大班,然后再以15—20人为单位,分成若干小班。以四册《平民识字课本》为教材。并依据课本内容制成三套幻灯片。

教学过程:先用第一套彩色画片加深印象,用图画表示课本中所述的内容,叫士兵把图画中情节口述出来。接着用第二套幻灯,把课文写在玻璃片上,引导学生认识刚才自己口述的文字。第三套图片是一个个生字,每个生字从幻灯中照出来,射在墙上,比原底子放大几百倍,士兵一面看,一面听,一面写,精神贯注。如一家人吃饭的教材,先画全家吃饭图,教师向士兵讲解画片中所表示的人物与活动,反映一家人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同吃饭的课文进行教学。最后再认单字,等于复习,然后灯光复亮,为时十五分钟,即可完成幻灯教学过程。

幻灯教学后,然后按若干小班进行活动,由教师及助理辅导士兵,复习课文中的字音、词意。每课教学的全过程为四十分钟。教学时,张学良经常参加。

两个月后,士兵即读完了四册《平民识字课本》。士兵因平时生活枯燥,组织他们识字,学习文化,他们非常感兴趣,通过识字教育,改变了官兵关系,过去的营长、连长,由军官变成教师;士兵不是下属,变为学生,官兵关系变成师生关系。以往军官打骂鄙视士兵的军阀作风亦很少发生了。大大增加了官兵的团结。首届毕业的士兵,其中学得最好的,可转为士兵识字教学中的助理教师。

张学良对第一期士兵识字教育成绩非常满意,他认为好的军队,要有好的技术条件。如没有文化,一切就无从谈起。在26、27两旅试行之后,即向整个



满洲驻军展开识字活动，四个月之后，有二万人参加学习，其中一万多人摘掉文盲帽子。

为了巩固士兵已学的文字与知识，编辑委员会在张学良的支持下，编辑了通俗易懂的《士兵月刊》。通过两个月识字教育的士兵，绝大多数人能读这个刊物，北大营顿时书声琅琅，风气为之一变。张学良还打算把士兵教育扩大到平民中去，他曾说：“准备通过四年时间，使满洲人都能粗通文字。”

随着识字运动的深入，张学良要求士兵识字教育最高委员会配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收集军事术语和士兵的词汇，平教会又调集了哲学、语言、艺术的专门学者，编辑《士兵千字课》，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28年1月正式出版，10月再版；1929年1月3版；是年3月，4版。

1928年《士兵千字课》出版后，即在东北军二十三师何国柱师长的邀请下，平教会同仁又去顺直继续施行士兵识字教育，并试用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选取学生，开始用《士兵千字课》为教材，效果很好。

自东北军施行士兵识字教育之后，其他军队亦为之效法。1926年，冯玉祥函请平教会派人去包头

办了士兵教育，并不断地给《士兵月刊》撰稿。对军中的士兵识字教育与文化学习亦抓得很紧。另外，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于1929年亦函请平教会在武汉办了士兵教育，后来移防到广西之后，也努力推行平民识字教育。

自北大营施行士兵教育之后，张学良与晏阳初的关系亦颇为密切，对全国施行平民识字教育极为支持。张学良曾把南池子表章库房屋拨给平教会使用。1929年又函致晏阳初：“我们到顺直地方已经一载，总对民众未尽力谋得工作，所以我请你帮忙，在我统治之各地方，施行平民教育，要二三载之后，使他们全能读书识字，这不是稍尽一些我们的责任吗？你的意见如何？我愿意我们俩有具体的谈话。”张学良决心把顺直地方的人民成为有文化的人民。

张学良不仅倡导了我国的士兵教育，在他主政期间，力主废除内战，对外请求信睦；对内兴学、屯垦，尽力开发东北。亲长东北大学，奖励教育人员，筑体育场等。是一位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的将军。

（责任编辑 宁宁）



陈后主

宠姬

张丽华

是谁

斩的

王永泉

在《健康实录》中有：“晋王广……命斩张贵妃于青溪桥。”现在出版一些关于南京的书籍中，也这样认为，如《金陵野史》中有：“就在晋王命令下，张丽华与孔贵妃被斩于

青溪中桥。”事实并非如此。晋王杨广见到从井中吊出的张、孔二妃时，被二妃的花容玉貌所迷，不仅不愿斩二妃，而且还要纳张丽华为妃。只因元帅长史高颍坚决反对，才没能如愿。高颍据理力争，驳得晋王哑口无言。然后，高颍令斩了二妃。杨广对此大为不满，而且导致后来高颍的杀身之祸。

《北史·列传第六十·高颍》中：“九年，晋王广大举伐陈，以颍为元帅长史，三军皆取断于颍。及陈平，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颍曰：‘武王灭殷，以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北史》这段写出了历史的真实。首先，晋王杨广当时还没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高颍是最高统治者隋文帝的心腹大臣，掌握实权，能与晋王分庭抗礼。其次，符合二人个性。杨广称帝后（隋炀帝），五百美女拖龙舟下江南，高颍竟因批评他而被杀，（可见《北史·列传第六十·高颍》），都是二人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转17页）

风云都督孙毓筠

王炳毅

(一)

1908年底的一天中午,江宁巡警道的一名警官带领一队警察在驻防清军的配合下包围了南京昇州路上的一幢旧式宅院,逮捕了居住在这里的江南候补道员孙毓筠。其罪名是“勾结过激党徒,图谋反叛朝廷”。

孙毓筠,原籍山东济宁,他出生于安徽寿州(今寿县)。是朝廷中大学士、军机大臣孙家鼐的侄孙。孙家在寿州也算是书香名门,富甲一方,良田百顷,僮仆成群。孙毓筠幼秉家教,饱读诗书,偏偏屡试乡试不中,由于怀才不遇,对清廷产生不满。1905年冬,他经同乡、革命党人柏文蔚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他的妻子汪钰也参加了革命。夫妇俩不顾家中反对,拿出大笔银两,创办了寿州中、小学,聘请进步教师执教,以学习新文化,反清为宗旨,传播革命火种。平日,孙毓筠挥金似土,也乐于资助革命同志,有一副侠肝义胆。一年后,孙毓筠携妻子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同盟会里,这位大家阔少的地位相当高,在黄兴、胡汉民之间。一度代理过会本部总干事之职。孙中山先生称赞他:“……毁家纾难之精神,实为难得,乃吾等忠实同志,革命中坚分子。”评价甚高。

1907年夏,孙毓筠夫妇奉派回国。孙中山交待他俩的秘密任务是设法到南京,利用家庭关系,在江苏南京的汉族官员中适当开展工作,重点是策动江宁第九镇的新军官兵们反正。

孙毓筠夫妇回到上海时,正值萍醴反清起义失败,哥老会党和同盟会员均遭到清军残酷镇压。孙毓筠夫妇先回寿州家乡,潜伏了数月,待外界的风声平息下来,孙毓筠先单身一人来到南京,以一笔银子捐了个江南候补道员的官衔,先去总督衙门递了手本,报到候委。两江总督端方是个满族人,他看在孙家鼐的面子上对孙毓筠还算客气,接见过一次,安慰他静心等待,一定设法给他安排个肥缺差事。

孙毓筠便在昇州路上购一民宅,改建为公馆。住下来后,终日饮宴玩乐,结交了不少文人墨客,常聚在一块吟诗作画,还常去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等地游玩。由于妻子汪钰没来南京,孙毓筠私生活更是不加检点,在秦淮河畔的酒楼上结交了一位名叫江

锦云的歌妓。那歌妓年方17,苏州人氏,年少秀美,千媚百娇,温柔娴雅,善唱冶艳小曲,又擅长诗画,堪称色艺双绝。孙毓筠倾心于斯,交往甚密,两人结为红尘知己,立下山誓海盟。

孙毓筠的这种风流韵事,自然不合革命党人的规范,受到同盟会同志、第九镇三十三标标统赵声的严肃批评,告诫他别忘了孙中山先生平日的教诲,应自我约束。

孙毓筠没把同志的批评听入耳中,借口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依然故我,照旧与歌妓江锦云打得火热。话又说回来,孙毓筠虽涉足风月情场,但他毕竟还是为反清革命做了些工作。他把从官场上探听来的机密情报定期转告赵声等人,他的公馆也成为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的寿州同乡段书云、权道涵两人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麾下任军官,时常从第九镇驻地江宁秣陵关进城找孙毓筠玩玩。孙毓筠在接触中发现他们同情革命,有胆识,经征得组织上同意,发展他们秘密加入同盟会、段、权两人便常来孙公馆传递情报或开碰头会。在他们的努力下,第九镇不少皖籍官兵已倾向革命。那时南方各省常爆发反清起义,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紧对革命党人进行镇压。第九镇的三十三标、三十四标中好几百官兵秘密加入同盟会,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统制徐绍桢起先对形势持观望态度,渐渐的对革命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不肯按清廷密旨,认真清洗新军中的“过激分子、反叛分子”。

(二)

1908年底,正当赵声、韩恢等人为首的革命党人准备起事,革命军人中出了叛徒,泄露了机密。端方大为震怒。下令整肃第九镇新军,调八旗兵劲旅监视他们,并对南京的革命党人实行大逮捕,孙毓筠也在被捕之列。

他在接受审讯时,起先拒不招供。被关进大牢后,因他有钱,又有候补道员头衔,多少还是受优待的。江宁将军、江宁藩台等大员都主张对“胆敢勾结孙、黄逆党的官场败类”孙毓筠,革去候补道员头衔“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但是端方迟迟犹豫不决,这是什么回事呢?

原来,寿州的孙家闻知孙毓筠犯了逆案,关押大牢,不惜重金,上下打点,派人去北京、南京等地活动,江苏巡警道道台何兆璋得了孙家的贿赂,改变态度,表示愿从中相助,减轻处罚,保全他一命。军机大臣孙家鼐特为从京城给端方又拍急电,又写信,请他对自己这个“不屑任孙严加管束”,言外之意是不言而喻的。那时,杨度正在北京任正四品京官、编译馆总提调,颇有一点影响,以宪政专家而知名。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就认识孙毓筠,结为好友,也特地写信给端方打招呼。信中提到“……少侯乃当今名士,务请给予保全”。

端方有心不杀孙毓筠,却又担心遭到江宁将军等满族大员的参奏。他举棋不定,案子也就一天天拖了下来。孙毓筠起先并不在乎,后来,听说皖、浙、豫、鄂等省官府抓到革命党人,杀了一批又一批。他不免有些紧张,但他还不想招供,想再挺一挺。

巡警道道台何兆璋借看望他之机悄悄地告诉他:欲想保全性命,必得在招供时只咬定是搞政治革命,千万别提种族革命,这样便有救了。孙毓筠在受审时照他的提示说了,但他还是不肯在“自首告白”上签名画押。何兆璋堪称老奸巨猾。他左思右想,想到孙毓筠好色、轻佻,虽在狱中仍与歌妓江锦云有往来,江锦云多次探望,卿卿我我,形同恩爱夫妇。于是,何兆璋心生一计,派人找到江锦云,对她软硬兼施。她本水性杨花女子,看重孙毓筠是富贵子弟,对革命并无思想认识,很快屈服了。按何兆璋的吩咐,不再定时来狱中探望孙毓筠,迁居苏州。

孙毓筠迟迟不见江锦云来探望,不免心绪烦乱,终日长吁短叹。数月后,他才接到江锦云的一封信,信中有道:“容冬一别,不图伯劳飞燕,遽尔分飞,似海侯门,相见何日?乃闻羁身囹圄,忧心如捣,铁窗风味,憔悴如何?当竭力营谋,籍酬旧谊,至盼乐天知命,勉抑愁怀,努力加餐,再图良会……”

信写得缠绵悱恻,柔情无限。孙毓筠读信后,啼泪交流,一夜失眠,过不了一天,他的意志彻底动摇了。在再度受审时,他精神颓唐,狂抽烟卷,招供出实情,并出卖了一部份平日与他有矛盾的革命党人,特为提到“……孙文在日本住横滨牛込区山下町。孙文、黄兴一意谋逆,死心塌地,执迷不悟,网罗各地党羽达万余人‘等情’。供出同盟会的大量机密情报,其中不少是清廷和各地官府尚未掌握的。他的变节使革命受到不小的损失,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

袖还一点不知道。

端方对诱引孙毓筠叛变的何兆璋嘉奖有加,称为“干才”。他还特为抽空接见了这个迷途知返的“宦宦世家子弟”。温和地责斥几句,即安排孙毓筠在督衙的后花园读书,衣食皆有专人照料,也准许歌妓江锦云从苏州赶来陪伴,孙毓筠无疑进了天堂,于是恳求端方对外封锁消息宣判判孙监禁五年。以致南京、上海各大小报都未报道此事,人们都还以为孙毓筠还在坐大牢哩。

(三)

端方奉调离任后,张人骏接任两江总督,他过去素与大学士孙家鼐有宿怨,不想太便宜了这孙毓筠,遂旧案重提,改判已秘密自首的孙毓筠终身监禁。他被重送进大牢后又托家人花重金,多方活动,经张人骏的六姨太从中说项,张人骏下令把孙毓筠转送寿州监牢执行刑期。这也等于变相的关照孙毓筠了。张人骏的处置反而又让孙毓筠巧妙地掩盖了他的叛变行迹,人们以为他还是个铮铮硬汉子。

至于与孙毓筠同时被捕的新军军官段书云、权道涵仍被判终身监禁,在南京服刑,吃尽苦头,若不是徐绍桢冒险力保,他俩早被杀了头。可他俩一点儿不知当年引导他们加入革命活动的孙毓筠早已叛变,仍奉其为首脑,还向狱中的难友们宣传孙毓筠如何献身革命,如何讲名节、重大义。

辛亥年,武昌新军起义成功,清廷统治摇摇欲坠。东南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脱离清廷。寿州的民团武装在石德宽、柏文蔚等同盟会员策动下,发动起义,占了县城,打败赶来镇压的清军。孙毓筠也被“释放”出来,隐瞒了叛变一节,一下成了皖东南地区革命军的领袖人物。不久,孙毓筠奉同盟会总部之命,来南京,出任江浙联军司令部副秘书长(秘书长为于右任)。他起草文告,处理公文电报,参与策划军事,俨然是一位革命家。

1911年底,安徽各界民军首领和革命党人代表在安庆集会,经柏文蔚等人推荐,大家同意由孙毓筠出任安徽省都督。孙毓筠踌躇满志,带领卫士和随从,走马上任。

于是,一个叛徒成了一省都督,后又报效窃国大盗袁世凯,成为捧袁世凯当洪宪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这个资产阶级政客,在历史舞台上左右逢源,终不免暴露劣迹,落得个被人唾弃的结局。

(责任编辑 霁明)



从南京赴义的

黄花岗英烈阮德山

江苏镇江 戴志恭

1911年2月下旬,南京新军第九镇中的革命党人徐国泰、阮德山、华金元等40余人,秘密集结于南京下关火车站,奔赴广州,参加3月29日的广州武装起义,阮德山等在起义中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忧国忧民 立志革命

阮德山(1884—1911年),江苏丹徒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早亡,随长兄阮少堂生活。阮德山进入县城学堂读书时,正值英国殖民者侵入镇江,开辟租界之际。他目睹租界内洋人趾高气昂,横行霸道,官府仰外人鼻息,欺压同胞,忧愤地说:“中国土地让外人践踏,国无宁日矣!”他有时去宝坳农村小住,接触农户,亲身感受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地租和杂役,饥寒交迫,因此他对劳动人民十分了解和同情,并感叹“世道艰危,人间不平”。面对内忧外患,他亦曾多次满腔激情地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03年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之一赵声(伯先)由日本考察军政回国,至家乡镇江府丹徒县一带创办阅书报社、小学堂、体育会,暗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赵声广交有志青年,引导青年阅读章太炎主编的《国民报》及一些进步报刊书籍,以帮助了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阮德山参与了其间活动,并有机会结识赵声、赵馨等人,革命意志愈加坚定。

投笔从戎 勤学军事

1905年,赵声在南京任南洋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营长),后来擢升为标统(团长),为了培植革命武装力量,借征募新兵的时机,回到丹徒一带尽收有志革命青年参加新军。阮德山在赵声影响下,离开学堂,应召入伍,到了南京,成为赵声统率的军营中的一名新兵。

阮德山进入赵声所属的部队后,在赵声的“首重军人精神教育,养成士兵革命思想为第一要义”的指导下,格外严于律己,苦学军事教程,以便有朝一日

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在实地军事操练中,他每天清晨踏着露水上操,唱着赵声为九镇新军创作的军歌,歌词有“吾侪何以报国家,愿将赤血染上青青草”,苦练杀敌本领,在射击、投弹、马术等项目的考核中均名列前茅。1911年1月,被任命为三十三标一营左队二棚正目(相当于班、排长),并由九镇炮标二营左队正目(连长)徐国泰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新军中一名进行革命活动的骨干分子,亦是赵声培养成长起来的一名突出的“革命精英”。

激战广州 为国捐躯

1910年10月,孙中山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开会,决定集同盟会的精英力量,在广州举行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武装起义。会后,赵声首先到香港主持进行准备起义的各项军事组织工作,任起义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科长(后任3月29日之役即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赵声为从苏皖调集革命精英(即“选锋”)组成敢死队赴粤参战,派革命党人徐国泰负责选拔敢死队员。徐国泰在南京九镇各标共精选40余人,阮德山即在其列。1911年2月下旬,阮德山、华金元、赵馨等启程前往香港,临行前,秘密集合于南京下关火车站,九镇内革命同志送行时依依惜别,阮德山一行发誓:“此次不论成败,誓以身殉!”数日后,抵达香港。不久阮德山受命前往广州省城和革命党人联络,准备起义事宜。他先到广州仙湖街始平书院(革命党人收藏枪械炸弹处)与党人宋玉琳(即宋建侯)同寓,参予检验武器,又与马锦春所部接洽通讯联络,协调行动等,为谋划革命之举,进行紧张的工作。在起义之前,因广州风声紧急,曾奉黄兴命撤回香港。3月28日,赵声又命阮德山和徐国泰、华金元等乘夜轮再去广州,随黄兴参加次日攻打任务最为艰巨的两广总督衙署。3月29日下午,革命党人近二百人,每人臂缠白布,由黄兴住地小东营街(今宣德路)整队出发,阮德山等随黄兴扑攻督署,猛冲大门,用手榴



弘扬先烈精神 献身共产主义

南京千余名青年在雨花台宣誓入党

●余安民文、朱平摄影

“七·一”上午，南京市 1000 余名青年冒雨在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行入党宣誓，表达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这次活动是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共青团南京市联合举办的。市委书记顾浩、副书记包生华、赵少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虞煜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晔出席了宣誓仪式。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深深怀念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的独立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千千万万革命先烈。雨花台的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雨花台烈士陵园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每年吸引全国各地的观众达 80 多万人。今天，烈士纪念碑在风雨中巍然屹立，纪念碑四周插满了彩旗，巨幅党旗竖立在右前方，光彩照人。

上午 8 点 50 分，宣誓仪式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始。青年党员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篮，千余名青年党员由市委副书记包生华领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顾浩书记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又有一批先进青年加入了党组织的行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表现。他希望大家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继往开来的事业进行下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同时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以党的 70 周年纪念日新的起点，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实际行动，推进南京的两个文明建设，向党、向人民、向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革命先烈，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弹先将督署东西两辕门警卫十余人炸毙。入内厅后，总督张鸣岐已逃遁。遂和黄兴火烧督署大堂后复出，迎战凶狠顽固的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阮德山英雄杀敌，以娴熟的枪法，准确的投弹毙伤敌兵数十名，后在激战中与黄兴走散。阮德山与徐国泰、华金元三人边战斗边寻找黄兴，未遇，转战到双门底（今永汉路）时，在与清军交火中，徐国泰中弹负伤，阮德山和华金元为保护战友，始终不离左右，他们奋勇冲杀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阮德山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其兄阮少堂一直不知阮德山下落，直至民国

十八年（1929 年）才由广州起义幸存者辗转相告，始知胞弟已在辛亥广州 3 月 29 日之役（即黄花岗起义）中战死，于是上书，呈请抚恤。经查实，国民政府行政院于民国 18 年 9 月 2 日颁发了第 2423 号指令，确认阮德山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并飭令江苏省政府按《抚恤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家族条例》，每年发给抚恤金，还颁发了烈士证书，由阮少堂收执，并且在广州城外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上镌刻上了阮德山的英名。

（责任编辑王春海鸣）

追求光明

在敌垒心向共产党

绝路逢生

从东京引渡回南京

日伪高层机构中的

红色谍报员

南京

汪精卫公馆

dfz.nanjing.cn

汪锦元（一九四一年在南京颐和路汪伪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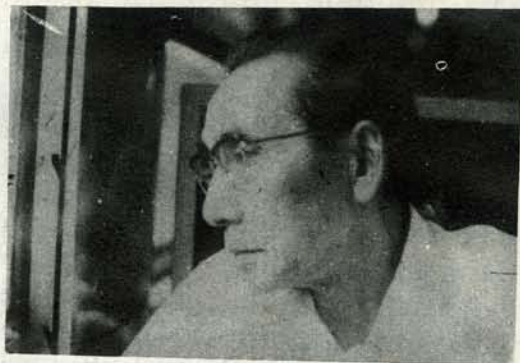


半个世纪前，在日本东京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国际间谍案：左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翌年殃及中国，南京、上海十多位中、日两国高层机构中的人员遭逮捕，其中包括中国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随从秘书汪锦元。本文主要介绍红色谍报员汪锦元其人其事。

1942年7月29日汪锦元早上8时到汪精卫公馆上班，约八、九点钟，汪公馆对门日方派驻护卫汪精卫的日本宪兵小队请汪锦元去宪兵小队，因汪锦元经常和他们打交道，人员熟悉，随即去了。汪锦元到了宪兵小队，发现情况与往日不同，宪兵也未讲什么事，即不让汪锦元离开，随后送到日本宪兵队拘留所，汪锦元从此即从汪公馆失踪了。在南京同时送到

南京市党史办公室副研究员

韩贤俊



日本：西里龙夫

上海母亲身边。汪乔雅村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母子两人生活，她出面为汪锦元找工作。

进日森通讯社

1930年汪锦元进入日本人日森办的日森通讯社当员工，任务是刻蜡纸、油印和分送油印好的材料。

日森通讯社是日森一个人经营的小通讯社，既没有分社也没有记者，但是它所发行的通讯稿件内容却是其他大报或大通讯社所无法获得的中共中央的文件，因此在日本政界、报界颇为闻名，也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日本驻沪大报的特派记者经常来到该社，探索中共的动态，估量国共两党政情，猜测当时“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的军事斗争趋势。

1930年来到日森通讯社的记者中，有以手岛博俊为首的几个年轻记者，他们谈论中国的形势，直言不讳地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武力侵略罪行；也痛骂国民党政府对内实行压迫人民对外则向帝国主义列强卑躬屈膝的反动本质。这对当时年轻的汪锦元来说不能不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日本人竟然敢反对自己的国家政府了，而且还骂国民党，尤其使汪锦元惊讶不解的是，他们称赞中国共产党，同情中国共产党。对长期在日本亲身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而不甘心受辱的汪锦元来说，首先体会到他们的谈论当中闪烁着真理，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公正的、正确的，认为他们富有正义感，于是有意识地跟他们接近交往起来。他们不懂上海话，就帮助他们，并在生活上给以种种照顾，他们则对汪作了启蒙教育。但革命的队伍是复杂的，他们中有一个叫日高为雄的，由于汪对他照料得较多，交谈机会也多了。有一天，大概是1931年的秋天，日高告诉汪说，他已得到中共的同意，不久就要到江西苏维埃的首都瑞金直接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汪为他高兴，于是汪更加关心他的生活了，正在这个时候，汪有一天分送日森通讯社的稿件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日高走进了日本大使馆在沪的海军武官办事处，引起了汪对日高的怀疑。过后，汪不动声色地问了日高，到海军武官府去干什么？日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告诉汪锦元：他到瑞金去是受了日海军武官府的委托，并要汪严守秘密。汪

(总 313) · 25 ·

日本宪兵队拘留所的还有李德生、陈一峰，他们在各自家中被捕。被捕当天没有受到审讯，这是因为南京的日本宪兵是受日本东京警视厅的委托逮捕人犯，不是案子的承办人。翌日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三人由两名日本宪兵押送上海，在火车上三人都未带手铐，但禁止相互交谈。

三人被押到上海后，即受到日本东京警视厅特高课警察的审讯，到九月十六七日审讯初步结束，随即押送日本，十月一日到达东京，关进东京巢鸭监狱。

汪锦元他们为什么被逮捕，又为什么要送到日本东京关押审讯呢？

坎坷的身世

汪锦元，江苏省吴县人，1909年生。汪锦元的父亲汪钟卿，早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学法律，在读书期间，结识了日本京都本愿寺和尚的女儿大桥对子——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校学生，两人相爱。当时中国人在日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地位低下。大桥对子与汪钟卿的结婚，遭到大桥对子家族的强烈反对。汪钟卿毕业后，带领大桥对子（婚后改名汪乔雅村）和孩子回到中国苏州汪钟卿的封建大家庭中。

汪家由老大汪甘卿掌管，汪甘卿是清朝举人，苏州著名的保皇派，反对民国政府，利用封建家长的权利，禁止汪钟卿到民国政府做事，汪钟卿闲居家中，于1917年去世。当时汪锦元才8岁，因其父亲去逝，母亲是异国人，母、子俩在家庭中实难继续生活下去，1919年，汪乔雅村带着10岁的儿子离开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外出谋生来到上海，靠教书来维持母子两人生活。不久，汪乔雅村将幼小的儿子送日本亲戚家中，求亲戚来帮助培养教育自己的独生子。1922年，13岁的汪锦元，只身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求学。

汪锦元只身来到异国他乡日本神户的姨母家中。二十年代的日本，经济萧条，汪的姨母家中生活也相当困难，也无能力供他上学，只能半工半读。

汪锦元在日本虽然有一些亲戚，但因其父是中国人，自己又用中国名字，所以也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和凌辱，他常被日本人骂为“中国猪”。汪锦元实在无法长期忍受这种歧视和凌辱，于1929年离开日本回国。

汪锦元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回到亲爱的母亲身边，由于他长期流落异国他乡，回来后不会讲中国话，他的母亲汪乔雅村征得汪锦元大伯父同意，将他送到苏州大伯父家中学习汉语。半年后，汪锦元回到

听了日高的话,内心非常气愤,认为这是革命队伍中的败类,要设法破坏他的阴谋,于是汪锦元去找手岛,将上述经过情况告诉了他。手岛一方面表示感谢,同时他说将会把这个情况告诉中共方面的人,取消这个计划。后来日高瑞金之行果然告吹,使日本海军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当时中共中央文件在内部发行后,很快就被日森通讯社搞去翻译分送,但中共方面一直查不到是哪个人搞出去的。大概在1933年或1934年,有一天手岛找汪锦元,要汪想法弄清是什么人提供的中共文件,此人住在什么地方。汪锦元受托后不久,凑巧日森生病了,中共文件资料拿不回来,钱也送不出去,日森想派他老婆去送钱取文件,但他老婆是日本人,对中国街道不熟悉,难以找到地方,正在犹疑不决时,汪锦元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带送。由于日森病卧床上,别无它法,同意汪锦元去送,汪锦元按地址将钱送到当时法租界(现称顺昌路菜场附近的弄内)一个姓周的家中,汪将该人的姓名和地址告诉手岛,手岛转告王学文,自此之后,日森再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文件了。据后来了解,姓周的是中共上海市的一个区委书记。

1936年汪锦元由西里龙夫(日籍中共党员)和陈一峰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打入汪伪政府搞情报

1939年汪锦元设法参加了汪精卫的爪牙高宗武在上海愚园路组织的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由于高宗武与褚谊民矛盾重重,1940年1月高和汪伪集团正式决裂。

高宗武逃走后,汪精卫派他的日语翻译周隆庠接替高宗武的上海国际经济问题研究所的工作,汪锦元也就成了周隆庠手下的人了。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自任伪行政院长,周隆庠被任命为伪外交部次长(补高宗武的缺),兼任汪精卫对日方交涉的翻译工作。汪精卫吩咐周隆庠物色一个可靠的懂日语的人做随从秘书室的秘书,周隆庠就在他所管的上海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内找上了汪锦元。周隆庠将汪锦元介绍给汪精卫,汪精卫很满意。1940年3月,汪锦元随汪精卫来到南京,在汪精卫公馆担任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

1938年上半年,汪锦元的入党介绍人西里龙夫受侵华日军的委派来到南京。在日军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导部任嘱托(顾问)兼同盟通讯社记者,并负责

指导伪维新政府的中华联合通讯社,西里龙夫的军报导部嘱托的身份使他可以随时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及日本在南京各重要部门,因此情报材料的来源很广泛,他借口新闻报道的需要,随意提出深入了解日军进攻意图,兵力配备,伤亡情况及日本的外交方针、外交动态等等。

1938年下半年,上海情报系统党组织为了增强南京的力量又派陈一峰来南京,陈一峰通过西里龙夫的关系,进入了伪维新政府的中华联合通讯社任首席记者。汪伪政府成立后,中华联合通讯社改为中华通讯社。

为了加强南京情报工作的领导,1940年上海派李德生来南京负责领导工作,并将李德生的爱人张鸣先派来协助李的工作。李德生以祖传的中医为名在南京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挂牌行医,在山东同乡会和伪首都警察厅厅长苏成德的捧场下,李德生的生意很快好起来,不仅解决了掩护身份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工作经费和情报来源等问题。在南京的情报人员日益增多,上海先派陈叔通作交通,后又派张明达来南京专任交通工作。李德生来南京后,又发展一些新的情报关系,收集了很多重要情报。在当时南京情报小组成员不多的情况下,一切都很顺利。这是当时党领导的工作正确。但1942年为什么南京、上海同时都遭受到破坏呢?其根源发生在日本东京。

被捕的原因

1941年10月在东京发生了“左尔格——尾崎秀实事件”。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在年底暗中传到了上海日籍中共情报人员中西功处,很快在南京的西里龙夫也知道了。1942年初,他们都感觉到当局对他们的暗中监视愈来愈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各自向领导提出了“怎么办”?是否撤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注:西里龙夫、中西功都是日本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1930年前后,他们参加学生运动,曾被日警逮捕,进步的尾崎秀实作为东京朝日新闻的驻沪记者曾与中西功、西里龙夫有过交往,这两点就足够成为当局要注意的对象了。)可是当时上海、南京的领导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上海的中西功则在实行逃亡过程中,被日本警察诱回上海被捕,而南京的西里龙夫则事前虽有周密的逃亡计划,结果没有实行,束手被抓,两人都是1942年6月15日同时被捕的。这说明如果当时领导人能果断地采取撤退计划,两位日本人是不会被日本警察逮住的。

两位日本人被捕,当天南京的人就知道了。1942年7月29日南京、上海有关的情报人员同时被捕,南京除了汪锦元外,还有李德生、陈一峰等,上海多人被捕。

南京的情报小组遭到破坏,工作停顿,张明达、白沙逃走,其他人仍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但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遭破坏的原因是,1933年德国人左尔格博士作为德国社会学杂志的特约通讯员来到日本,其实他是苏联红军第四本部派驻在东京“兰瑞作战小组”的负责人。他知识渊博,很快获得了外国记者的称誉,在东京的德国人社会中立住了脚,不久完全博得了希特勒德国驻日大使奥特的信任,担任了该大使的特设私人情报秘书,成为奥特的亲信。尾崎秀实是左尔格的左右手,是名记者,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当时日本战时内阁近卫首相的智囊团成员之一,担任近卫的秘书,因此取得了无数极端重要的战略战术性决策情报,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任务,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日本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左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是在中国上海开始的。1928年尾崎秀实作为东京朝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来到上海,这个年轻有为的进步记者很快与中国的左翼作家们交上了朋友,与王学文、斯沫特莱等人也相识了。左尔格是在1930年奉命来中国上海工作的,他们经过斯沫特莱的介绍建立了友谊,崇高的革命思想使他们成为知交,意气相投的两人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开始了第一次国际合作。

日本用中国的庚子赔款设立了一个“东亚同文书院”,这是一所培养侵略中国的人材的高等学校,学生主要是日本各地推举的高中生,为了装点门面也招收了少量中国学生,以此来表明“中国的赔款用在中国人身上”。但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浪潮中,这个日本人办的高校也逃不了它的革命怒潮的冲击。推进和领导这个学校的革命运动的就是王学文,很多日本学生都卷进了大革命运动的洪流,尾崎秀实也成了这些进步学生的好顾问。这些日本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各种革命组织,如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反帝大同盟、外国士兵委员会等等,他们受到了中国大革命运动的革命洗礼。

左尔格在扩大组织中参照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盘据中国的形式,通过尾崎秀实吸收了一些日本人参加,其中包括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

1932年初,尾崎秀实奉调回大坂朝日新闻社,

汪锦元母亲汪乔雅村
(日名:大桥对子)



他们的合作暂告中断。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们东三省,翌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陈兵东北,显露武力侵吞中国的野心。日本的武装侵略,虽然遭到欧美列强的反对,鞭长莫及,眼看日本在中国横行称霸,远东政治中心转移到日本。

1933年左尔格由上海回苏联,为了适应远东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作战小组迁移到日本东京,翌年与尾崎秀实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重建组织中,曾在上海参加组织的成员河合贞吉、水野成等又参加进来。兰瑞小组的成员有的是南斯拉夫籍记者、有的是画家、医师等,人材济济。由东京发出的密码电报,虽早被日本当局收听到,但直到兰瑞小组遭到破坏为止,始终没有查明,同时密码也始终没有被破译出来。

1941年10月兰瑞小组遭到破坏后,全体成员被警视厅特高课警察一起逮捕。随着审讯的深入,震惊了日本当局,他们在对水野成的审讯过程中感到同文书院出身的左翼学生为数不少,毕业后他们很多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日本各种机构里工作,认为有可能与中共发生关系,对日本进行着同样的情报工作。于是诱问了水野成。根据日本特高课警察某人的回忆录,水野成虽然没有提供具体人员名单,但是表示可能有人与中共合作。原来日本各地的领事馆警察都有档案,对左翼分子都有黑名单,于是东京特高课警察在左尔格——尾崎秀实案告一段落后,就开始派人来华侦察。汪锦元说,线索是不难找到的。中西功进入满铁调查部的推荐人是尾崎秀实,而中西功在同文书院时曾参加左翼活动,这在日本上海领事馆警察部是有案可查的,而西里龙夫则是曾被领事馆警察通缉归案的上海“日支斗争同盟”的创办负责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后,特高课警察在1942年6月15日在南京、上海两地同时将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逮捕。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在中国的案子,却由另一国的警察越过国界来破案的原因,也是南京、上海两地情报人员遭逮捕的原因。

设法引渡

(总 315) · 27 ·

1942年7月29日,南京、上海两地中国情报人员同时被捕,都是与日本人有关的。据汪锦元回忆:日共在二十年代末期两次受到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警察全国性的大逮捕,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此在党内形成一个未明文的默契,凡被捕者在任何严重体罚下,至少一周内不供认任何同事。这就是说给未被逮捕的同志一周时间以便转移。这是因为特高课警察的野蛮体罚是使人难以忍受的缘故。日共采取这一措施也是为了能多挽救一些遭受逮捕的人免遭受刑致死。日本人被捕后,中国人未采取任何措施,束手就擒,而且还是在一个月后,甚至连特高课警察也不理解,问他们日本人被捕了,你们为什么不跑。

汪锦元等三人关进了东京巢鸭监狱,汪到东京后想得更多了,如果仅仅为了审讯或者制作口供笔录,就没有必要到东京来,显然另有目的,那就是在东京公开审判。结合到“左尔格——尾崎秀实”的所谓第三国际间谍案,中共领导下的中日两国人参加的也应属国际间谍案。这对东京警视厅的特高课警察来说,通过这两个案子的公开审判,无疑是炫耀他们的成绩的最好办法。

汪锦元当时是汪伪政府首脑汪精卫的秘书,他怎么也想不到,堂堂一个国家元首的随从秘书,事先也没征得该国元首的同意,竟被他国的警察逮捕并押解到他国的首都,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要揭露这个事实,更证明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过是个傀儡,同时又会逼使汪伪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的要求,来表明他是一个主权国,以维持他的尊严。这件事本身又有可能造成日本与汪伪之间的矛盾。

汪锦元考虑到既然已押在东京,那只有在东京想办法最好,要使汪伪政府知道:他的元首随从秘书被关押在东京这个事实。汪锦元借口天气转冷,需购棉衣,要向汪伪驻日本大使徐良借钱,要求检察官批准。最初遭到了拒绝,经再三的据理力争,检察官终于同意了。汪锦元给徐良写了一封借钱的信交给了特高课警察,经检察官的审查,信寄出了。几天后特高课警察提审汪锦元时说:“徐良大使派人到警视厅送来一百日元,来人要求见你,但目前还不能见面,我们已经拒绝他了。至于这一百日元钱则已交给监狱里挂在你的帐上了。”

不久负责审讯汪锦元的特高课警察高桥兴助对汪锦元做审讯笔录,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到1943年1月初结束。审讯笔录是一问一答,由高桥自己提审并自己用毛笔书写,基本上是上海审讯的

汪锦元、陈一峰出狱后
同李德生在南京日军招待所



基础上整理的,目的是罗织罪名,以便向法院起诉。

1943年1月某一天,高桥提审汪锦元作笔录时,对汪说:“这里有一张名片,是周隆庠给你的,他曾向司法省提出要求和您见面。我们没有同意,所以他留下了这张名片给你。”汪看了周隆庠的名片,上面写着:现在正在与司法省交涉引渡问题。汪锦元向徐良借钱的目的达到了。(注:周隆庠这次是随汪精卫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周是汪伪外交部次长,专门担任汪精卫的日文翻译。)

同一个高桥警察也做李德生的口供笔录,大概一月下旬审讯结束,他在狱中等待审判。

引渡回国

1943年3月末,汪锦元他们引渡回国的目的实现了,警视厅特高课将汪锦元三人押解离开东京巢鸭监狱。汪锦元三人离开东京时,审讯陈一峰的特高课警察指着审讯汪锦元的高桥胸口上的勋章问汪锦元,你知道这是什么?汪回答不知道。他说这是金鸢勋章,是这次皇室赏给他的。当时高桥站在火车站月台上,趾高气扬非常得意。这大概是破这个案子高桥有了“功劳”。

1943年4月1日,汪锦元三人押回上海,交上海江湾日军军事法庭,由日军军事法庭审判。由于汪锦元的母亲汪乔雅村的营救,陈璧君派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找日本人交涉,以汪锦元是两房独子为由,要求留条性命。日军军事法庭从1943年5月开始审判,检察官起诉书要求判处死刑,6月22日日军军事法庭开庭一整天,最后宣判三人为无期徒刑。

1943年7月某日日军将汪锦元三人押回南京老虎桥日军军人监狱——陆军监狱服刑。

日军军人监狱生活很苦,吃的差,数量少,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在服刑期间每天盘腿面壁坐着,大便规定在每日起床前完成,小便规定时间和次数,违者则遭大打,没有洗澡,不能随便活动。

著名心理学家 高觉敷教授

董 纯



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弗洛伊德热，我们怀着崇敬与好奇的心理，前去采访一位最早将弗洛伊德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著名心理学家南京师范大学 95 岁高龄的老教授。

簇簇冬青，环着一株老干新枝的腊梅，把这座僻

处金陵小巷的小小院落，点缀得古朴典雅，生气勃勃。就在这院落里，住着一位淡泊宁静、慈祥宽厚的“跨世纪老人”——高觉敷先生。

我们来到他家说明来意，高老从书桌边缓缓站起，只是用略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说说了句：“我没有

1944 年春天，日军突然分别提审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三人，要他们找新四军相识的人。汪锦元和陈一峰都不知底细，回答说认识新四军的人；李德生觉得有苗头，就回答有认识新四军的人。1944 年 10 月，日军将李德生释放，派他去找新四军的人。1945 年 4 月，新四军派杨帆来南京，了解日军高层人士意图，并将汪锦元、陈一峰营救出狱，带回根据地，此案才算了结。

赘 语

1945 年 9 月，汪锦元被派往上海工作，组织上交待：长期埋伏，安排好生活，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解放后汪锦元参与了反外国间谍工作，破获了一个美国潜伏特务机关，抄获了电台密码、收发报机和主犯 Vieter 等人。1955 年他因受潘汉年、杨帆案件的牵连，在上海被逮捕，先关在北京前门监狱，后关在秦城监狱，冤狱十年有余，1965 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判处管制三年，定“反革命分子”，刑期自释放之日算起（1965 年刑一字第一号）。

1965 年汪锦元被送回上海管制，在上海化工机修总厂监督劳动，当搬运工。

汪锦元 1955 年被捕后，他的妻子为了子女的前途，提出和汪锦元离婚，她领着五个子女靠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把这个“反革命”家属揪了出来，因经不起四人帮的迫害，她在“文革”中含冤自杀了。

汪锦元年迈的母亲汪乔雅村经长期等待和盼望的独生子终于归来了，可归来的是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管制分子”，这不能不给这位老人以无情的打击，加上媳妇和孙子、孙女都和“反革命”儿子划清界线后断绝了往来，老人无人照料，使她闷闷不乐，积忧成疾，1966 年 4 月去世。

1979 年，终于撤消了对汪锦元的刑事裁定书，1981 年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现离休在上海安度晚年。

（责任编辑 宁宁）

什么值得写的东西。”

“小才易骄，大智若愚”——他的质朴，正是他虚怀若谷、永远进取的反映。

从三十年代起，高老即以其《现代心理学》、《群众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专著，为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译著，波林《实验心理学史》、考夫卡《儿童心理学新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以及勒温的《形势心理学原理》（现改名为《拓扑心理学原理》）等，给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窗，开创了介绍外国心理学几大经典学派研究著作之先河；1930年与唐钺等合编的《教育大辞书》，其深远影响，至今不减；直到粉碎“四人帮”，国内心理学学科恢复以后，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史》、《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等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其贡献之大，更为世界所公认。

他现在是中國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之一，仅此两项，足可窥见其在中国心理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和郭任远、潘菽、章益等著名心理学家，在心理学研究方面，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原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周扬，30年代曾听过高老的课，1979年从北京来宁曾亲访高老，以师事之。国外心理学史研究机构负责人布洛泽克教授高度评价高老的成就，认为他是目前世界上“最年长而仍然精力充沛地积极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心理学家”，并称由他建立和领导的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史研究室“在中国属于首创”。

献身心理学

高觉敷，又名高卓，1896年生于浙江温州。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英文部。1918年被选送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同去的有朱光潜等20位同学。

当时虽系公费待遇，北洋军阀政府只给了三个月的费用，香港大学曾多次催欠款项，并因此而对这批留学生产生严重不满，加之当时中国国际地位低下，香港又刚割让不久，他们更是遭受歧视。

时逢“五四”运动爆发，迄南而北，罢课罢工，游行示威，风起云涌。高觉敷就读的以香港总督为校长的香港大学，虽未能直接参加这一运动，但也受到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香港大学学习期间，高觉敷对心理学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较深刻地钻研过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引论》。当时不仅在香港，即便在英国，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也不大受重视，像麦独孤这样

有名气有专著的学者，也不过作了英国伦敦大学的一名讲读（讲师）而已。十九世纪时欧洲才建立起科学的实验心理学。在心理学还处于幼年时期，高觉敷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并选择它为之毕生而奋斗的事业。

创造出第一个高潮

1926年高觉敷毕业于香港大学，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哲学教育部编辑。当时商务在人员任用，对资历、才干要求之严非同一般。高觉敷协助唐钺（原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史专家）、朱经农编辑《教育大辞书》未几，唐、朱二人相继离去，高觉敷接替唐钺任主任编辑，最终将《教育大辞书》付梓面世。

《教育大辞书》可说是中国第一部教育方面的百科全书，词目1200条，1700页300万字。迄今虽已绝版，但对新的教育辞书的编译仍不无参考价值。

三十、四十年代，高觉敷正式投身教育界，先后在四川大学、广东襄勤大学、中山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任职任教。

这期间，高觉敷的生活极不安定，由于日军入侵，举家东奔西跑，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加上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终日为衣食住行而愁肠百结；更加困扰他的是，由于著书立说的劳累和生活的过分清苦，使他多年患有肺结核，缺医少药，健康日下，但他乐守清廉，矢志不渝，筚路蓝缕，艰苦备尝，仍然创造了他一生中著译的第一个高峰。时至今日，他的这些心理学著译文章，依然被作为高等院校的心理学教材，或成为学习心理学的主要参考资料；由此奠定了高觉敷作为我国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史专家之一的地位。

这期间，高觉敷的主要代表作有：《现代心理学》（1935年）、《群众心理学》（1934年）、《教育心理学》、《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主要译著有：波林《实验心理学史》（1935年）、考夫卡《儿童心理学新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30年）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勒温的《形势心理学原理》（现应改称《拓扑心理学原理》）等。

高老通过他的著作在传播西方现代心理学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于中国学者吸收西方先进成果，有着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近些年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心理学著作，产生了轰动效应，波及到许多学科和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不但是无数专

家、学者而且也是高老所始料不及的。这些译作，都是高老三十年代初介绍过来的，《精神分析引论》原译为文言，1984年高老重新修订，改为白话，行销数十年，供不应求，爆出“弗洛伊德热”。

弗洛伊德是一个神经生理学者，曾在法国学习催眠术，发展而为精神分析派的开山祖师。他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变态心理学家，又是一个泛性论者。他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所谓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他的潜意识说贬低了意识的作用。而他的泛性论则将人降级为一般动物，抹杀了人的本性特征。

弗洛伊德的作品重版时，高觉敷都重写了译序，对弗氏的潜意识、泛性论、死本能和对文化的态度等几个主要方面，都作了一一评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分析，引导读者正确认识弗洛伊德，以达到“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的目的。

迎接第二个高潮

1949年建国后，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多次受到干扰，时而开课时而停课，受“左”的思潮影响极重。高觉敷又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含冤二十年之久。这一段时间，他出不了科研成果，他的优势也难以发挥。

1978年后，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才又步入一个新时期。已届耄耋之年的高老，欣逢盛世，干劲倍增，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科研项目，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982年主编了教育部全国统编教材《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1985年主编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心理学史》；同年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心理学史》。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一书，集全国二十所高校心理学工作者30余人，前后凡二年之久，30余万字。旨在研究和介绍西方心理学的发生和发展。它大量占有与研究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一种结构严谨的心理学史的理论体系；全面而客观地介绍西方心理学各个流派的源流；它的重大突破在于公正地对待西方学者，不仅把西方心理学作为批判对象，而且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坚定地认为：研究西方心理学史对于我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重要

的意义。

由他任主编、潘菽教授（原中国心理研究所所长）任顾问的《中国心理学史》，则可说是中国心理学的里程碑，是一项中国心理学界有史以来没有人系统做过的艰巨“工程”。“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心理学的思想萌芽基本上存在于中国哲学、中国医学等古老学术之中，未能成为独立学科，自先秦以至明、清，中华文化中蕴涵的心理学思想至为丰富，因此加以挖掘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立中国的科学心理学奠定基础。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高老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多年，成为一代名师，育人楷模。几十年高老先后在全国十多所著名高校任教。他严于律己，治学严谨，言传身教，为我国心理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材，他的学生遍布在国内各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如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孝禅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朱曼殊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学校管理系李伯黍教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伍棠棣研究员等都已是我国知名度很高的心理学家，他们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李伯黍教授回忆说：“我开始爱好心理学，主要是受高老的指引和鼓励，那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高老讲授心理学，内容非常丰富，很多是西方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从而使我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我毕生的事业。”

朱曼殊感激道：“曼殊幸获机缘，得列门墙，在校时承教诲，出校多蒙指引，几十年来从事心理科学，既不敢浅尝辄止，亦不因干扰而踌躇者，吾师之功也。”

高觉敷带的年龄最小的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的研究人员申荷永，深情地介绍说：“高老是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但他奖掖后学，和蔼宽厚。我把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和局限》的译文给高老看，他立刻放下手中许多要处理的工作，字斟句酌，为我评解译稿，改正错处。

年逾95岁高龄的高老，每天按时作息，生活起居很有规律。前几年他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时，他曾说：“光是年纪大，身体健康还不够标准，还得做事。”高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至今，他天天坚持看书和著译，还经常穿街过巷，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此外还是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主委，政协江苏省副主席等职。

（下转16页）

第一位考察欧美的南京人

——记李圭与他的《环游地球新录》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经盛鸿

南京地区最早走出国门、第一位到欧美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认真地写下颇有影响的考察笔记的，乃是李圭与他写作的《环游地球新录》。

李圭，(1842年—1903年)字小池，江苏江宁人。世居离南京城约五十里远的乐丰乡夏庄，家道殷实，为当地巨族。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清军溃败。在战乱中，李圭家被掳掠焚杀，全家男女死者二十余人，其母、妻、幼女均在列。李圭被太平军俘虏，初隐瞒身份，后见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便充当太平军的“写字先生”，直至1862年7月间始得从杭州逃到上海。事后他写了一本《思痛记》，记述他在太平军中的见闻书中虽有诬骂太平军的记载，但没有将战祸责任全部归之太平军，如实记录清官军掳焚杀“其惨毒实较贼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更可贵的是，李圭不止于客观记录战祸惨剧，而且对这种惨剧发生的原因进行冷静的思索。他写道：“斯痛也，……实人人自召之痛也。”他在认真地寻求中国内部不断产生惨剧的社会原因。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使他后来一直关心国事，研究国情，探索国家进步与富强之道。

李圭到上海后，为了谋生，经友人推荐到“常胜军”营中办理文案，因而得以结识了一些西方人士。1865年英国人好博逊担任宁波海关的税务司，聘李圭司文牍事。于是李圭到宁波海关工作，直到1893年离职，前后历时近二十年。

1876年，美国为发展世界贸易，在美国的费城举办规模盛大的博览会，着意邀请中国派员送物参加，李圭就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工商界代表。

李圭携带一名英语翻译，于1876年5月13日由上海赴日本横滨，再转赴美国费城，参加了美国建国百年纪念的费城博览会，然后又游览了华盛顿、哈特福德、纽约等城市，归国途中又到英国伦敦、法国

巴黎等地参观考察，有心的李圭将参观考察所得及他的认识写成了一本书，取各曰：《环游地球新录》。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考察记述西方国家情况的一本奇书，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外交史与思想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价值。

《环游地球新录》共数万言，分四卷。卷一为《美会纪略》，记述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的创办缘起、各国展品概况，特别是西方机器大工业产品的精妙快捷；卷二、卷三为《游览随笔》，杂记他的游览见闻与议论感想；卷四为《东行日记》，逐日记述旅途情景。通观全书，不仅可以看到当时欧美国家的概况，而且能听到作者对中西各国的分析与中国发展前途的精辟见解，开人眼界又发人深思。

作者以大段篇幅介绍了当时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的柯林斯蒸汽机：“院正中置大机器一副，轮径三丈余，力抵马一千五百匹。……大轮动，则院中各器凡需蒸汽者，皆藉汽以运动。……如此大器，动时无甚声响，且一人即可运之，是可异也。”确实，这样的机器大生产，是中国数千年来闻所未闻的。李圭强烈地希望中国迅速抛弃传统的封建陋见，迅速引进与使用西方的先进机械技术，他说：“是机器正当讲求，不得援古人桔槔之说，谓机器不当用，凡机器之可以利用者置诸弗取也。”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了不得的认识。

此外，李圭还参观记录了西方各国的“各样吸水机器”、机器造纸、轧花机、农田机器等等，十分欣喜与神往，认为这些先进机器肯定为中国所必须，“尤必得购用，以代人力”。

作者也记述了中国馆展品的内容与收到西方人士欢迎的情况。中国馆吸取了以前到法国、奥地利参展的经验教训，在这次送展的主要是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器等，为他国所无，深得西方人士欢迎；其次是铜器、漆器、银器、藤竹器等，多为手工制

品。中国馆的装点也富中国特色,有牌楼、东西辕门等。李圭还为中国馆大门题挂一联,文曰:“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横额为“物华天宝”,既向全世界介绍了我国的地大物博,又表示了对美国人民祝贺与友好的感情。

李圭除了参观记述了费城博览会外,还游历考察了西方国家其他各方面的情况:如西医,“必先于人之形体、脉络、脏腑,事事考证无讹,然后出试其技”,故“西人医术所以有迈于中华”;如西方监狱,“迥异中华,第一务取洁净,第二饮食调匀,第三作息有节,第四可习技艺……”;如西方女学兴盛,“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如西方近代教育,“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是以课程简而严,教法详而挚,师弟间情洽如骨肉”;……李圭甚至还拜访了美国总统府白宫,向美国国务卿了解美国政府机关的工作情况,听其介绍“公事宜简不宜繁,用人宜少不宜多,俸金宜厚不宜薄”的经验,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机关比中国封建官僚主义的工作效率要高得多。

总之,李圭通过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比当时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要优胜与进步得多。但李圭是个颇有文化修养与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他在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繁荣后面,也敏锐地看到了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如“因颠(印第安)人”“披发赤皮”的生活,城市的噪音,犯罪率高,大学收费的昂贵,“生徒中名门巨室居多,贫素者少,以每年千元食用无出也”,等等。

李圭在美国考察结束后,经英、法回国。他将自己的书取名《环游地球新录》。在书中他旗帜鲜明地主张与呼吁中国要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对外开放,向西方国家的先进地方学习,“取长补短,原不以彼此自域;则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而为弗取也。”这样,中国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成为一个不再有“人人自召之痛”的中国。李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说:“欧洲诸大国所以称雄者,以地大兵强,民安物阜耳,今我国岂出其下哉?且以大势观之,又知将来不能驾乎其上也?”

按照当时规定,此书必须上呈清朝政府。作者在书中记述的西方各国的新鲜事物与精辟的分析见解,引起了当时朝野中有识之士的重视。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特地为该书写了篇《序文》,称赞此书,指出:“泰西诸国,日出其聪明才力以相角逐,凡可为富强计者,若铁路、电线、车舡、炮械之属,

转相仿效,务极新奇,而于商务尤所措意,舍是则无以自立其国。”加强了他以搞洋务强国的决心。李鸿章将此书推荐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资印行三千部。想求新知的士大夫争相购买,坊间也相率翻版。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英国也设法找来此书,认真阅读,记入了自己的日记中。中国近代著名改革家康有为也是在读了这本书与其他一些介绍世界形势的书以后,才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此书的影响使李圭成为当时知识界的知名之士。薄薄的一本游记,包含了作者李圭对祖国的深深挚爱之情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期望。

1883年,法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法国兵舰不断侵犯宁波。当时任宁绍道的薛福成推荐李圭兼任洋务委员,参加抗法工作。当1885年初法舰迫近镇海海口时,李圭劝薛福成先发制人主动攻击敌舰,他说:“马江所以致败者,以和战未定,莫敢先发。今敌既来,宜速飭镇海炮台,视炮弹能达,燃炮轰击,毋落人后,此先发制人之道。”结果,薛福成接受了这个勇敢的主张,主动勇猛轰击敌舰,打退敌人进攻,重伤敌军司令孤拔。在炮战进行中,李圭不顾危险,“护远镜至招宝山安设,出没于颠风巨浪中,命在飘忽”,还写诗鼓舞镇海守将,“相与悲歌不置,人咸壮之”。李圭的爱国思想与英勇壮举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赞扬。

事后,薛福成保举李圭“以知州留浙补用”,直到1893年他才到海宁州上任,做了几年地方官。在这几年中,他倡修水利,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甲午中日战起,他又奉命到上海“游说英人,冀有所援”。战后,他又应两江总督张之洞所请,到苏州规划开埠事宜,认为宜自设巡捕,加强管理。李圭晚年做的这些事,可以说与他当年环游地球时的收获是互为因果的。

1898年李圭因病开缺。1903年5月卒于杭州,终年六十一岁。

李圭是南京第一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进人物,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伟大爱国者之一。尽管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使他的《环游地球新录》在社会上流传很少。但当中国重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李圭的思想与实践必将受到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的景仰与学习。

(责任编辑 宁宁)

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

郑永喜 蒋永才

明托夫(马耳他)

1972年4月2日至8日,马耳他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应邀首次访问我国。马耳他是欧洲南部的一个岛国,1972年1月31日与我国建交。明托夫出生于1916年8月,曾就学于马耳他皇家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1955年至1958年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马耳他独立后的1971年6月出任政府总理,1974年12月马耳他成立共和国,明托夫仍任总理。

拉姆古兰(毛里求斯)

1972年4月11日至15日,毛里求斯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应我国政府邀请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华期间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5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毛里求斯位于非洲东部,是印度洋中的岛国。拉姆古兰出生于1900年9月,曾就学于毛里求斯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医学院,1961年起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1968年3月毛里求斯独立时出任毛政府总理。

西亚德(索马里)

1972年5月14日至18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应邀访问我国。西亚德出生于1919年,曾到意大利学习军事。1960年4月与前国民军司令达乌德共同创建了索马里国民军,并出任上校副司令兼参谋长,1965年7月任国民军司令,后获少将军衔。1969年10月宣布成立全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任主席。

艾尼(阿拉伯也门)

1972年7月16日至27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穆赫辛·艾哈迈德·艾尼应邀访问我国。他出生于1932年,就学于开罗大学和巴黎大学,1962年9月起任外交部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并兼任过驻美国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67年11月起四次出任总理。

田中角荣(日本)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的陪同下访问我国。访

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田中首相在友好的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自29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田中首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华访问的第一位日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8年5月,毕业于东京中央工学校土木系,从1957年开始先后任岸信介内阁的邮政大臣,池田内阁的大藏大臣,佐藤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1972年7月就任日本首相和自由民主党总裁。

比斯塔(尼泊尔)

1972年11月14日至25日,尼泊尔王国政府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应邀访问我国。比斯塔首相是中尼建交后第三位来华访问的尼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27年1月,毕业于印度勒克瑙大学政治系。1961年起先后任尼内阁大臣、副首相,1969年4月起任尼首相。

贝阿沃吉(几内亚)

1972年12月9日至16日,几内亚共和国总理兰萨纳·贝阿沃吉博士应邀访华。贝阿沃吉出生于1923年12月,毕业于达喀尔的医药学校,曾任过医官、市长、几内亚议员及部长职务。几内亚独立后历任经济和计划、外交部长,1972年4月起任政府总理。

蒙博托(扎伊尔)

1973年1月10日至20日,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中将应邀首次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扎伊尔于1961年2月20日与我国建交(1961年9月18日中止,1972年11月24日复交)。蒙博托总统是两国建交后第一位来访的扎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30年10月,曾留学比利时,1958年10月加入卢蒙巴创建的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6月刚果(利)独立后任总理府国务秘书、陆军参谋长、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11月推翻首任总统卡萨武布后出任总统,1971年10月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仍任总统。在1974年12月,他第二次访华时,由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陪同参观访问了南京。



周恩来总理宴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阿希乔(喀麦隆)

1973年3月25日至4月2日,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哈吉·阿赫马杜·阿希乔应邀首次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1971年3月26日与我国建交。阿希乔出生于1924年8月,毕业于雅温得行政管理学校。1957年5月喀成立自治政府,阿希乔出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1958年2月任总理。1960年1月喀独立成立共和国时出任总统,1961年10月联邦共和国成立和1972年5月联合共和国成立时仍任总统。1977年10月阿希乔总统第二次访华,并由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陪同来南京参观访问。

埃切维里亚(墨西哥)

1973年4月19日至24日,墨西哥合众国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应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首次访问我国。墨西哥于1972年2月14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切维里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访华的墨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22年1月,1945年在国立自治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58年起任内政部副部长、部长,1970年7月当选为总统,同年12月1日就职。

特拉奥雷(马里)

1973年6月20日至27日,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应邀首次访问我国。他出生于1936年9月,就学于马里卡蒂人子弟学校和法国弗雷儒斯军事学院,曾在法军中任职,回国后参加马里军队,1968年11月宣布推翻凯塔政权后任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次年9月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

恩古瓦比(刚果)

1973年7月27日至8月1日,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少校应邀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恩古瓦比出生于1938年,1962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回国后先后在军队中任连长、卫戍部队司令、步兵营长等职,1968年发动“七·三一”运动,在马桑巴一代巴总统辞职后,他任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国家人民军总司令,1969年12月创建刚果



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

劳动党并当选为主席,同时就任刚果人民共和国(在刚果劳动党成立大会上更改的国名)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

蓬皮杜(法国)

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访华期间发表了中法公报。法国于1964年1月27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蓬皮杜总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法国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11年7月,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政治学院,1944年至1946年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办公室专员,1958年至1959年任戴高乐总理办公室主任,1962年4月至1968年7月任法国政府总理。1969年4月戴高乐总统辞职,蓬皮杜于同年6月当选为总统。

特鲁多(加拿大)

1973年10月10日至17日,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应我国政府邀请首次访问我国。访华期间签订了中加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特鲁多总理向中国人民赠送了白求恩大夫发明、设计和使用过的外科手术工具。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继古巴后,是美洲地区第二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特鲁多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华访问的第一位加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9年10月,于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又去哈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深造。1948年至1949年在骑摩托车作环球旅行时曾到过我国的上海和台湾。特鲁多于1965年加入自由党,1968年当选为党的领袖,同年4月就任加总理。

惠特拉姆(澳大利亚)

1973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应我国政府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访华期间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澳大利亚于1972年12月21日与我国建交。惠特拉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澳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6年7月,毕业于悉尼大学。1945年参加工党,1967年任工党领袖。1971年7月率工

党代表团来华访问时曾说过,如果将来担任总理就同中国建交并在就职的第一年里访华。1972年11月惠特拉姆当选为澳总理。

史蒂文斯(塞拉利昂)

1973年11月6日至15日,塞拉利窝内(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博士应邀访华。塞拉利昂于1971年7月29日与我国建交,史蒂文斯总统是1961年国家独立以来访问我国的第一位塞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05年8月,就学于弗里敦的艾伯特学院和牛津鲁斯金学院,1968年4月就任总理,1971年4月共和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总统。

比兰德拉(尼泊尔)

1973年12月7日至14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和王后艾什瓦尔雅·拉吉雅·拉克西米·黛维·沙阿应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期间发表了联合公报。比兰德拉是马亨德拉国王的长子,生于1945年12月,就学于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被誉为尼泊尔“二百年来最有学问的君主”。1955年3月被宣布为王位继承人,1972年1月马亨德拉国王逝世后继承王位。1966年6月比兰德拉曾以王太子身份访问我国。此次访华中,比兰德拉和王后来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

布迈丁(阿尔及利亚)

1974年2月25日至3月2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应董代主席和周总理的邀请访问我国。布迈丁出生于1925年8月,曾就学于突尼斯的齐杜纳伊斯兰大学和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在阿尔及利亚为民族独立而开展的武装斗争时期,他先后任第五军区司令、西部地区司令,1960年2月被任命为阿民族解放军总参谋长,1962年9月起出任本·贝拉政府的国防部长、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65年6月宣布成立阿革命委员会即出任主席并兼政府总理。

桑戈尔(塞内加尔)

1974年5月6日至13日、16日至18日,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应邀访问我国。塞内加尔于1971年12月7日与我国建交。桑戈尔出生于1906年10月,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法国外籍军团步兵兵服役,参加过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1960年8月塞内加尔宣布独立,9月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毛泽东主席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马卡里奥斯(塞浦路斯)

1974年5月17日至24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应邀访华。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1971年12月14日与我国建交。马卡里奥斯出生于1913年8月,毕业于雅典大学神学院,后去美国波士顿大学专修神学。1950年10月被选为塞浦路斯希腊正教领袖,获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的称号。曾长期从事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参加过万隆亚非会议和第十三届联大关于塞浦路斯独立问题的讨论。1960年8月塞宣告独立,成立共和国即就任首任总统。

拉扎克(马来西亚)

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马来西亚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扎克·宾·达图·侯赛因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我国。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中马自5月3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拉扎克出生于1922年3月,就学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于林肯律师学院。1955年8月任马来亚自治政府教育部长,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后任东古·拉赫曼内阁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乡村发展部长等职,1970年9月继拉赫曼出任马总理兼外长、国防部长,1973年辞去国防部长职务,1974年兼任财政部长。

埃亚德马(多哥)

1974年9月2日至7日,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应邀首次访问我国。多哥于1972年9月19日与我国建交。埃亚德马总统是1960年多哥独立以来访问我国的第一位多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37年12月,1953年至1961年在法军中服役,1962年回国,1963年作为起义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推翻多首任总统奥林匹欧的军事政变,1965年10月出任武装部队参谋长。1967年1月接管权力,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同年4月任总统兼国防部长。由



毛泽东主席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

于他致力于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1980年以来先后七次荣获国际和平奖。

戈翁(尼日利亚)

1974年9月8日至15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应邀访问我国。尼日利亚于1971年2月10日与我国建交。戈翁将军是尼日利亚1960年独立以来第一位访华的尼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34年10月,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61年6月任陆军总部参谋长,1962年和1965年分别在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和英国三军联合参谋学院进修深造,1966年1月任陆军参谋长,同年7月出任联邦军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邦戈(加蓬)

1974年10月4日至9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哈吉·奥马尔·邦戈应邀首次访问我国。加蓬于1974年4月20日与我国建交,邦戈出生于1935年12月,就学于布拉柴维尔技术学校,曾在法国空军服役。加蓬独立后先后任外交部、总统办公室等处任职,1966年后任新闻部长、副总统,在1967年11月姆巴总统病逝后继任总统。

哈特林(丹麦)

1974年10月18日至26日,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应邀访问我国。丹麦于1950年5月11日与我国建交。哈特林是中丹建交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丹麦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4年8月,毕业于神学院。1957年后当选为议员,1968年至1971年任王国政府外交大臣,1973年12月任丹首相。

威廉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74年11月5日至11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东南端,1974年6月20日与我国建交。威廉斯总理是加勒比地区第一个来我国访问的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1年9月,曾就学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1



朱德、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比耶迪奇

月创建人民民族运动党并出任政治领袖,同年9月该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长,1959年改内阁制即任总理,1962年国家独立后仍任总理。

萨莫拉(莫桑比克)

1975年2月20日至3月2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应邀访问我国。访华期间发表了新闻公报,宣布中莫两国将于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独立之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萨莫拉出生于1933年9月,1963年加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1966年开始历任解阵军事书记、解阵武装部队总司令,1970年5月任解阵主席。1975年6月莫桑比克宣布独立,萨莫拉出任总统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洛佩斯(刚果)

1975年2月27日至3月8日,刚果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亨利·洛佩斯应邀访华,这是1960年8月刚果独立以来访问我国的第三位刚果政府首脑。洛佩斯出生于1937年9月,毕业于巴黎大学历史系,1966年起先后任刚果教育总局长,教育部秘书长,国民教育部长,1971年12月任外交部长,1973年8月任政府总理兼计划部长。洛佩斯还是位作家,所著短篇小说《部族集》被称为“黑非洲的经典著作”,他又是刚果国歌歌词的作者,1972年获黑非洲文学奖金。

伯纳姆(圭亚那)

1975年3月12日至17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林登·福布斯·伯纳姆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首次访问我国。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北部,1972年6月27日与我国建交。伯纳姆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圭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23年2月,曾就学于乔治敦中央高级中学和女王学院,以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深造。1950年与贾根共同创建人民进步党,任主席。后在贾根内阁中任教育部长。1964年底出任总理,1966年5月圭独立后仍任总理。

努伊拉(突尼斯)

1975年4月1日至8日,突尼斯共和国总理赫迪·努伊拉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我国。突尼斯位于非洲北端,1964年1月10日与我国建交。努伊拉是中突建交以来第一位访问我国的突尼斯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1年4月,曾就学于巴黎大学。1954年8月突尼斯自治政府成立时他就任商业部长,1956年突独立后任财政大臣,1970年11月出任政府总理。

廷德曼斯(比利时)

1975年4月19日至27日,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应邀首次访华。比利时于1971年10月25日与我国建交。廷德曼斯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比利时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22年4月,毕业于安特卫普高等商业学院,曾应征入伍,服役期满后于1961年当选为众议员,1973年任副首相兼预算大臣,1974年4月出任王国政府首相。

马科斯(菲律宾)

1975年6月7日至11日,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应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我国。访华期间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9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菲是继马来西亚后第二个与我国建交的东盟国家。马科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非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17年9月,毕业于菲律宾大学法律系,曾任罗哈斯总统的特别助理,1965年11月任菲第六任总统。

贾瓦拉(冈比亚)

1975年6月11日至17日,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应邀首次访问我国。冈比亚位于非洲西部,1974年12月14日与我国建交。贾瓦拉出生于1924年5月,曾在加纳大学阿奇莫塔(兽医)学院学习,后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专攻兽医。1959年参加“保护地”人民党,后任改组后的人民进步党领袖,冈成立“半自治政府”时出任教育部长,1962年任“内部自治”政府总理,1965年2月冈独立时任总理兼外交、国防部长,1970年4月成立共和国就任第一任总统。

克立(泰国)

1975年6月30日至7月6日,泰王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首次访问我国,访华期间发表了中泰两国关于自7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克立出生于1911年4月,毕业于曼谷玫瑰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女王

学院,曾先后在乃宽内阁和銮披汶内阁中任财政部、商业部副部长。1974年7月组织社会行动党,任领袖。1975年3月就任政府总理。

比耶迪奇(南斯拉夫)

1975年10月6日至12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我国。南斯拉夫于1955年1月2日与我国建交。比耶迪奇是中南建交后来华访问的第一位南斯拉夫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7年,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1939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战后任共和国政府秘书长、联邦政府劳工部长、共和国议会主席等职,1971年7月任南联邦执委会主席(总理)。

施密特(联邦德国)

197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应邀首次访问我国。联邦德国于1972年10月11日与我国建交。施密特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联邦德国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18年12月,毕业于汉堡大学,194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68年任党的副主席,1969年起历任联邦国防、经济和财政部长,1974年5月继勃兰特后出任联邦总理。离任后,施密特又先后三次来我国访问。此次访华中,施密特由乌兰夫副委员长陪同来南京参观访问。

福特(美国)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应邀访问我国,这是继尼克松访华后第二位来访的美国国家元首。福特出生于1913年7月,毕业于密执安大学,先后获耶鲁大学、密执安州立大学法学士、法学博士学位。1973年继阿格纽出任副总统后出任美国第三十八届总统。

达科斯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75年12月21日至25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应邀首次访问我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几内亚湾,1975年7月12日与我国建交。达科斯塔出生于1937年8月,曾在民主德国柏林经济学院进修,获博士学位。1972年任改组后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总书记,1975年7月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独立,出任第一任总统。

凯山(老挝)

1976年3月15日至24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

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应中共中央和我国政府的邀请访问我国。这是1975年12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来访的第一位老挝党和政府领导人。凯山出生于1920年12月,曾就学于河内大学法学院,194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1950年后任抗战政府国防部长、寮国战斗部队总司令,1955年3月老挝人民党成立当选为总书记,1972年当选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其间参加过老挝联合政府。1975年12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

马尔登(新西兰)

1976年4月28日至5月5日,新西兰总理罗伯特·戴维·马尔登应邀首次访华。新西兰于1972年12月22日与我国建交。马尔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华访问的第一位新西兰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21年9月,1960年起当选为议员,1963年起在内阁中任财政部副部长。旅游部长等职,1972年任副总理,1974年当选为国民党领袖,次年底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政府总理兼财政部长。

李光耀(新加坡)

1976年5月10日至23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应邀首次访问我国。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6年去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和中殿律师学院深造,1950年回国后开设律师事务所。1954年11月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1959年6月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1965年8月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仍任总理。中新两国于1990年10月3日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李光耀总理第五次来我国访问。

拉齐拉卡(马达加斯加)

1976年6月11日至15日,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应邀访问我国。马达加斯加位于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上,1972年11月6日与我国建交。拉齐拉卡是马达加斯加1960年独立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马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36年11月,毕业于法国布雷斯特海军学校,1965年又去法国土伦海军高等通讯学校进修。1972年5月出任外交部长,获海军中校军衔。1975年6月任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总统。1972年11月拉齐拉卡以外长身份访华时宣布两国建交。

弗雷泽(澳大利亚)

1976年6月20日至27日,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马尔科姆·弗雷泽应邀首次访华,这是继惠特拉姆后来华访问的第二位澳大利亚政府首脑。弗雷泽出生于1930年5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马格林学院,1954年进入政界,1966年后先后任陆军部长,教育和科学部长、国防部长,1975年3月任自由党主席,同年11月任澳看守内阁总理,12月就任总理。

克雷库(贝宁)

1976年7月15日至20日,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蒂厄·克雷库应邀首次访华。贝宁位于非洲西部,1964年11月12日与我国建交(1966年1月3日中断,1972年12月29日复交)。克雷库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贝宁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33年9月,就学于法国圣拉斐尔军事学校,曾在法军中服役,1961年参加达荷美(即贝宁)军队,先后任总统随从参谋,维达伞兵部队司令和陆军副参谋长,1972年10月宣布成立军事革命政府,任总统。1975年11月将国名达荷美共和国改为贝宁人民共和国。

卡马(博茨瓦纳)

1976年7月26日至8月9日,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应邀访问我国。博茨瓦纳位于非洲南部,1975年1月6日与我国建交。卡马出生于1921年7月,就学于南非黑尔堡学院,曾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攻读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56年回国,1962年创建贝专纳民主党,任主席。1965年3月该党在选举中获胜后出任贝专纳自治政府总理,1966年9月贝专纳独立,成立博茨瓦纳共和国,任第一任总统。访华期间卡马总统参观访问了南京。

马列托亚(西萨摩亚)

1976年9月2日至9日,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应邀访问我国。西萨摩亚位于太平洋中部,1975年11月6日与我国建交。马列托亚出生于1913年1月,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韦斯理学院,1940年后任新西兰驻西萨摩亚总督的顾问,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1959年起为独立工作委员会、制宪会议两主席之一。1962年1月西萨摩亚独立,与图普阿联合任国家元首。1963年图普阿逝世后,马列托亚单独任国家元首。(之三)

(责任编辑 霁明)

“文革”期间，林彪、叶群一伙在南京
上演了一场“选妃”闹剧，张宁被选为林
立果的“妃子”，后来张宁回到南京，
现在她的情况怎样呢？

昔日违心做“妃子” 今天甘当林家妇

——张宁远渡重洋嫁美国

[美]莫利亚

张宁的举止和谈吐，不时地展露出迷人的风采。我们一直畅谈了七八个小时。当我讲到过去有关描绘“选妃”的“野史”时，张宁极其认真地说：“添油加醋的地方不少，极不严肃。连最关键时候，把住所的地点都写错了。现在，我还不需要去纠正‘野史’。”

出家——出国——出嫁

1982年，一位素不相识的南京工学院的骨相家姜教授，为张宁算了个命。他说，在张宁三十八九岁、最迟40岁时，东南方向，海外来人，那时，应漂洋过海，不走也得走。并说：“如果你走了，你的命运就会有个转折的机会。”张宁虔诚地信以为真，不知是否真会应验？

就在这时，旅居美国纽约的一位华裔商人读到了有关张宁坎坷身世的报道。这位侨商是谁？现在坐在张宁身旁。笔者与张宁交谈时，他不时插进来讲上几句，话虽不多，但都讲到节骨眼上，虽十多年来忙于做生意，却很有政治头脑，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坦然地讲述了与张宁成婚的来龙去脉：“北京、上海都有我的亲戚。他们得知我与前妻协商离婚已两三年，平日既要忙于做生意，又要照料儿女，一人兼顾两头，很辛苦。张宁的遭遇在报刊上发表后，他们

提议，设法把我介绍给张宁。”“我读了有关张宁的报道，非常同情。特别是看到张宁要‘出家’，我想：‘出家’不如‘出国’；如果‘出国’又‘出嫁’，岂不更好？报刊上透露了张宁在南京博物馆工作，我就干脆给张宁写了一封信。”

接着，张宁兴致勃勃地说：“那封信寄到南京博物馆。地址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南京有4个博物馆，送往哪个博物馆呢？由于信封上写的是‘张宁’收，邮局就直接把信送到我的单位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可那天我到珠海去休假，待我由珠海回到南京，看见有一封从美国来的挂号信，觉得好陌生啊，打开信一看，原来是……”张宁说到这里，朝她的先生瞟了瞟，大家不约而同地又笑了。

张宁的先生抢着说：“我写的信很简单，大意是：我在纽约经营工艺品。两年与妻子协商离婚，现在身边有一儿一女。我对你的身世非常同情。你想‘出家’？我认为，‘出家’不如‘出国’。”“你信中没提求婚的事吗？”张宁的先生：“那还用提吗？是明摆的事了。”“出家”不如“出国”，“出国”也就“出嫁”了！”大家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张宁说，有关我的情况在报刊曝光后，各地信件纷纷而来，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来信是求爱信。原先



张宁和林赛图

有儿子在身边，自己始终没有结婚的念头。儿子死后，精神上再次遭受挫折，倍感孤苦伶仃。我确实一心一意“出家”，但佛界法师认为，如我“出家”，佛门会不得安宁。要我：振作精神，面对现实。读到 he 给我的信，大感意外。他的信写得很诚恳，我反复读了以后，我的心动了，我不得不慎重地考虑。我想：环境逼着我要走了。我把信拿给母亲、大哥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认为应慎重考虑。当时从两种可能进行了推测：可能这个人很好，对我的后半生是好的，哪怕走得再远，妈妈也可放心。如果这个人不好，出国后，遭遇会更惨，在异国他乡受骗，那就更苦不堪言了，妈妈怎能放得下心呢？

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下，大家商量决定：让本人来大陆，看看人再说。于是，我就发了信，请本人来南京。

南京饭店定终身

张宁接着说，一个月后，果真来了。我因忙着办些事，加之双方不认识，所以没到车站去接他。我们约定：在抵达南京的第二天，于南京饭店会面。

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显得有点紧张。我的侄儿、侄女、弟媳妇和侄媳妇，一起陪我去南京饭店。笔者忍不住插了一句：“真是如临‘大敌’，‘保镖’、‘警卫’都带上了！”张宁笑着说：“是这样的。因双方一点都不认识。”笔者：“如果遇上个大骗子，那就不得了！”张宁夫妇抢着说：“是的，最后还是给我‘骗’来了！”“不要说我是个赤手空拳的女人，他也是‘如临大敌’似的。他第一次到南京，人生地不熟。北京、上海的两个侄儿，专程赶往南京，陪他住在南京饭店。”笔者：“张宁那天该打扮得很漂亮啦！”张宁：“那天，我和弟媳妇不约而同地都穿了一身白色连衣裙。他一开门，两个大高个子的女人站在他面前。一时，他摸不清哪一个张宁，因我的弟媳妇也长得很漂亮。正

难于启齿，我首先开口问：你是从美国来的×××吗？他说：是的。我自我介绍说：我是张宁。他就讲：喔，请进。因我在电话里说，我不希望见更多的人，所以他的两个侄儿在另一房间没有露面。坐定后，跟我同去的弟媳妇等人就到饭店楼下去喝茶。于是，我俩的‘相亲谈判’就开始了！”

“第一眼给我的印象就不错：两道眉毛很浓，鼻子高高带点钩，一看就很精明。双方都是这么大的岁数了，谁也没有拐弯抹角。一开始，两人就抓紧时间，爽爽快快地开门见山。我首先发问：‘你多大？你身体怎么样？’这虽然是客套话，但也是重要的条件。他就说：‘我是1939年出生的。身体还可以，没什么病。’我是1949年出生的，整整大我10岁。”

“从他的表情、谈吐、举止来看，他是一个很拘谨而沉稳的人，不象有些外商见到女人或阿谀奉承，或油头滑脑，或故意显得很潇洒，或特意耍派头。他这样，就使我感到很放心。我又问：‘你的家乡在哪里？什么时候到美国？’他答：‘老家是温州的，老家还有90多岁的老母亲和亲戚。1979年到美国经商。旅居美国的兄弟姐妹和亲戚三四十人。’接着他还给我讲述了他以往婚姻失败的情况。”

“他的话不多，但讲得很清楚、很明了、很诚恳。我也就单刀直入地说：‘你站起来。’当时正好，房间沙发前有面镜子，我就在镜子里和他比个子高低。他是1.70米。幸亏他比我高。如果个子比我矮的话，那就会在外表上显得很不相称。”

“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我回去把你的情况和母亲谈谈。我们得慎重地商量商量。’经家里的人再三商量、考虑，隔了一星期，母亲去南京饭店看他。随后，又请他到我们家，与兄弟姐妹见见面。经几次接触，大家对他的印象不错，一致觉得他很沉稳。母亲说：‘我搞了几十年的人事工作了，我看人是蛮准的。’

大丫头，下决心吧，你跟这个人是不会吃亏的。退一万步讲，如果这个人对你不好，你再回大陆来。”

张宁——李婷——张宁

张宁说：“见面半个月之后，我们决定在南京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办理手续时，我提议用我的真名‘张宁’。因为‘九·一三’事件后，我从军区转到地方。为了缩小目标，把我的名字改为‘李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工作人员听我提出要用真名登记时，十分感慨地说：‘从此你光明正大地做人，再不需要用假档案给你改名换姓了！’”

“婚事办得很简单，办好登记手续后，先生把我带到温州老家，让他母亲看看这位新媳妇。在温州办婚礼，只是七八十个亲戚一起聚了聚。返回南京，我们家的亲戚又一起聚了聚。我认为，命到了这一步，这一步不得不走！”

张宁夫妇此次返大陆，前后停留了两个月，一举两得：既办了婚姻大事，又在温州投资设了厂。笔者洗耳恭听张宁的讲述，当然也不时地打量打量她的夫婿。不知怎的，笔者突然发现张宁夫婿的浓眉、高鼻、脸庞、身材都很象一个人，笔者惊奇地叫了起来：“啊，怎么那么巧，他竟象……”张宁抢着接口说：“他象林彪！婚后不几天我就发现了。是巧合，是巧合！”笔者：“请问你先生尊姓大名？”张宁：“姓林，名赛圃。”笔者又惊喜地嚷了起来：“林赛圃！真没想到，转了半天，张宁仍是林家人！”

道道关卡开绿灯

“按理说，象我这样的年纪，病痛缠身，英文又不通，背井离乡该是凄惨的事。办完婚后，我和家里的人都耽心：结了婚，是否能出国？如果结了婚，先生在美国，我只好待在大陆，互相照应不上，那就更痛苦。张宁结婚的消息捅出去了，又出不了国，那日子就更不好过。我已经再经不起精神上的折磨和折腾了！”

“我向江苏省委的某些首长私下问了一下：象我这样的人，能不能赴美国定居？他们说：如按政策，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于是，1989年8月，我正式提出移民到美国定居。申请前，赛圃为我写了申请移民定居报告，然后，两人一起到南京公安局询问：我们如何办理赴美定居手续？南京市公安局有关人员答复说：和一般人一样，履行正常出国手续，由工作单位出具同意出国证明，工作单位上属人事部门出具履历证明，所属派出所出具注销大陆户口。我的履历很简单：南京卫岗干部子弟学校学生；前线歌舞团舞蹈

演员；南京市博物馆资料员。”

“赛圃在美国为我准备好一切申请赴美定居的必备的文件和资料。8月份我提出申请移民定居美国，9月上旬，我就拿到护照了。”

“我们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办有关签证手续时，见我在表上填有：‘儿子被害致死，案子未了’，一位领事馆官员用中国话文质彬彬地对我说：‘案子未了，不能出国。’我就把儿子被害的情况向他说明了一下。正好这时领事馆内一位中国雇员在场，就和那位领事馆官员耳语了一番。接着，便把我的有关文件、资料递进领事办公室。当那位官员从领事办公室出来后，态度更好了，请我和赛圃到另一间办公室交谈了一番。我简单地向那位官员阐述了我的身世以及我要求赴美定居的原因。听罢，他明确地说：‘你可以走了。’我俩走出领事馆时，外面申请出国排队的人们埋怨说：‘就这一对谈的时间长。’我俩闷着头走，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以往的压力和不快也仿佛消失了。”

我从申请出国到办完手续，没有遇到一点刁难，这是出乎意料的。1990年元月份我拿到签证，2月，我动身赴美。在旅途，我在想：“美国的生活环境是否能适应？赛圃对我的态度如何？双方感情发展如何？一切都是未知数……”

幸福美满小家庭

“我抵达纽约那天，天上飘着小雪花，阴冷阴冷的，寒气逼人。下飞机后，赛圃和十来个亲友迎了上来。跑在头里的是一个手捧鲜花的小男孩，当小男孩把那束鲜花塞到我怀里时，赛圃说：‘这是你的儿子林威。’机灵的儿子马上凑到我的脸上，亲热地叫道：‘妈咪！’顿时，一股暖流灌进了我的全身！……进了家门，一条白色的长毛狮子狗，不停地向我摇尾巴。屋子里敞亮极了，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家象个家样子。在大陆，省级干部也没有这种条件。女儿很懂事，在大学攻读经济管理学。儿子读小学，很可爱，每天由姐姐开汽车送他到学校。通常，赛圃上班，儿子女儿上学，家里留下我一个人。安静而舒适的环境对我很合适。”

“由于以往长年的精神摧残，使我的身体素质很差。赛圃硬是规定我：在家安心静养。平日多半是读书、看报、听听音乐、看看电视、种种花、料理家务。到纽约将近一年了，几乎春夏秋冬四季花我都种了：郁金香、杜鹃、玫瑰、日本海棠、大丽花、一品红、菊花、夜来香……”

张宁的家在新泽西洲,这是赛圃在三年前花了20余万美元买的一座连栋新砖房,三层楼,三卧、三浴、二厅、一厨,另外还有汽车房、后花园。环境不错,购物也方便。

张宁热情地让笔者到处参观一番。张宁的卧室,是一套高雅的白色基调的意大利组合家具。在笔者的导演下,张宁和赛圃在梳妆台前合了影。这张照片谁都满意,张宁笑得甜美,赛圃特象林彪。(见文头照片)

赛圃特地从中国城采购了许多空运来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磅平均3只,每磅价20美元。由张宁掌勺,由于厨房设备齐全,很快,张宁就端出了一桌菜:水晶扣肉、油淋鸡、白灼虾、凉拌海蜇皮、干煸龙须菜、西洋排骨汤、清蒸大闸蟹等。张宁的烹调手艺还真不错,色、香、味俱全。赛圃和我们都不会喝酒,就张宁一个人会喝,酒量还不错,吃蟹也非常内行,还

不时地帮赛圃剔蟹肉。

张宁说,在南京,我从来不做饭。出国前,妈妈说:“大丫头,你不能再象现在这样了,什么都不会做,要出国组织个家庭,你样样都得学、都得做啊!”临出国了,妈妈还逼着我学这学那。我自己也想:如果到了异国他乡,仍象在国内那般任性,那我就完蛋了,到纽约后,当我把做好的第一顿饭菜端上桌,生怕赛圃和孩子们说不好吃。没想到,先生、儿子、女儿都说好吃,真的很好吃,我高兴极了。赛圃说:“做得很好嘛,怎么你说不会烧饭呢?”“他哪里知道,我临出国前,赶忙学烹调,练了不知多少遍了。赛圃不仅会吃,而且嘴刁,第一顿饭菜能得到他的夸奖,我的心也就安了。”

(离离摘自香港《镜报月刊》)

马湘兰墓辩误

陶恺

秦淮名妓马湘兰,名守真,因擅画素兰,故号湘兰。她的墓地,《秦淮闻见录》云:“相传江宁南城外瑞相院后丛竹中为马湘兰墓。”(瑞相院在今白鹭洲公园碧峰寺附近)后人言湘兰韵事者,大都援引此说,甚至有“画到兰心留素素,死依僧院亦空空”之句。其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袁子才《随园诗话》曾有辩证曰:“相传江宁南城外瑞相院后丛竹中,为马湘兰墓。严侍郎冬友曰:瑞相院后之墓,少时亦误以为湘兰,后往访之,见题碣云:‘新安贞女某氏之墓’。碑阴载:为某商人之妾,商人不归,守贞而死。陈楚筠制锦曾效长吉体,为诗证明其事云:‘古钗耿耿蚀黄土,千岁老蟾啼秋雨。苍茫落日掩平坡,风入黄蒿作人语’。‘新安山高江水遥。卷菰原不生倡条。贞魂夜月光晓,儿童莫赋西陵草。’”陈作霖《东城志略·志水》:“过孔雀庵(一名因是庵)。寻守真(马湘兰字)手植朱藤,清阴散馥,经门外玩月桥,证色空之旨,得真诠焉,黄虞稷诗马湘兰宅作招提,大彻大悟矣。”根据黄的诗,可知孔雀庵乃是马湘兰宅所改建。马湘兰是信佛的,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其临终时“燃灯礼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这正是释家的遗风。而舍

宅作寺,是中国佛教徒的传统。清初诗人顾与治《同杜于皇饮眺孔雀庵》诗自注中也说:“孔雀庵左为马湘兰故居,今废为野圃蔬畦。”可见,由于战乱兵灾,马湘兰故居已是楼台已尽曲池湮,成了荒园野圃,而葬于故居的坟堂更是荡然无存。其他所谓马湘兰墓则是后人以讹传讹附会而成。

南京交通界文化建设一项新成果

1990年版《南京交通年鉴》出版

由南京交通年鉴编委会主办、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版《南京交通年鉴》已经创刊发行。内容包括市内公共交通、水路、公路、港口、铁路、民航、管道、联运、船舶修造、汽车维修、邮政、电信内容。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交通年鉴,在全国也属首创之列,今后将逐年出版。该书为豪华型精装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装帧考究,印刷精美,目录中英文对照。一手在册南京交通了如指掌,案头备读石城运输成竹于胸。欢迎交通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驻宁单位及海内外经济界人士征订。

联系人:胥卫 电话:647772

地址:南京太平北路35-2号

《南京交通年鉴》编辑部

黄宗仰与栖霞寺



孙宅巍

素有“革命和尚”之称的黄宗仰，在其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最后结缘的一座寺院，就是南京栖霞寺。

黄宗仰是江苏常熟人，原名浩舜，又名用仁，法名宗仰，别名乌目山僧，又号印楞禅师，祖辈与父辈均在常熟南门外开设黄大隆米行，母亲赵氏虔诚信佛，是虞山三峰清凉禅寺的忠实信徒。宗仰16岁时，因不满父兄逼其学掌店事，愤而至三峰清凉寺削发为僧。在那里，因得名师王伊悉心教导，博览群书，故精于古代诗词、释家经典，旁及书画琴棋、园林艺术。他虽身入空门，但以激越豪情，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之中。1903年发生举国震惊的“苏报案”后，他曾为营救章太炎、邹容（字威丹）等革命志士而到处奔走，撰《“驳康书”书后》、《寄太炎》、《再寄太炎威丹》等诗，猛烈抨击保皇派，热情颂扬章、邹的革命精神。

1920年，黄宗仰来到南京栖霞寺朝山。他的到来，乃应栖霞寺法意老和尚之坚请。栖霞寺自清咸丰时毁于战火，现寺产已为江宁县改作他用，仅有几间破屋，勉强供法意老和尚等僧人栖身。法意希望借助宗仰的巨大声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复建寺院，重振佛事。

黄宗仰到后，首先据理力争，并得到友人的奔走斡旋，将原属栖霞寺的山地寺产，一应收回。接着，由他出面化缘，广集资金。许多政界要员、文人学士，纷纷解囊捐助。在众多的施舍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时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先生。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困难时期，他本人也因桂系军阀的排挤，离开了革命的大本营广州。但是，当

他得知黄宗仰准备修复栖霞寺的消息后，仍给予大力支持，捐助了银元1万元。

提起黄宗仰与中山先生的交往，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03年夏，黄宗仰因支持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被迫逃往日本。当他得知孙中山自越南抵达日本横滨后，便慕名往访。中山先生与他一见如故，留他住于自己居室振华商店的楼下，餐叙与共，遂成莫逆之交。这年9月，孙中山将离日赴檀香山时，黄宗仰资助旅费200元，为他饯行，并作《饯中山》诗一首。其诗云：

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

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妣河山复故吾。

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莫新都。

伫看叱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

这首诗，情真意切，充分表达了黄宗仰对中山先生的敬仰和对革命事业的热望之情。17年后，孙中山捐资重建栖霞寺，是他对于这位“革命和尚”的一种回报。当时的江苏、南京地区，毕竟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地方，中山先生在民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孙中山对重建栖霞寺的支持，使各方的支援更加踊跃，也大大增强了黄宗仰修复寺院的信心。

为了便于运输修建物资和前来观光的人士，沪宁铁路局特将南京郊区的松树林车站移至栖霞山。一时间，各方士众移集栖霞，在荒芜的山坡下，建立了20余座芦棚，作为招待住宿的场所，真可谓盛况空前。作为栖霞寺的主体建筑毗卢宝殿，也迅速拔地而起。

可是，就在毗卢殿即将落成的时候，黄宗仰因长年为革命和宗教、文化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于1921年7月在栖霞寺的僧舍中圆寂。

黄宗仰圆寂后，他在常熟的侄子黄幼臣、侄孙黄国钟本拟扶柩归里，葬宗仰于他最初出家的三峰清凉寺侧。但是，由于栖霞寺僧人和南京各界人士的诚挚要求，最后黄宗仰的遗体还是葬在了栖霞山麓。宗仰弟子惟德等人，在栖霞寺大殿之后，建乌目山僧宗仰塔一座，以作留念；章太炎亲撰“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追述了他与黄宗仰的交谊。人们以敬仰的心情，永远怀念这位中兴栖霞的一代宗师。

（责任编辑 弄明）

蓬勃发展的南京市“三资”企业

中共南京市委政研室 梁学忠 王鲁宁

南京市正式批准的三资企业,到1991年3月底已达148家,投资总额为6.96亿美元(注册资本为3.01亿美元),其中合同外资金额达2.83亿美元,外资比例为40.6%,到去年底,正式开业投产的有66家。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市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已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支新生力量。

回顾我市兴办三资企业近7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至1987年,以中小项目、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探索阶段。这个时期全市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6家,投资总额为3969万美元。其中投资额在6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有12个,占46%;20万美元以下的有3个;4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只有3个,最大的项目是秦淮区的状元楼酒家,投资额500万美元。在这些项目中,从事商业、饮食、服务、维修的企业近半数。

第二个阶段是1988年至1989年,以一批与大的跨国公司合作的技术、资金密集型项目为标志的提高阶段。这个时期全市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3家,投资总额为56848万美元。两年兴办的三资企业数和投资总额与第一个阶段的4年相比,分别是2.4倍和14倍,其中投资总额在100万至500万美元的项目达22个,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达9个。它们的项目数虽然只占这个时期的49.2%,但投资比重则高达97.9%。其中投资额在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有6个,上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就有2个。投资外方的层次,也由中小型企业甚至是一些小型的贸易商,向有较强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和公司发展,有的是以政府贷款、国际财团资本为后盾的,其投资项目的技术先进程度明显提高。

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以来,以吸引台资,兴办独资和出口型、先进技术型企业为重点的发展阶段。上半年,全市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9家,投资总额为8872万美元,其中台资项目占了一半以上,属于出口创汇、先进技术两种类型的企业,占新办企业的40%以上,使全市“两型”企业的比重由前7年的

25.8%上升到今年的29%以上。此外,独资企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同时也标志着我市三资企业的发展逐步进入了成熟的生长时期。

经过近7年的努力,我市三资企业已形成相当的规模,表现出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外资来源呈多方位,有来自西欧、美国、日本、东南亚和港台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二是外方投资者呈多层次,不仅有象荷兰飞利浦、联邦德国巴斯夫公司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和依靠政府资助、国际财团支持的外商,也有一大批拥有中小资本的企业;三是外资投向呈多元化。三资企业涉及的行业较广,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以及服务等12个行业,但又相对集中,特别是化工、电子、机械、轻纺工业的项目数和投资额占绝大多数,分别占三资企业总数的86%和投资总额的89.2%。从我市三资企业来看,生产型企业占86.9%,已初步形成了大中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与技术、资金密集型项目并存的格局,发展的势头方兴未艾。

三资企业的兴办和发展,给我市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已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强化了支柱产业的实力,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市三资企业发展的特色之一,是围绕支柱产业来进行的。1988年以来的7个千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中的6个都集中在电子、化工、建材等行业。其中有年产160万只彩管及其配套偏转线圈的华飞彩色显示系统有限公司;有年产1650万只节能荧光灯和1898万只玻璃管的飞东照明有限公司;有年产600万张平板荫罩的电子网板有限公司;有年产5万吨已内酰胺的东方化工有限公司;有年产1万吨不饱和聚酯树脂的金陵巴斯夫树脂有限公司;有年产140万重量箱浮法玻璃的金陵玻璃工业有限公司。这6个项目的投资总额占这个时期全部项目投资总额的82.6%,它们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替代进口。这些企业技术起点高,既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硬件”设备,又获得了不少国外先进配方、专利和技术诀窍等“软件”技术,使合资企业的产

品技术能级高,有较强的竞争能力。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可以增加产值 28.5 亿元,提供利税 8.9 亿元,更重要的是对优化一些行业的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对于提高南京地区的综合配套能力,进一步突出我市电子、化工、建材等支柱产业的优势,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华飞彩色显示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就能实现年产值 21 亿元,利税 6 亿元。东方化工有限公司的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可以使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的产值、利税翻一番,而且可以改造国内化工原料结构,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及替代进口。同时,由于这些大型项目的建成投产,使南京的产业优势更加明显,将会极大的促进工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提高工业生产的组织程度和整体水平。

——引进了技术和管理,使一批企业面貌焕然一新。我市 70% 以上的三资企业是以中方现有企业的部分或全部的厂房、设施、土地等作为投资与外资结合而成的企业,这种“嫁接”式的合资方式,打破了新办企业先“建庙”再“开张”的常规,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资产,只花少量投资与外商投资结合购进先进设备,很快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些企业通过对海外先进技术设备的直接利用和逐步消化吸收,促进了产品开发和质量的提高,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它们按照国际惯例、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和经营,加强和改善了企业管理,提高了综合素质,使外销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增加了出口创汇。南京搪瓷总厂与香港中律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三星电气珐琅有限公司,就是以老厂为依托,利用老厂兼并南京第二手表厂的部分厂房,生产多功能电子电炸锅,产品全部出口。从协议正式签字到投产,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由于产品的质量高、档次高、附加值高,投产的速度比较快,经济效益显著,外方投资的比例已由 30% 增加到 40%,投资规模也由 100 万美元扩大到 525 万美元,并准备继续增加投资。南京古尔兹制泵有限公司由外方出任总经理,3 年来先后投入 350 多万元的资金改造了铸造车间、金加工车间部分车床和试验中心,使企业的技术装备、工艺水平迅速提高。他们引进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企业的发展跨越了若干阶段。目前已能生产 76 个型号 328

个品种规格的产品,其中有 7 个型号 41 个品种规格的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去年已出口的产品和签约的合同超过总产量的 30%,创汇突破 100 万美元。南京万里皮鞋厂与台商合资兴办的南京弘奕鞋业有限公司,采用现代化的大生产方式,改造了制鞋业传统的劳动组织和分工协作,一个只有 520 多名职工的企业,年产量相当于拥有 2000 多人的南京万里皮鞋厂及其协作单位年产量的总和。这个公司的产品全部出口,目前已达到年产 100 万双鞋,创汇 500 万美元,实现利润 50 万美元的设计要求。

——产生了关联效应,带动了众多企业的协调发展。去年,全市投产的 44 家三资企业实现产值 1.15 亿元,利润 860 万元、创汇 734 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投产的 52 家三资企业实现产值 1.03 亿元,利润 934.8 万元,创汇 675 万元。这些三资企业取得的外汇,按国家规定,有很大部分进入外汇调剂市场,提高了外汇融通能力。受到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创汇表彰大会表彰的我市三资企业创汇大户——三福时装有限公司,所需的色织布、印染布、毛料、呢绒、棉线等原料和辅料,基本上都是依靠省内和南京地区印染织布企业供应的,同时它还和我市的 8 家服装厂建立了加工协作关系。不仅如此,三资企业的产品质量、经营方式和企业形象也在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旧观念和旧方式。中外合资的南京中萃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雪碧”,去年以来大闹石头城,几乎引起了南京饮料市场的一场“革命”。103 家软饮料生产厂中,有近半数因无力改善卫生和管理条件而纷纷停产或转产,但也有众多厂家在“雪碧”的强大压力下,奋发图强,通过加强和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开发新品,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企业素质,闯出了新路。南京益民食品厂去年上半年饮料产量比前年同期增加 15%;青龙山饮料厂前年亏损 20 万元,去年上半年却赢利 10 万元。南京地区已经投产和将要投产的三资企业就象对外开放的一扇扇窗口,使我们通过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世界市场的信息。三资企业的兴旺发达,必将促进我市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责任编辑 华云 海鸣)

乐氏家族的同仁堂 与乐笃周其人

同仁堂,清康熙八年(1669年)由乐尊育在北京创办,其制售的中成药由于配方严谨,用料讲究,疗效显著,深受大众信赖,同时也博得达官贵人及皇室的青睐。曾因一度为御药房提供药材,配制药而声誉显赫。长期以来,同仁堂始终为乐氏家族独办世传,故称“乐家老铺”。

乐笃周先生系乐氏家族第十三代嫡传。1894年1月出生在北京,自幼受家庭熏陶,在北京、天津中学读书时又受新文化思潮影响。1911年,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自费赴法国留学。在留学的十二年里,他先后考察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十几个国家,并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管理。特别目睹了德国、法国当时医药界对我国传统中药古方的收集研究,并采用先进的技术对60多种中药材(如当归、肉桂、大黄等)的药学分析研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3年,乐笃周先生学成回国。当时,北京同仁堂的生产经营仍沿袭家族的传统管理,特别是四大房之间长期各自为政,用本房的名义在全国开设了许多乐家老铺店、堂、铺号,相互竞争。这样就给觊觎同仁堂乐家老铺牌号的奸商以可趁之机。国内许多大城市中假冒同仁堂牌号的伪劣药品充斥市场。乐笃周联想国外所见,提出了实行“大同仁主义”的主张和“革新中药”建议。由于他的主张和建议侵犯了各房的利益,最后以失败告终。

创办南京分号 饮誉海内外

1926年初,乐笃周受家族的委派,来南京建分号。他选中了当时南京商业集中,居民居住密度最高的繁华闹市三山街的西南口中华路,并购下了中华路31号(现218号)和白下路36号(支号)的六百多平方米的房地产。1928年在原中华路218号旧房基础上翻建了二层楼,至1929年,共投资4500万元(旧币)的“北京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经国民政府社会局批准正式开业。1929年5月间,南京、上海的《民生报》、《申报》等报刊发表了“北京同仁堂

南京同仁堂制药厂的创建与发展

厂长 唐富春

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旧称南京同仁堂),在南京正式开业的消息,以后又陆续刊登了产品广告。

创办后的南京同仁堂,“一切资金、货物概由北京同仁堂拨付,所有员工皆有北京同仁堂派遣,所得盈余均交北京同仁堂支配,为乐氏家族共有”。乐氏家族“四大房”的二十五位股东委派乐笃周负责管理。起初,南京同仁堂以后坊加工、生产同仁堂的各类剂型产品,前店经营成药、饮片、参、茸等药材。其生产工艺、技术质量标准 and 经营管理均与北京同仁堂一脉相承。1933年,又在中华路218号原址上新建成1400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欧美”风格的生产营业大楼。1935年又在中央商场(今人民商场)内开设支店,形成中华路南京同仁堂总号,下设白下路支号、中央商场支店的融生产、加工、经营为一体的规模。1938年又在中华路附近购下葛姓的359平方米的房屋,用于扩大生产加工车间。1948年,又在台湾台北设分销处。到1949年4月前,南京同仁堂的投资规模、生产品种、销售量均为南京市国药业之冠,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势头看好,而且还远销东南亚、港澳等地区,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信赖和赞誉。

继承传统 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同仁堂是南京唯一保留下来的自产自销中成药、药材、饮片的老字号,经济上仍接受北京同仁堂总号的监督管理。1954年后,南、北同仁堂一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1955年南京同仁堂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实行归口管理更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原店堂由中药公司承租,保留经营特色。1969年南京同仁堂制药厂因扩展无地,由原址迁入中华门外现址。现占地面积有35506平方米,建筑面积28600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885.82万元。

南京同仁堂制药厂继承传统精粹,融于现代化规模生产管理。大活络丹、牛黄清心丸、乌鸡白凤丸、虎骨酒等传统品种生产与北京同仁堂犹如南箕北斗,交相辉映,享誉海内外。大活络丹、牛黄清心丸获

产品上档次 技术上水平

——南京第一医疗器械厂
依靠科技推动企业发展
宋汉平

近几年来,南京第一医疗器械厂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坚持依靠科技进步,采用高新技术大力开发新产品,推进了企业长足发展。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三年以30%的速度递增,连续三年被评为江苏省医药行业科研、新品开发先进单位,1990年该厂跨入了省级先进企业行列。

南京第一医疗器械厂是我市唯一生产医疗器械的专业厂家,有着30余年生产放射设备的历史。其前身是南京市清洁管理处于1958年大跃进时代开办的南京卫生机械修造厂。6年前,该厂由于技术落后,设备老化,产品档次低,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1984年后,厂长胡文森等新领导班子成立,改变经营策略,决定依靠科技进步来振兴企业,力求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的产品档次高,技术新来适应迅速发展的医疗器械市场变化。为此,这个厂在全厂职工中反复宣传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道理,制定了一系列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措施,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几年来,通过广泛收集科技情报信息和市场调查分析,该厂紧紧依靠占职工总数25%的科技人员,陆续开发了近10个效益好、市场潜力大的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获得了成功。在这些产品中,有7个品种19次获部、省、市科技进步奖、优秀新产品奖和优质产品奖,有两项成果被载入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1979~1988年重大科技成果选集》,有3个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由于新产品的不断开发,该厂现已全部淘汰了84年以前的24个效益差、技术档次低的劳动密集型的老产品,优化了产品结构,赢得了市场信誉。

在新品开发上,这个厂特别注意“高、新、特”这三个字。高,就是新产品不但要运用高技术,还要有高附加值;新,就是新产品要有创新设计,应该是真正的新产品,不搞重复,不和同行在一股道上争;特,就是新产品设计要有特色,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例如该厂生产的中频手术X线机,设计上采用了八十年代国际上才兴起的X线中频技术和数字电路技术,直到现在这个产品在国内仍是该厂独家生产,不但独树一帜,产品畅销,而且为替代进口产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该产品先后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江苏省优秀新产品金牛奖和优质产品奖。又如该厂根据荧光屏透视将被淘汰的预测,结合国际创新设计,开发了一种国内外没有的遥控透视X线机。解决了医院门诊透视图像分辨率低和射线防护差的两大历史难题,替代了落后的荧光屏透视,很受用户欢迎。1990年该产品被定为国家级新产品。

由于该厂重视依靠科技进步,运用高新技术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该厂主要产品产销量都居全国之首。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为企业的发展积累了必要的资金。今年1至6月份,这个厂的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靠科技进步推进企业发展,使该厂尝到了甜头,为了进一步推进企业发展,该厂目前正在研制开发计算机控制的新型X线机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BRS”基本放射系统。这些都是国内空白的项目,并已着手预研更高层次的X线数字化新技术。
(责任编辑 海鸣)

国家经贸部“出口产品,品质优良”称号;产品中,排石冲剂、石斛夜光丸、牛黄消炎丸、羚羊角粉等分获银牌、部优、省优称号。国内首创的纯中药制剂治疗结石的排石冲剂、抗结核药优福宁胶囊、治疗冠心病的舒冠片等,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南朝鲜、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自1979年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以来,已连续十年获省医药系统、市经委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称号,1988年获省级先进企业称号,1989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南京同仁堂制药厂在“七五”期间,不断地进行了技术改造,引进采用了先进设备和检测仪器。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均得到提高,并与国内、国际上的贸易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八五”期间将致力于科技改造,以谋求获得更大的发展。

南京同仁堂制药厂以解除患者病痛为己任,今后将为振兴中药事业,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海鸣)

注重旧城改造建设

配套设施日益完善

南京市白下区城镇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 陈恩富

城建开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崛起的新兴行业,根据市政府简政放权,旧城改造实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城市建设方针,采取市、区两级开发的办法。1984年5月,区委、区政府决定撤消统建办,成立“白下区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从此,白下区城市建设走上了“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健康发展轨道。

公司成立以来,区委、区政府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东配套、中拓路、西开发”的开发战略原则,首先开发了中山门小区、光华苑小区,并着手完善原统建时期的瑞金新村、瑞金北村、兰旗街、象房村等几个住宅小区的配套建设。在工作实践中,迅速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见缝插针,分散建设”转向按南京市总体规划进行建设;二是由依靠国家投资为主转向吸引社会资金为主;三是由单一住宅建设转向服务配套,基础设施相结合的综合开发建设;四是由单一的旧房改造转向与改善综合治理居住地区环境相结合。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为适应开发工作的需要,1987年区委、区政府决定成立区开发公司一、二、三、四工程处,使我区城镇开发建设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新阶段。

公司及时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始终坚持以服务取得支持,以质量获得信誉,以速度争取效益,“保本微利,旨在服务”的根本宗旨,注意社会效益,树立“旧城改造,造福于民”的基本思想,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争朝夕,大干快上。共吸收社会资金2.5亿元,先后开发建设了王府园一、二期、钓鱼巷、光华苑二期、西一巷、洪武路、二条巷、文昌宫、马府街、红花地、科巷等15个小区28个片点,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安置居民一万多户,并从开发前的人均居住面积5.2平方米增为7.3平方米。全区24万

人有4万人通过开发改善了居住条件,把党的温暖,政府的关怀带给了千家万户,受益面之广,社会效益之显著,是从未有过的。

在旧城改造和小区建设的同时,公司还为区文教、卫生、街企、商业、派出所、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建中、小学教学楼、幼儿园、食堂、音体房、校办工厂等总面积达25195平方米,投资667万元。新建教师住房15688平方米,投资了549.08万元。新建区文化馆、街道、派出所办公楼、文化活动中心以及“有偿代养”的光华园、老年公寓、老少之家等5686平方米,投资245.5万元。新建卫生防疫综合楼、卫生院、所、公厕、垃圾站等卫生、环卫设施4661平方米,投资231万元。翻新扩建商业网点为33768.5平方米,投资218万元。拓宽洪武路、四环路、文昌巷、太平巷、慧园街、白下路,投资1000多万元。公司成立以来,用于配套建设费高达3000万元,为改善区机关干部和职工住房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公司逐步壮大成长,公司人员从成立时30人(其中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人员10名),发展成现有职工106人(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人员71人),人员素质不断提高,施工现场管理、工程质量步入上乘。1989年度省九项优良工程,我公司就占二项,在全市开发行业中走在前列,1987年被评为南京市50项奋斗目标先进单位;1989年、1990年连续二年被评为建设新南京的有功单位,多次被评为区的有功单位和先进单位。公司将再接再厉,切实加强职工的思想教育,提高全体职工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力争为城建事业多做贡献。

(责任编辑 吴纪岫 海鸣)



省、市委联合召开纪念毛主席《送瘟神》诗词发表二十周年大会

南京血防四十年

吴蔚庆

血吸虫病是世界上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我国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血吸虫病传播途径是患病的人、畜排出带虫卵的粪便，在水中，虫卵变成毛蚴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尾蚴，此时尾蚴即可通过皮肤侵入人畜体内寄生，损害肝、肠等组织。一部分人可出现腹水、巨脾、侏儒等晚期严重症状，患者丧失劳力和生育力，甚至危及生命，如有大量尾蚴侵入身体，则成急性血吸虫病，短期内即能产生严重症状而导致死亡。

南京市郊区在1936年就有血吸虫病流行，造成许多村庄居民大批死亡。呈现一幅“行人面枯瘦，肚大田地荒，白发哭黑发，新土四季埋儿郎”的悲惨景象。浦口区五马村解放前30户人家，173人中就有111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7户死绝，村里找不到三代同堂的人家。有个叫金老五的一家14口无一生还。侥幸活下来的年轻人大都成了小侏儒，民谣说：“九礁十八宫，出来小伙子也不凶，走了十里路，出了几痨恭（大便），走到江浦县，裤子拉了个大窟窿。”栖霞区摄山湖堤村有16户人家死绝，村中劳动力就有60人死去，全村患病率达98%。长江乡马渡村有个叫黄大清的农民，因患病到晚期，腹水肚大如鼓，他自己难以忍受，用钉子往肚皮上戳洞放水，最后痛苦死去。民谣说“马渡是片芦苇滩，灾民落户来度荒，风扫地，月当灯，蒿子马兰当主粮，瘟神处处有，逃不掉水蛊胀，皮包骨头胀破肠。”

由于历代统治者根本不关心人民疾苦，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加上封建迷信思想，致使血吸虫病逐

年蔓延流行。

血吸虫病不仅摧残疫区人民，而且对军队的威胁也很大，在1949年夏季正当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追歼残敌之时，驻浙西太湖地区的某部在水上练兵时遭到血吸虫的侵袭，暴发了急性血吸虫病，万余名指战员纷纷病倒，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刚获新生不久的南京市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防治血吸虫病的活动。

1、首先建立血防的领导和专业防治机构。

在1950年1月就成立了“南京市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并由13个公私立医院学校的三百多名医务人员组成了“血吸虫病防治大队”，奔赴军营为指战员治病，解除了血吸虫病对部队的威胁。1951年1月南京市在浦口、浦镇地区建立了全市最早的专业机构“南京市两浦血防站”，后迁至燕子矶改为“市血防医院”。1956年起，正式成立了“中共南京市委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成员由市委领导负责各有关部委办局领导组成，下设血防办公室。同时在各流行区县都建立了血防站，后改为防疫站，进行了防治活动。

2、大力进行血防知识的宣传教育。

针对群众不懂血吸虫病知识和封建迷信思想，血防人员采用图画、标语、幻灯、钉螺标本、尾蚴现场用显微镜观察以及有线广播电台、报纸等方式，使群众对血吸虫病危害有了正确认识。1956年中央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下达后，宣传掀起高潮，这一年编

印防治讲话材料 3.5 万份,挂图 3.5 千份,召开群众会 349 次,受教育达 7.9 万人;在农民识字班和市民夜校也插入血防课程,学习的达 16 万人,以后每年都加强血防宣传。

3、开展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措施。

消灭钉螺是切断血吸虫病流行的重要一环。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四十年来,疫区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灭螺,作出了巨大努力。解放初期在两浦区动员居民捕捉钉螺,后采用开水烫、火焰喷射、土埋、工业废渣填压等方法灭螺,58 年后采用拖拉机翻耕的方法以及试用硫酸钙、666 粉、五氯酚钠等化学药品灭螺。70 年代起采用拖拉机深耕与药物灭螺相结合的方法,钉螺迅速减少。全市到 80 年钉螺面积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从 70 年到 90 年,疫区群众累计灭螺 34425 万米²,完成灭螺土石方 3465 万米³,有效地降低了钉螺的密度和面积。

4、积极查病治病,挽救了大批血吸虫病人的生命。

刚解放不久,由于病人多,只有一个新建的血防站,15 个医务人员,治疗范围难以扩大。56 年后普查普治进入高潮,在南京市立第四医院及四个区医院开设了 500 张病床,中西医结合治疗。58 年全市组织 58 个市属、部队、厂矿医院、卫生所的 247 名医护人员,对市各区血吸虫病病人包干治疗。60 年代初南京连续三年爆发大批急感,治疗主要抽调数百名医护人员分成数十个小组采取“划片定点、小型集中,医药到队、就地治疗”,控制了病情的发展。70 年代病人逐年下降,到 80 年代前期,病人基本控制在千人左右。对晚期病人则先采取中医治疗,后用西医的办法,挽救了许多晚期病人的生命。治疗药物起初用浦石酸锑钾静脉注射,由于毒副作用大,易造成死亡,后改进为口服治疗,八十年代后期主要用吡喹酮药品口服,疗效高,安全简便,突破了治疗上的难关,使绝大多数患者得到及时治疗。

5、查治耕牛,进行水改粪管工作。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疾病,对耕牛危害也较大,同时病牛又是主要的传染源。南京市在 1952 年调查就发现耕牛有血吸虫病,58 年后进行大规模治疗,仅 1970 年就组织 3874 人参加查治耕牛,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治,80 年代初基本控制了耕牛的感染。为了避免人畜粪便污染水源,51 年起就开始进行粪管,方法是把粪缸扛移水源处搭棚加盖,之后又建起

大贮粪池,密封杀死虫卵后再作肥料用,还在一些地区建起公厕和沼气池。水改则采用分塘用水,开挖水井。80 年代后有的疫区逐步建起了自来水,大大减少了血吸虫感染的机会。

经过四十年的防治,取得了巨大成效。1980 年南京已接近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到 87 年已有高淳县及 36 个乡场达到消灭标准,累计治疗近十万病人,患病率由解放初期的 30—50% 下降到 1.7%,钉螺面积下降了 80%,其中内陆地区下降了 97%,疫区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的“大肚子村”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昔日的害人滩变成了米粮仓,过去的病人变成了健康的劳动者。浦口区五官村 90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68 万元。人均收入 703 元。栖霞区摄山乡东湖村(即过去湖堤村)90 年工农业总产值 420 万元,粮食产量 207 万斤,人均收入 820 元,全村人口 1894 人,现有病人仅 42 人,高淳县丹湖乡龙潭村 90 年人口有 1221 人,仅剩晚期病人 17 个,都得到了治疗,80 年以来有 6 人参加了军,社员人均收入 527 元,有 315 户盖起了瓦房,邢心梅今年 64 岁,曾是晚期病人,经治疗后现身体健康,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

为此国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南京市仅从 70 年到 90 年间共用血防专项经费 930 万元,施用灭螺药品 5646 吨,相当于 626 万元,总计 1556 万元。用于补贴灭螺的粮食达 271 万斤。疫区的群众深深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和血防医务人员,使他们摆脱了瘟神的魔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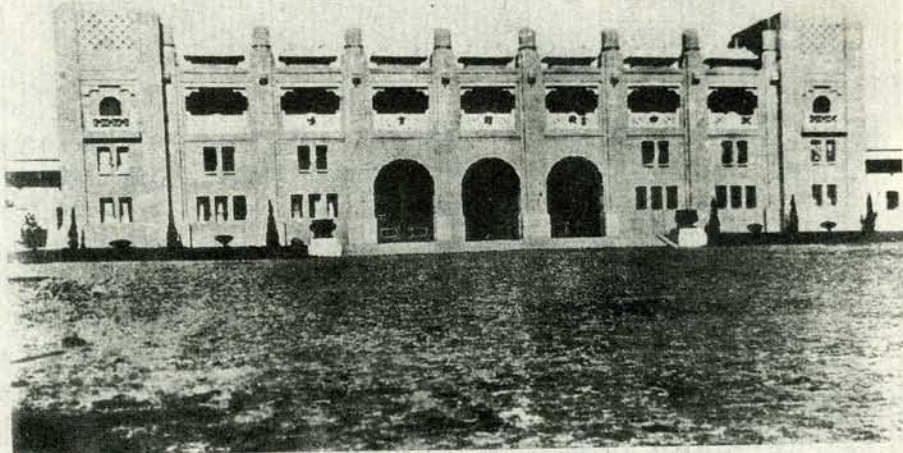
但是,八十年代后期血吸虫病疫情又有所回升,钉螺面积以每年 25% 速度递增,特别是近两年又发生了几百例急性感染病人,耕牛阳性也逐步上升,主要原因是:(1)长江新涨江滩增加,钉螺扩散,受长江水位影响,灭螺成果难以巩固;(2)血防领导和机构尚不健全,专业队伍缺编且人员不易稳定;(3)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后,血防贯彻国家、个人合理负担的政策难以落实;(4)血防科研尚无突破性进展。

因此我们要警钟长鸣,再次掀起送瘟神的高潮,逐步充实血防专业人员,稳定血防队伍,认真制订好血防“八五”规划,并纳入社会事业发展目标中去;加紧血防科研,力争血防有新的突破。

(责任编辑 宁宁)

原首都中央体育场

田径场正门



南京东郊风景区,青山绿树环抱着一座大型体育运动训练基地——南京体育学院。它的前身就是原首都中央体育场。

体育场筹建之经过

1930年,自杭州全运会开过之后,蒋介石提出要在南京兴建一座大规模的中央体育场,作为以后召

开全国运动大会的基地。同年4月,国民政府特令组织民国二十年度全运会筹备委员会,筹建中央体育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名流。筹备委员有:林森、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王正廷、蒋梦麟、刘瑞恒、吴铁城、魏道明、马超俊。干事为夏光宇、张信孚、陈小田。

体育场建筑地址是经国务会议指定在中山门外,南临钟汤路,东为野球场,西为陵园新村,北为灵谷寺,总占地1000余亩。场址面积广阔,地面崎岖不平,民坟荒冢比比皆是。场址确定后,招工整理土方迫在眉睫。5月份,筹委会会同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及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进行测量,并招标迁移地面上所有的民坟荒冢。全部土方工程是由新记公司承办的,共耗资56400余元。同时,筹委会延请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创办、主持的基泰工程设计绘图,全场建筑图样于9月间绘制完成。

1931年2月,筹委会将全部建筑工程招标,经过激烈竞争,由利源建筑公司中标承建。利源公司得标后,因限期匆促,决定立即开始动工。5月10日举行了奠基典礼。各项工程均由建筑工程师与筹委会工程股严密监察督促。为使全运会能在10月10日

如期举行,共动用了3000多工人,日夜赶造,因此工程进度很快,至8月底各主体工程便基本告竣。全部工程总共耗资140万元。

奠基礼之盛况

1931年5月10日上午10时,蒋介石偕同中央各委员,各院、部、会长及国民会议代表约三四百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蒋介石在典礼上训词说:“欲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须先养成健全之体格,故体育一端,比较德智育尤为重要。”奠基处在田径赛场司令台左方,距地约五六尺置奠基石一块,基面镌有金色大字:“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十日中央体育场奠基纪念。”另外,还置有一个铁匣子,内放有大会筹备经过报告、业务运动规则、男子篮球规则、女子篮球规则、男子排球规则、国术规则、田赛径赛全能运动规则、全场图样40张、基本工程师作法一本,《申报》及《新闻报》、《时报》、《中央日报》、《新京日报》、《民生报》各一份。行礼开始,由蒋介石执特制的银质砌刀,刀的正面刻着:“首都中央体育场奠基纪念,民国二十年五月十日”,背面刻着设计者基泰工程司、承造者利源建筑公司及筹委会全体人员名单等字,敷以泥灰,并用手抽动链条,基石徐徐下落,奠基礼结束。

全场建筑之大略

全场各项建筑,均是依自然地势构筑的,风景秀丽,气象宏伟。

田径赛场位于全场东南方向,南北长列,为椭圆形。东西两边各筑门楼一座。西门楼上,外部为房屋,用来设置播音机及水箱等,内为司令台,楼下为办公室。东门楼下系公事房,楼上为特别看台,与司令台东西相望,台畔设有男女谈话室及男女盥洗室,用意 in 公共场所中略留私人休息之处。全场四周均为看台,系用钢筋水泥架成,可容观众3万人,看台北部,利用天然地势依山筑成。看台下面有宿舍75间,每间均设有床位,可供3600余人住宿。台座的设

计比较科学,每一个人都能纵览全场,水泥台阶上铺有木板,各球台下均装有排水管。中间跑道四周长500公尺。场南北两端,各有一根数丈高的旗杆,用于悬挂国旗。

国术场 在田径场的西面,为八角形,均依天然地势建筑,正门在一边,其余七面为看台,可容5400余人,有8个出入口,门前各置有售票亭。场上铺满黄土。

篮球场 正对国术场,建筑与国术场相似,也为八角形,看台可容5000人,场址中央,用光滑地板铺成。

游泳池 在田径赛场的西北面,利用紫金山的自流井水,用铁管引水入池,并备有暖气设备。池的四周及底面,均用白磁砖砌成,长50米,宽20米,可供9人同时比赛用。入口处为办公处、运动员更衣室和浴室,是宫殿式建筑。池四壁满缀电灯,池波微动,浮光耀金。

棒球场 在游泳池对面,为扇形建筑,也是依山坡形势筑成,看台可容3000人。

跑马场 在篮球场之西,宽可与田径赛场相等,长度则倍之,场中无建筑物,四周仅跑道而已。

足球场 布置台适,形势亦佳,高耸的会场大门极为雄壮,但限于经费不足,暂时用的是木看台。

另外还设有网球场等建筑。

中央体育场全部可容纳观众6万余人。无论从体育设施还是建筑规模上讲,在当时堪称全国一流。

中央体育场的建造,动用了大量的人工,耗去了巨额资金,在南京的历史上可谓是一件大事。全运会原定1931年10月10日举行,不料因受17省水灾和“九·一八”事变的双重影响,致未能如期举行。

运动会之召开

体育场建成后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是1933年

10月10日,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第五次全国运动会。全国有33个单位参加,各省市选派的运动员超过2000人,盛况空前。说起这次运动会,其间还有一件撼人心弦的难忘之事。此次运动会召开之时,东北沦陷已两年,数千万东北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惨遭蹂躏。东北运动员刘长春等听到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的消息后,不顾危险偷偷入关,向各方募集经费,历经艰辛,终于来到南京,代表东北四省参加全国运动会。他们向全体参赛选手发表宣言:我们心目中共同竞争的锦标是恢复东北各省的地图颜色。在开幕式上,数万名观众看着他们,都有说不出的感慨,全场静悄悄的一片沉寂。突然从看台一方传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声,这口号声,激起了全场观众的悲愤,人们在叹息流泪,并由小声抽泣到大声痛哭,由一人痛哭到相互抱头痛哭。这种国难当头万人齐泣,御侮救国的抗日情感,也感染了主席台上的中央要人,他们有的悲痛地低下了头,有的取出手帕擦眼泪。在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还分别以10秒7和22秒1的好成绩创造了100米和200米两项短跑全国最高纪录,这两项纪录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被打破。这次运动会,成为一次显示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同仇敌忾,奋斗不息精神的运动会。

中央体育场建筑群,不仅当时在国内建筑界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今仍然有着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9年,该建筑群作为优秀近代建筑被核定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由省向中央申报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第十一届亚运会召开之前,又依其全部建筑作成体育场建筑群模型送往北京,用于亚运会期间展览,让世人从中了解我国精湛的建筑技艺和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

(责任编辑 淑玉 华云)

南京地方志

(注:本期因稿挤,《明孝陵神道》一稿推后两期续载。本期题花,为孙振奎同志设计)

dfz.nanjing.gov.cn

谈民谣民谚的入志问题

黑龙江省 梁滨久 蔡华伟

民谣和民谚是我国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我国各地民风民俗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是一种宝贵的地方文献。特别是农谚，它是我国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现象和生产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谣、民谚在民间广为流传，有许多民谣、民谚在思想内容上，文体形式上，都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和独特的民族风情，也包含着许多生产和生活中的科学道理。

我国古代的一些志书中，就十分重视对民谣、民谚的收录。我国当代的新编地方志，就更应重视民谣、民谚的入志问题，给其一定的地位，使其成为新方志的一项内容。下面就根据自己在修志工作中的一些切身体会，谈点粗浅看法。

地方志是地方的“百科全书”和“一方之全史”，而民谣和民谚又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所以，它在地方志书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一席之地。其理由是：

第一、它形象地反映民俗。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风俗和习惯，无论是在婚、丧、嫁、娶，还是衣、食、住、行，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有的民族还往往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运用民歌、民谣、民谚等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在我县的解放前，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东方红，金鸡叫，姐姐出门上花轿，身穿一身红裤袄，还得哥哥来抱轿。”这首民谣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东北地区汉族青年男女在结婚时的一种传统仪式。在黑龙江省的很多县志中，都把这首民谣录入志书，即：“关东城，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支大烟袋，养护小孩吊起来。”这首民谣，鲜明而突出地反映了东北地区的地方风俗。所以说民谣和民谚，是地方风俗和民族风俗的一种体现。

第二、它巧妙地衬托志文。在志书的文化或社会篇里，通过对民谣、民谚的收录，可以同各专志中的志文，互相衬托，互相弥补，从而起到表现史实、烘托志文的作用。如明水东部的丘陵地区水质不好，是克山病、大骨节、甲状腺肿等地方病、

多发病流行的地区。在旧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地痞横行、民不聊生。官府不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群众有病无钱医治，很多人因患地方病，体弱无力，行走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便从心灵深处，发出了痛苦的悲吟，他们说：“荒沙窝，病魔多，穷人有病别想活，斗米难换一付药，落得饭锅断烟火。”解放前，明水的交通十分不便，土道泥泞，坡陡辙深，道路翻浆，行车打误。所以，那时群众就有“离城三十五，进城如进府，贪半夜，起五鼓，人受累，马受苦”。还有一首民谣说：“县城好进路难行，车马几日不归城，晴天朗日还罢了，遇上雨天不安宁。”通过这两首民谣，就巧妙地衬托了明水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史实。

第三、它有力地印证历史。县志中对一县一地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较为翔实地记载，如果在文化篇或社会篇的民谣、民谚章里再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历史事件的民谣和民谚收录于志书，又可以起到印证历史，参证史实的作用。如在《明水县志》的《大事记》中，记载了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本地乡绅宋魁甲、曲恒发、吴建堂、仇镇岳、赵本兴等5户人家先后来本地开荒建村。《明水县志》的《概述》中也有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黑龙江督军、暂代省长吴俊升阅边莅临明水，讶其地面繁盛，同意地方绅士之恳情，准予在此设治。”《明水县志》的《社会篇》中“民谣”一节里，就有这样一首民谣：“宋魁甲去请县，一请请来个翟混蛋。”这首民谣也证实了请县设治确系宋魁甲等乡绅所为，而设治后的第一任设治员也确为翟兴凡其人，翟在任上犯有贪污受贿等行为。

第四、它较好地体现志体。志书本是集“志、传、记、图、表、录”等于一书的综合性文体，我们在志书中如果不把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民谣、民谚收入志书，而单纯地用记述史实的一种形式来表现，就体现不出志书这种综合性的体裁特征了。民谣、民谚入志，不仅可以起到反映民俗，烘托志文、印证史实的作用，还可以更好地体现志书的体例特征。如果一部志书只有志文，而无其它形式相衬，就体现不出志书这种文体的体例特征，同时也就起不到体例完备，文图并茂，吸引读者，烘托主题的

新方志编纂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者：著名方志学家

傅振伦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方志，其基本精神和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历史现象，如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正确地解决志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从而使地方志书成为真正的科学性史书。新志基本要求、形式与内容，旧志批判与继承，史料的搜集鉴定与运用，行文规范等，都是方法论的范围。今略论修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新方志要有科学性，所谓科学性，不仅要有科学内容，有精确可靠的统计数据，利用科学方法制作的地图、照片、图表、录音、录像以及航空摄影、遥感图象、自动化制图，还要根据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给自然现象以科学解释。如工业和农业各篇，要着重记载其发明创造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要充分反映当地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更要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因此，新志记事就要依照毛泽东思想，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按“实事求是”一语，初见《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本是“务求真”的意思，也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既是实事求是，就要尊重历史，不能歪曲事实。因此修志必须搜集人类社会的和自然界的历史等现实的情况、现象，占有大量的资料，然后作科学分析、鉴定，系统完整地，深刻地显示事物的个性或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作用。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据事直书，如实反映。有如“明镜照物，妍恶毕露；空谷传响，善恶毕闻。”不应胸怀成见，玩弄笔端，弄虚作假，夸大或缩小事实的真象。唯有真实的记录，才能从中求得正确的结论，从中探索出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既要全面，还要有重点。“方志是一方之全

史”，记载一方的历史和现状，要通述今古，全面铺叙。1951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对地志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指示》是可资参考的，其规定：“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的和综合性的，即以当地的自然富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历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成绩）三部分为陈列内容。”方志是一方情况的反映，也要仿照地志博物馆的要求，全面记述这三方面的情况。取材要广泛，文献、文物、口碑，要广求博采，而记事贵乎周备。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括政经、文教科技、社会文献人物，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下来。这样，才能起到为行政资鉴，为建设提供参考依据。但必须于面面俱到之中，又能显示其重要方面。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果，必须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中去推究，所以新方志必须重视社会经济。近现代经济，尤须以充实的内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又如重大文化建设是一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表现，其重大事件、成就，也应详为叙述。至如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新时代的革命英雄、模范人物，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极大贡献，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要大书特书，使这些爱国志士、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可贵的精神，永垂不朽，用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三、要突出地方特点。新方志要以全国历史为纲，在全局观点下，有主有次地突出地方的特点，详独特，表奇异。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祖国，由于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条件等差异，形成了各自特点。地理因素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自然环境影

作用了。所以，志书辑录民谣、民谚，它可以很好地体现志体，表现志书这种综合性表现形式的文体特征。

既然民谣、民谚在志书中可以起到这么多的重要作用，那么在编纂新方志时就不应忽视对它的收录和记载。为了把民谣和民谚记录好，就必须要注意处理好选材的问题。尽量注意选收那些有价值、有意义、有特点的谣谚，即一是要选择有地方特点的，

二是要选择有时代特点的；三是要选择有民族特点的；四是要选择有风习特点的。而不能不加选择，兼收并蓄。

总之，民谣民谚入志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只谈了一点粗浅的看法，如有不当，还望同行们多给指正。（责任编辑 海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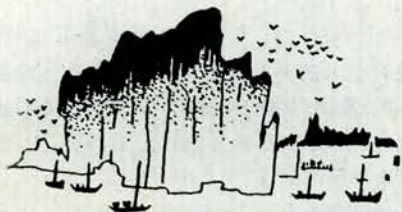
响了人类社会。城市与乡村不同,平原与山区不同,沿海与内地不同,内地与边疆不同,人们性格也不相同。因此人民生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等方式及效果与贡献,也各不相同,其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新方志要有重点地记载地方特殊事物。如自然环境、山川险要,有地方风味的店铺,名肴佳菜,著名副食品;本地的创造发明,特有的技术革新;本地剧种和民间曲调;特有的乡风民俗,地区方言;适应本地特点的学校布局和教育机构;省内知名的学校;地方病的防治;本地名药;国内和省内闻名的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以及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革命家、革命烈士、专家、学者、改革者、艺术家、能工巧匠、劳动模范及其事迹等,都是表现地方特点的重要内容与特殊重大事件。更就自然界而论,土壤、气候、水文、植被等变化,也影响了动植物的生态环境。新方志都要反映这些地方特点,以为国家提供国情、地情而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至若名闻国内外的瓷都景德镇,内江甜市,个旧锡都,全国388个自然保护区,特别是56所国家级的保护区都是重点记述之列。云南西双版纳是植物王国,有高等植物五千多种,占全国种子植物总数的七分之一,其中珍贵的稀有树种占全国四分之一,经济价值很高的植物近一千余种,药用植物有五百余种。此外如内蒙古稀土矿,康桂金矿,西藏锂矿,也都是一省矿产中的特产。再就历史而论,长安是历史上十一个王朝的国都,在西安市郊,发现过罗马金币、日本“和同开珎”银币、中尼合文经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波斯文墓志和西方人形象的陶俑,壁画和满载丝绸的陶骆驼。这些历史文物证明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和亚、非、欧许多国家有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友谊至深且厚。杭州名胜驰名今古,范成大《吴郡志·园亭卷》也突出了吴中第一的池馆林泉。“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名花天下奇”的洛阳,都是地方特点,也要在新方志中重点突出。唐人所谓“一扬二益”也能说明两座历史名城的盛况。李白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因此记载六朝名城的南京,不仅应记述其当时繁华景象,也要记述其衰落因果。

四、要突出时代特点。时代特点,是指当代特有的或与前代有所不同的特异之处,也是指对历史事物用当代观点进行分析而得出的新结论。所以突出

时代特点,就是重点地叙述闪耀着时代精神光芒的事物,用以反映时代发展规律,而体现时代的政治观点。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特点,正如曾三同志所说:“它充满了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斗争、人民的战斗,充满了人民的灾难与人民的欢乐。”这是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这是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这是我们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正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时代。”新方志应当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起,到目前为止,要反映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特点,反映出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艰苦创业的雄伟场面和伟大历程。今昔对比,可使国人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继往开来,勇往直前地前进,建成社会主义的强国。人类的历史不断发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我国在鸦片战争前,仅有落后的手工业,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我国才有了民族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才有了重工业和新的轻工业。其他如农林业、交通运输、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了蓬勃发展。社会在前进,事业在发展,这一伟大时代的急剧变化,又是新方志所应当着重反映的。总之,新志要反映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所起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上的措施和成就,以及社会上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道德、风尚。

五、详今略古。我国史志记事,一向是详今略古。因为近代去今不远,与我们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现代社会和我们更是息息相关,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与建国以后的历史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新志记载当求其详。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缔造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段记载更要详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两个阶段之间衔接部分的叙述则可略叙其概,以求贯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本届修志下限,则是新方志记载的重点。在此期间,各种斗争错综复杂,各种事物发展迅速,这实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必须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慎重妥善处理。这样不仅显示了着重时代精神,并且发挥了经世致用的作用。

责任编辑 海鸣



服务修志 办出特色

——在第三次全国省级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三次全国省级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今天在美丽的避暑胜地北戴河开幕了。这次会议是在新编地方志工作 10 周年之际召开的,因此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 10 年历程,或许对今后的工作不无好处。

省级方志刊物,是随着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开展而逐步办起来的,虽然时间有长有短,且有公开发行与内部发行之分,但作为各省、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无论是在贯彻修志领导机构的方针政策;还是组织经验交流以及方志理论探讨等方面,都对各地修志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成为方志编纂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去年数家方志刊物参加了全国社会科学期刊展览,说明我们的刊物在社会上已占有了一定的位置,为世人所瞩目。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刊物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健康的。方志刊物的数量,在全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是比较多的,在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我们的刊物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是值得欣慰的。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坚持这一好的传统,把方志刊物办得更加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更好地为修志服务。

新编地方志工作已经历了整整 10 年,在坐的都是这 10 年的见证人,特别是参加方志工作较早的同志。10 年创业,历尽曲折,步履维艰,经过广大方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新编地方志工作才逐步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方的理解,使省、市、县三级修志的格局终于基本形成。当前尽管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但全国修志总的形势应该说好的。特别是 10 年耕耘,成效初见,现已有四百五十多部各类志书先后出版问世,更多的正处于成稿和定稿阶段。已出版志书的质量状况如何呢?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根据各地组织专家、学者以及有较高水平的方志工作者,对志书进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副秘书长 孔令士

行检查的结果,作出了“从整体上看是合格的,主流是好的”这一基本估计。主要表现在:

1、已出版的志书尽管质量上有差异,水平有高低,但所有的方志工作者都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进行修志的,各级政府和修志机构,对志书的政治质量十分重视、审慎。因而到目前为止,志书中还没有发现重大的政治错误,没有发现因此而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2、各级修志机构对文献资料进行最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对社会进行最广泛的调查研究,从而使新方志的资料相当丰富、真实,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代旧志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有些长期被忽视、被埋没的资料,在本届修志过程中被发掘出来,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

3、经过 10 年探索,新方志的体例在继承旧志传统的基础上,有了许多重大的发展和创新,无论门类设置、整体结构,还是体裁运用、记述方法,都比旧志有较大的进步。

由于我们的志书具有一定的质量,因而正在逐步受到社会的重视。据有些地区反映,当地的政府部门、学校师生、新闻单位等社会各界,对新志书的兴趣正日趋浓厚。

社会主义新方志,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事业,特别是一项开创性、探索性的工作,10 年时间并不算长,更何况这样繁重的编写任务,由一支没有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队伍来承担,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这巨大的成绩,来之不易。因此,要充分肯定,以坚定信心,继续前进。

在肯定成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社会上热心方志事业的各界人士,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对方志编纂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我们要真诚地感谢他们。过去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今后仍然需要他们的支持。但社会上确有人对修志成绩持否定态度,甚至干扰修志工作。对这种不良影响,也不可

低估。

新编地方志工作,已进入第二个10年,大量志书还处于成稿、定稿的关键时期,因而,当务之急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志书的质量。为适应修志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议各方志刊物在抓好全局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

1、把提高志书质量作为刊物的长期中心工作

志书质量是个综合性的要求,所以要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念,志书的各个方面及志书编纂的每个环节都要重视质量问题。郑州会议指出已出版志书的质量从整体看是合格的。这是一个总的基本估计,但并不等于说每部志书都是高质量的。因而在质量要求上应该高一点、再高一点。

当前在影响志书质量诸因素中,政治质量和科学性是必须下功夫予以解决的两个问题。

关于政治质量,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党、政权、政治运动这三个部分,从现有的志书看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记述不足,分量和深度都不够。政党、政权部分记述不足,就不可能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决策作用;政治运动记述过于简略,就会影响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至今后的工作。

政党、政权、政治运动三部分内容记述得当,无疑是解决志书政治质量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志书的政治质量是要求全书的各个部分都要贯彻和体现正确的政治观点。地方志是官书,官书就必须如此,不能有半点随意性。历代修志无不重视贯彻统治阶级的政治观点,封建社会的志书集中体现地主阶级的意志,因而大力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国民党政府的志书是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为目的(据闻台湾近期出版的方志,反映国民党的政治观点很是鲜明);而新编地方志书必须更加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宗旨。

如何进一步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已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

志书的科学性涉及的方面也很多,但当前至关重要的依然是资料的准确性问题,这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我们的很多志书或志稿在这方面是经不起推敲的。资料失准、特别是数据的差错相当严重,出现这样的错误,往往是由于轻信文献资料或由于编纂人员的知识的局限以及粗心大意等原因所造成的。地方志是科学的、朴实的、严谨的资料汇

集,一部志书上手,首先让人发现几处资料不实,那么人家就会对全书的科学性产生疑惑,甚至给后人带来误解。这关系到志书的信誉和存在价值,决不是一个小题。资料不实是地方志的大忌,是硬伤,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希望各地刊物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应以如何提高志书质量为中心,要注意介绍各地在提高志书质量方面的措施和经验,以供借鉴。

2、加强志书的评论工作

各类志书陆续问世,刊物要重视志书的评论。我们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健康有益的评论,也就是说通过评论要充分肯定一部志书的长处和成就,这是主流,也是对编纂者数年辛勤劳动的承认,但注意不要说过头话;又要严肃地指出缺陷和不足之处,这样才能总结出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利事业的前进。

目前在志书评论中,不乏求实之作,但也确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在文章中对所评的志书,只谈成绩、一片赞扬,不说或少说不足。有的评论文章对志书的缺陷,只是虚晃一笔,回避实际问题,说什么: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玉”,仍不失为一部佳志(或曰名志)。最近我们看到有的评论文章,连“瑕不掩玉”的虚词也消失了,好象这本书什么不足也没有,自然就成为“白玉无瑕”的上乘之作。这种以“捧”代评的作法,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此类志书评论文章多了,是要损害我们地方志的声誉的。

最近还有一种不健康的风气,大有蔓延之势,就是志书出来后,由编纂部门出面组织文章,自出“评论集”,以扩大影响。一部志书的价值如何,是上乘佳品还是平庸之作,要经过社会的检验,主要是用出来的,而不是靠评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开展志书评论。开展健康的志书评论,主要是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评论以扩大志书影响,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从使用中为社会检验开辟道路;二是通过评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得失,为后来者借鉴,教训往往比经验更加宝贵。

希望各地刊物,把志书评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3、加强新方志理论的探讨研究

本届修志是在缺乏方志理论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是在摸索中前进,因而工作走点弯路是难以避免的。10年来修志工作者殷切期望马克思主义方志理论的指导。

理论来源于实践。在10年修志实践中,各地的

全国省级地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



贾辉铭 摄
全国方志刊物会议

第三次全国省级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召开

第三次全国省级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于1991年6月20日至25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地方志》、《黑龙江史志》、《方志研究》(吉林)、《方志天地》(辽宁)、《陕西地方志通讯》、《甘肃地方志》、《宁夏史志研究》、《新疆地方志》、《兵团史志通讯》(新疆)、《河北地方志》、《内蒙古地方志》、《天津史志》、《四川地方志》、《贵州方志》、《山东史志丛刊》、《江苏地方志》、《志苑》(安徽)、《浙江方志》、

《江西方志》、《福建史志》、《上海修志向导》、《湖北方志》、《湖南地方志》、《广东史志》、《广西地方志》、《海南史志》、《史志文萃》(湖北大学)、《羊城今古》(广州)、《南京史志》、《武汉志通讯》等方志刊物的代表共45人,河北省有关地、市的代表9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地方志》主编诸葛计、《河北地方志》主编卢振川、《四川

同志们结合工作所遇到的问题,也大胆地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不足,影响了理论探讨的深入,使一些问题一时难以说清。特别是新方志理论体系的建立,是要随着方志学科的形成而日臻完善的。一门学科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不是十年、二十年所可以完成的,是需要一代或两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10年修志,时间短暂,对学科及其理论的建设,只能是初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过去我们点滴的努力,都是在为学科及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在今后10年中,志书大部进入定稿、成书时期,很多同志都经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修志周期,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实践经验丰富了,更有利于有的放矢的在方志理论探讨上多下些功夫,把丰富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以指导下步的修志实践。

应该说,我们的很多同志,特别是基层的同志,在如何进行理论探讨,还缺乏经验,因而希望刊物主编和编辑同志们要善于引导和给予具体帮助。

4、要大力宣传修志战线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

199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以《生命诚可贵 事业价更高》为题,在头版显著位置表彰了山西省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优秀共产党员燕居谦同志的模范事迹。燕居谦同志身患绝症,自知时间不多,

决心抢在生命之火熄灭之前,完成县志总纂任务。因而谢绝了领导的照顾,带着患病的女儿到卦山古刹宿庙修志。他强忍剧痛,连续奋斗三个月,终于完成了县志总纂任务。3月1日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在修志系统宣传燕居谦事迹,开展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通知》后,方志界反映强烈,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燕居谦同志曾说:“集我几十年的阅历,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为革命事业无私的奉献精神。

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但又是在一定时期内不被社会重视和理解的艰苦工作。但广大的修志工作者,都出于对方志事业的热爱和历史使命感,甘愿受苦、知难而进、不问索取、志在奉献,从而推动新方志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方志队伍的主流,是我们事业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取得成绩的多种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

对于修志战线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各地方志刊物要注意及时发现、宣传,以树立典范,鼓舞士气,同时这也是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弄明)

《地方志》副主编杨鸿儒共同主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孔令士、中共河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志》总纂肖风同志到会讲了话。

会议认真学习了《1991 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纪要》，重点研讨了方志刊物如何为提高志书质量、增强志书科学性服务。与会代表联系修志业务和刊物编辑工作实际，作了深入的探讨。

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简述如下：

(一)方志刊物当前主要抓什么？大家认为，应该抓住提高志书质量这个中心，引导修志人员强化全面质量意识，树立全方位的质量观念，认真总结编纂经验，针对志书中的薄弱环节，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新志书的质量。回顾十年来，各地刊物发表了大量文章，呼唤关注志书质量问题，并突破了新志编纂中一些难点，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今后方志刊物应该主动地、积极地为提高志书质量做文章。总的要求是办出特色、办出风格、办出新水平。

1、加强刊物的指导性。注意研究和分析新志的现状，善于抓住编纂实践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做到选题有针对性，文章有新意和深度，努力提高稿件质量，使刊物真正成为修志人员的良师益友。

2、大力开展新志评论。搞好新志评论，一是扩大社会影响，为社会利用和检验新志书开辟道路。二是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借鉴。新志评论要实事求是，防止故意挑剔，吹毛求疵，更要杜绝廉价吹捧，任意拔高。评论形式应当多样，可以就一部志书进行全面评价；也可以就一部志书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评论；还可以就一批志书进行综合评论；或就一批志书中某个问题进行专题评论，并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评出质量、评出水平。

3、为建立、充实和提高理论队伍而努力。目前各地都涌现出一批理论研究积极分子，但缺乏组织和引导，基本上处于一种“人自为战”的状态，各地必须加强方志研究的组织工作。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办刊的针对性，善于抓住修志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刊物栏目也要适应修志工作的发展而有所调整变化。

4、进一步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与会同志认为，编辑队伍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方志刊物的质量，因此，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应放到重要位置上来抓。目前，各地方志刊物工作量大、人手少、担子重的矛盾日益突出。会议呼吁各地修志机构要进一步重视方

志刊物的作用，并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刊物的编辑工作者更应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继续发扬奉献精神，为编纂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和两个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会议就如何进一步办好方志刊物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1、关于方志刊物发展趋势的问题。这是与会同志共同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如何适应修志形势的发展，有些同志认为，方志刊物应当逐步转向以社会读者为主；有些同志则认为，地方志工作内容仍然很多，专业修志人员仍是基本读者对象；也有的同志认为，方志刊物可以兼顾为修志服务、为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是时代的需要。究竟采用何种形式，两者比例如何确定，应因地因时制宜，应当百花齐放。就目前来讲，无论以指导性、学术性为主的刊物，还是以资料性、知识性为主的刊物，亟待解决的是提高刊物质量的问题。

2、关于加强地情研究、国情教育的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反复强调开展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给方志刊物增添了新的活力。方志刊物应当抓住时机在这个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地情研究、国情教育服务。

3、关于贯彻著作权法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表示，坚决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无论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方志刊物，都应当遵照执行。会上还协商了方志刊物之间，互相刊登文摘时只向作者付稿费，免向首次发表文章的刊物付酬的协定。

4、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方志刊物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问题。自 1986 年以来，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支持和关怀下，已经召开的三次全国及三次南片省级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对交流办刊经验，加强刊物之间的联系，研讨办刊中的共性问题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使全国的方志刊物进一步成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各级地方志编委会进行指导和引导修志工作的重要阵地和有力工具，建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每年召开一次全国省级方志刊物工作会议或主编座谈会。

(本文由刘柏修、吴长安同志起草，后由曹贵森、董健桥、赵慧、杨鸿儒同志作了修改、补充。本刊发表时作了删节)

城市志研讨更趋深入的盛会

——西北地区城市志质量研讨会综述

本刊特派记者 王能伟

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城市志指导组委托,西北地区城市志质量研讨会于1991年5月31日至6月6日在西安市召开。参加会议的城市志指导组成员有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沈阳、青岛、大连、哈尔滨等9市,特区和计划单列市有宁波、成都、深圳3市,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个西北地区的省志办公室,西北五省省辖市21个,共到会40个单位、52名代表,代表提交的论文24篇。城市指导组正、副组长陆天虹、梅关桦同志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西安市常务副市长郝树茂代表市委、市政府到会并致欢迎词。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志质量问题。通过对已出版的《嘉峪关市志》和已初具规模的《乌鲁木齐市志·公用事业志》、《宝鸡市志·交通邮电志》、《铜川市志·对外经贸志》三部分志稿进行评议,共同探讨提高志书质量的途径和措施,交流各城市的体会和经验。

通过研讨,大家感到开了一次务实的会,得益匪浅的会,也是一次城市志研讨更趋深入的会。

一、地区性城市志协作会是一种好形式。与会代表通过这次研讨会,感到城市志指导组的工作很有成效,形式上多种多样,内容上由浅入深。这几年,由一般指导发展到以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志书研讨为标志的分类指导,并进一步发展到由以前两年东北片、这次西北片、今秋华北片城市志协作会为标志的分片指导,把一般指导与分地区指导、分类指导结合起来。各种研讨会,根据各城市修志工作的进展情况,突出一、两个具体议题,事先让大家充分准备,写出论文,在会上作比较切实而有深度的研讨,虚实并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清道理。这次会上,东北片的同志介绍了他们三次地区城市志质量研讨的经验:第一次协作会议是围绕党的十三大精神,研讨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情,提高志书的质量问题。第二次会议,从地方志是国情的载体这个新的认识出发,以深入研究和正确记述市情为中心,通过评论《沈阳市志》的《综合》卷和《交通邮

电》卷来研讨提高志书的质量。第三次会议,是根据1990年10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城市志质量研讨会精神,着重讨论各地修志的重点和难点,讨论了关于政党、政权、政治运动的记述质量问题。每次会议由于议题明确,主题突出,所以研讨比较深入,收益较大。这次西北地区也通过评议志稿来研讨质量问题,很实在。

二、正确估计修志形势。代表们回顾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十年史,感到当前的修志形势,既不是一帆风顺、成功之作比比皆是,也不是一团漆黑、没有一部合格志书,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新编地方志工作被提上了各级党政领导工作的日程,省、市、县普遍建立了地方志机构,我国目前450个城市,几乎都在修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创导的修志事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实现,并且陆续出成果了。据1991年5月的不完全统计,已有28个市出版了46部志书,其中16个市为一卷本的市志,8个市出版了市志的分卷26部,有4个市出版了简志,另外有1个市出版了5部区志。陆天虹同志说:过去的十年是打开局面,全面搜集资料,组织探讨、试写、编纂和打基础的十年,今后十年则是大量出成果,编纂成志,全面丰收的十年。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我们手中不但被继承,而且发扬光大,无论是修志的规模,还是修志的指导思想、资料的丰富、体例内容的科学性和整体性、系统性等都大大超过了前人所达到的成就。粤、琼、港、澳、台方志界同仁也认同内地的地方志事业的规模是空前的、成就是可观的、前景是喜人的。梅关桦同志还指出:前十年,全国还在实践中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的修志工作者他们为了新方志的成功,筚路蓝缕历艰辛,劳形案牍献青春,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前几年还出现了一批重视修志工作的领导,如南京的市长、书记,以及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春等城市的有关领导。

毋庸讳言,地方志事业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一

面,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志工作者任重而道远说的。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我国的城市由十年前的几十个增加到今天的450个,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志在地方志大家族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编纂城市志是适应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是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党的到2000年的伟大战略目标和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也是为21世纪及今后的子孙后代服务的,是具有现实的和长远意义的系统工程,国内外都注视着,我们肩上的任务艰巨,而水平和能力、队伍的建设尚需尽快跟上,适应这种要求。二是我们编修的志书质量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标准,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符合时代的要求。鉴于上述原因,去年和今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的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都把提高志书质量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城市志各分片会议也都围绕志书的质量问题确定议题。

三、对志书的质量要求更为具体化。城市志的质量问题是一个总量指标,是综合性的概念,不能只顾及某一个单项的方面。从志书的内容到形式,从总体设计、篇目体例、内容编写、图表运用、行文规范、到印刷装帧等都必须十分讲究,做到精益求精,努力达到90年代应有的水平。当然,第一位的要素在于编写内容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仅就评价一部志书的内容质量而言,其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的。可以全面地评价,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进行评价。例如,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选择、观察、分析历史资料,努力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否贯穿于编纂工作的全过程,融化、体现于志稿内容之中,而不是那种不适当地或简

单化的“政治说教”和“宣传色彩”。当然,这并不排斥那种以史料为基础的“画龙点睛”式的论断。对历史资料的编纂是否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做到真实客观、论断公允、观点鲜明,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对于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是否反映了它的基本面貌,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真实地记述了历史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梅关桦同志说:温饱问题的解决,在中国11亿人口的大国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对有些人、包括一些青年人都看得平平淡淡,觉得无所谓。要到达小康水平,还要经过多少艰苦的奋斗啊。经过志书的编写,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当前,我认为志书至少要记清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要记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二要记党政的领导,包括地下党的工作;三要记科技的进步;四要记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五要记改革开放。又如,在篇目体例上,在门类的设置和内容的表述上是否反映了各个有关门类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的逻辑关系,叙述得当,符合科学性。对于市情的研究是否充分,在一般国情的指导下把握特点,努力反映出本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具有浓郁的地区特色和特殊的地区风貌、地方特色。这次会议的论文中就有不少这类文章。城市志的质量还要看文字表述上是否规范流畅,通俗易懂,朴实严谨。现在出的志书,数据差错、矛盾太多,错别字太多,我们要高标准、严要求,要象当年出《毛泽东选集》那样认真,几十年找不出一个错别字。此外,志书在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还存在着是否符合本门类和专业自身的科学性等问题。

(责任编辑 卢海鸣)

江苏省第四次 地方志刊

物研讨会召开

江苏省第四次地方志刊物研讨会于5月21日至22日在徐州市召开。《江苏地方志》和南京、镇江、扬州、苏州、常州、南通、盐城、淮阴、徐州等省市志刊

物的负责人和编辑近20人出席了会议。

去年下半年全国报刊清理整顿和重新登记以来,我省的地方志刊物在各方面有所提高,但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会上大家对办刊宗旨,组稿编辑方法、发行工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大家认为,地方志刊物必须突出自己的特点,既要为修志服务,又要面向社会,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办好刊物,进一步扩大和发挥方志刊物的影响和作用。

(缪小咏)



“热爱南京 振兴中华”竞赛试题

竞赛标志

一、竞赛注意事项

1、答卷须用钢笔或圆珠笔在16开纸上书写,不抄题,只需标明题号,写上答案。务请注明参赛者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2、答卷请于9月30日前(以邮戳为准)寄《南京史志》编辑部(南京市府大院内,邮码210008),信封上除贴足邮票外,还须贴上本次竞赛标记,否则无效。

3、参考资料:《南京简志》、《南京史志》杂志、《南京年鉴》(1990年)、《金陵掌故》、《金陵逸事》、《南京乡土史》等。

二、竞赛试题

1、南京位于北纬____,东经____。总面积为____平方公里。

2、南京现辖____区____县,总人口为____人,其中市区人口为____人。市区中面积最大的是____区,城区中人口最多的是____区。

3、位于中华门外的____是南京的第一座古城池,它建于____年。____年南京首次建都。

4、六朝是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后又有____、____、____在此建都,故南京有十朝古都之称。

5、金陵衡山之役,发生在____年,《汇纂》认为“____自此始”。

6、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____,而这时张士诚已在苏州称吴王,所以史家称张为“____”,朱为“____”。

7、____年____月____日,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____,成为“东方革命风暴的中心”。

8、辛亥革命江浙联军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光复南京,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____。

9、人民解放军于____年____月____日解放南京,古城从此获得新生。随即成立了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____为主任;____为副主任。

10、当前我们国家的大局是____。

11、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核心是____八个字。

12、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____周年,7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____作了____的长篇重要报告。

13、南京是____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南京市最早的原始居民是____。

14、“长江三大矶”指的是湖南的城陵矶、安徽的采石矶和江苏南京的____。

15、流经南京市区的秦淮河有两个源头,一是____,一是____。

16、南京历史上最早的铸币是吴大帝孙权铸造的____铜钱,最早的铁钱是梁武帝普通四年铸造的____铁钱,最大的纸币是朱元璋印制的____。

17、《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家____所写的一部关于文学理论的巨著。

18、文化瑰宝南朝陵墓石刻,一般是三种六件,由____、____和____组成。

19、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丹阳太守____创办了南京地区有史记载的第一所学校。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____是南京最早建立的一所小学。

20、古都南京医学历史悠久。南齐永明九年(491年)所设的____是南京最早的医院雏型。

21、长居南京的李渔(笠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和造园家,他晚年所写的《____》一书在我国古典戏曲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22、____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晚年归隐金陵钟山脚下,其故居叫____。

23、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随同出访的马欢写的《____》、费信写的《____》、巩珍写的《____》等书,详细介绍了所到亚、非国家的各方面情况。

24、地方志被宋代史学家____称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奠基者____称之为“一方全史”。

25、南京市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九处,即明孝陵、中山陵、天王府、栖霞山舍利塔、____、南唐二陵、南朝陵墓石刻、____、雨花台烈士殉难处。

26、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所画的《____》是一幅名闻中外的稀世珍品。

27、东晋音乐有突出成就的是音乐“三绝”。____是当时南方音乐界的泰斗,他擅长吹笛,使用的笛子是东汉蔡邕传下来的____笛。

28、南唐中主____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词人,他与后主____的词合称为“南唐二主词”。

29、南京的____与蜀锦、宋锦、杭锦统称为我国

四大名锦。1954年7月成立的南京____,创制出不少新品种,尤以明神宗____龙袍料科研项目最为突出。1984年中国工艺美术奖评审被公认为稀世珍品。

30、南京绒花历史悠久,有____、帽花、____、罩花、戏剧花等几大类。

31、南京的市政建设成绩斐然。1929年建成南京市第一条柏油干道____,1932年在近郊建成我国最早的____公路,1976年开始建设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____公路,1986年建成南京市第一座大型城市立交桥____。

32、南京市市民应遵守的两个文物保护法则是《____》和《____》。

33、____是迄今江南发现的最古老的汉碑之一。该碑是东汉灵帝时____任溧阳长所立的德政碑。

34、座落在今鸡鸣寺大雄宝殿西侧的琉璃宝塔,佛教界称之为消灾延寿的____塔。

35、南京近代工业,始于同治四年(1865年)洋务派李鸿章创办的____。

36、今和平公园内有一塔,昔日名叫____。是1941年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长时兴建的。

37、古城南京的东南角老虎头有晋周处的宅第,其名叫____或____。

38、黄埔军校迁址南京后改称为____,1928年3月6日举行开学典礼。

39、1931年,____创办了我国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江南汽车公司。

40、南京近代建筑以____形式而独树一帜,东郊名胜中山陵是____设计的;五台山体育馆是____设计的。

41、陶行知先生创作的《____》曾被定为晓庄师范学校的校歌,这首歌曾流传到国外。

42、由王焕镛编纂的《____》是三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南京志书。

43、“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摒忧思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1931年____被关押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时所作的____。

44、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其中王、谢指的是东晋政权的“擎天双阙”____和____。

45、十竹斋主人是明代____,以其《____》和《____》而享誉世界。

46、随园是享有“一代骚坛主”之称的____生活

和安息之所。以著《海国图志》而闻名的魏源,在南京的住所是____。

47、有“江南八侠之一”之称的____,逝世后葬于____。

48、戏曲大师吴梅是位对于“____、____、____、____,均臻绝顶之一位大师”。

49、王云五是民国时期政治界、出版界的著名人物。1927年,他在南京多年研究而成的____正式由商务印书馆投入编印。

50、南京有条三元巷,是以____连中三元的武状元而命名的。

51、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称为____,上面登记有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等。

52、____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1923年他创建了“南京鼓楼幼儿园”,这是我国第一所幼儿教育实验中心。

53、首任金陵女大校长、著名学者____,1972年曾荣膺美国密执安大学授予的____。

54、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是五、四运动时期创办的《____》。____写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最早在南京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55、1922年秋,在浦口秘密成立了南京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____任组长,有党员3人。

56、1946年5月3日,____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由重庆飞抵南京,以____为办公地点,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谈判。

57、1950年11月开始,南京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捐献了____架战斗机。

58、南京长江大桥首任设计总工程师是____。

59、1989年____月____日,国务院决定对南京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单列的时间原则从____年开始,并赋予其相当于____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60、《南京史志》创刊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到本期已出版发行总____期。

61、南京市第一医疗器械厂独家生产的____,1990年被定为国家级新产品。

62、南京同仁堂制药厂生产的传统产品____、牛黄清心丸曾获国家经贸部颁发的“出口产品,品质优良”称号。

63、南京金陵制药厂在国内首创的独家产品____,被称为血栓病的克星;____是治疗小儿呼吸道感染的新药,获“全国百病克星大奖赛”铜牌奖。

國營南京第一醫療器械廠

NANJING FIRST MEDICAL INSTRUMENT FACTORY



厂长、高级工程师胡文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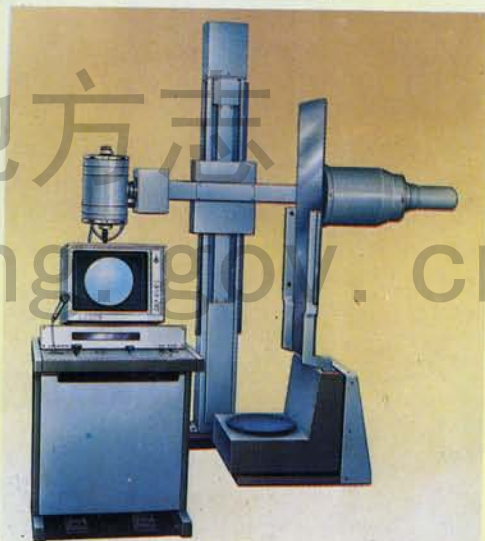


X 线机大楼



50mAX线机装配线

NXS40D型手术X 线机



NXS100Y 型遥控透视X 线机

国营南京第一医疗器械厂位于南京夫子庙，是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生产医用放射设备的重点厂家之一，该厂建于1958年，具有三十多年生产医用X 线机的历史。该厂技术力量雄厚，专业技术职称人员123 人，占职工总数四分之一。工厂占地面积12000 m²，建筑面积16000 m²，拥有机械、电子、高低压电器等设备及各种检测仪器仪表数百台套。

近几年来，该厂依靠技术进步，应用最新技术，大力开发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产品档次高、质量优、品种新，赢得了用户。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已连续三年以30% 的幅度递增。1990年该厂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目前主要产品有：NX F 50mAX 线机、NX S 40D 手术用X 线机、NX S 100 Y 型遥控透视X 线机、NX S 500 S 多部位X 线摄影机等3 个系列8 个品种。其中：独家生产，采用中频技术，数字电路控制的NX S 40D 手术X 线机获江苏省优秀新产品（金牛奖），优质产品奖；全国销量第一的NX F 50mmAX 线机获江苏省优质产品奖，国家医疗管理优质产品奖；新近研制成功的NX S 100 Y 型遥控透视X 线机获江苏省优秀新产品金牛奖，并被定为1990年国家级新产品。

最近，列为国家医药管理局“七五”项目的“中频X 线机扩建工程”正在该厂加紧施工，“八五”期间将形成规模性生产，届时将以更新的姿态、更加完美的产品为中外客户服务。

工厂地址：南京市 建康路185 号

邮政编码：210001

电话总机：626111 电报挂号：1557



南京同仁堂製藥廠

地址：南京中华门外窑岗村32号；电话：624202



厂长：唐富春

排石冲剂

PAISHI CHONGJI

(Lithoexpulsivum)



The product has been awarded a national silver medal. Paishi Chongji, a early-prepared medicine by pharmaceutical institutes in our country, is a sovereign remedy especially efficacious for lithiasis. Many years of clinical practice with lots of cases have borne out that Paishi Chongji take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removes the stones through ureter with high efficacy up to 61.18%. It saves the patients from the pains of an operation and enjoys general popularity among them.

Chief Ingredients:

Herba Glechomae; Semen Plantaginis; Caulis Lonicerae; Folium Pyrrosiae.

Action and Use:

Diuretic, relieving the symptom of dysuria, removing stones. For urolithiasis, such as nephrolithiasis, urethrolithiasis, cystolithiasis, etc.

該產品榮獲國家質量銀質獎。

排石冲剂是我國醫藥部門最早研製成功的一種專治結石症的特效藥物。經過多年反復臨床試驗及大量病例証明，服藥後能在短期內使結石從輸尿管排出體外，療效高達61.18%，使患者免於手術之苦，因而深受廣大患者歡迎。

(主要成份)連錢草，車前子，忍冬藤，石韋。

(功能與主治)利尿，通淋，排石。用於腎結石，輸尿管結石，膀胱結石等泌尿系統結石症。